保与国运

世政治人的困惑

著

知识之高低，关乎国运之兴衰

○慈禧
○李鸿章
○袁世凯
○奕䜣
○文祥
○荣禄
○刚毅
○奕劻

身处变局，各路政要何去何从？
满朝亲贵，为何无人力挽狂澜？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近世政治人的困惑

知識分子與運動

羽戈 著

知识与国运

近世政治人的困惑

羽戈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朱熹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鲁迅

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

——萧伯纳

序

少时读《三国演义》，最爱章节之一，应数第二十一回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少年心性，对刘备的隐忍不以为然，反倒羡煞了曹操的豪迈和犀利。在曹操眼里，袁术冢中枯骨，袁绍色厉胆薄，刘表虚名无实，刘璋守户之犬，每读一句，我便在那本盗版书上批注“当浮一大白”，最后算了算，大概要喝六杯青梅酒。十余年后，我终于在草长莺飞的江南春天尝到了青梅酒的滋味，入口之际，风轻云淡，沉于腹中，烈火升腾，心底郁积的孤愤迅速被点燃，正适合纵论庙堂，横议江湖，直言不讳，快意恩仇。对饮的兄台乃是一位豪杰，我提起一个知名学者的名字，他叫道：“井底之蛙！”再说一个，他叫道：“沐猴而冠！”一坛青梅酒将尽，这厮已经醉山颓倒，口中喃喃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若谓少年时节，我们还有一丝路见不平拔剑而起的英雄情结，成人之后，渐渐洞悉英雄主义的害处，一个需要英雄拯救天下苍生的时代，注定是大不幸的时代。基于此，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怀想，则不在那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而试图把握曹操论定群雄的眼光和标尺。譬如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回头再看袁绍的故事，几乎印证了曹操所言每一个字。所谓不刊之论，大抵如是。

然而论定人物，谈何容易。古时难，今时更难；论古人难，论今人更难；论英雄难，论凡夫俗子更难。举例来说。争议最大的古人，莫过于曹操、冯道之辈，对他们的评价之所以两极化，更多是价值观问题。设若曹操、冯道生于近代，在价值观之前，我们首先会遭遇真相问题（试看被比作曹操的袁世凯，被比作冯道的杨度）。如果说在古代，由于视角受限，我们只能看见曹操、冯道的一张侧脸，那么在近世，当真相遭遇双重过滤，我们同样只能看见曹操、冯道的一张侧脸。

何况，近世中国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剧情反转之速，令人目不暇接。政学两界，一众要角，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从康有为到杨度，从鲁迅到胡适，时时刻刻都处于争议之中。昨天还供在神龛之上，今天便落到凡尘之下，今天还是窃国大盗，明天便是民族干城，伟人与罪人，英雄与小丑，往往反转于一瞬之间。这愈发增加了论定人物的难度。

老话说知人论世，我则尝试知世论人。这些年来苦读中国近代史，最大受益，不是热血而是冷静，不是经验而是教训，不是洞悉要去做什么，而是洞悉不去做什么……恰在这种种否定之中，我隐约觅得了论定人物的一些标准和法则。归结起来，共计四点：

一曰学与术。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郑孝胥月旦时贤，谓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虽然立论不公，对张之洞、端方的评价有待商榷，郑氏所发明的学、术之分，却可作为论断的尺度。需要注意，此说于古有征，古人好讲经权，大体而言，学可对应经，术可

对应权。先贤云："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又云："守经而不知用权，谓之腐儒；用权而不知守经，谓之妄人。"所以有经有权，有学有术，二者并用，才是正道。

二曰釜与薪。汪精卫曾以守约之名撰《革命之决心》，刊于《民报》第二十六号（1910年2月），文中将革命比作"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热之以薪"，釜者，锅也，薪者，柴火也。说白了，要烧熟革命这碗饭，急需有人作釜，有人作薪，前者要求"不惮烦"，忍受烈火烧灼，后者要求"不畏死"，不惜化作灰烬，前者的要义是韧性，后者的要义是勇气，这二者不分高下，而取决于革命党人自觉其性情、能力适合做什么。引申开来，则关乎一个人的才具与志业的关系。拿汪精卫来说，他本是作薪的材料，最后偏偏要去作釜，结局自然悲剧。

三曰才与略。张学良晚年曾对比其父张作霖与蒋介石："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古时雄才大略乃是一个词，张学良将其一分为二，实在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尽管他对张作霖与蒋介石的评价并不准确。这里的雄才，我理解为干才，大略当指格局与眼界。要言之，欲成一番事业，必须兼具雄才大略。有雄才而无大略，往往目光短浅，只可能成为一代枭雄，霸业转瞬成空；有大略而无雄才，往往眼高手低，只可能成为悲情英雄，壮志南柯一梦。

四曰知识与国运。1912年8月，孙中山受邀进京，与袁世凯会晤，相谈甚欢，回到上海之后，曾发表演说，谈及对袁世

凯的观感，盛赞其有肩膀、有头脑、有新思想，只是手腕偏旧，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革命起于南方，对北方影响不大，南方如一本新历，北方如一本旧历，故而要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最后留下了一句经典论断："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这个说法，与学与术相近，不过所指更明确。具体说来，有新思想而无旧手段，必将隔膜于国情而欠缺行动力，以致纸上谈兵；有旧手段而无新思想，必将隔膜于时代而欠缺方向感，以致进退失据。

由孙中山所言的"新思想"，引出我的一点愚见：中国要实现唐德刚先生所定义的"第二次大转型"，从近代转向现代，从帝制转向民治，需要众多因素风云际会，执政能力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细论执政者的能力，其头脑或知识素养无疑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知识与国运的关系正在于此，如《论袁世凯》一文所云："大体说来，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对应国家转型的方向感，构成了转型成败、国运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有之转型未必成功，没有必不成功；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下限。"就此而论，执政者的知识素养达到了什么高度，有没有"新思想"，将成为考量他们的头号标尺。

遗憾的是，这一路考察下来，从慈禧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旧手段"从未缺席，"新思想"难觅踪迹。慈禧有"不学"之名，思想底色接近义和团，对立宪的认知严重错位，死前追悔莫及，称"毕竟不当立宪"；李鸿章与同时代的伊藤博文对比，最大差距即"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

治之本原”；袁世凯也是如此，有术而不学，有雄才而无大略，对共和、民主等“新思想”一知半解，注定难成新时代之大人物……由这些人来领导中国转型，方向感必将大成问题。更不幸的是，在那些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上，他们的旧头脑和旧思想，非但无法推动中国砥砺前行，反而开起了历史的倒车。

目　录

序 / 001

论慈禧太后：知识与国运 / 001

一、慈禧的知识 / 003

二、慈禧问对 / 010

三、慈禧与义和团 / 022

四、慈禧的政见 / 034

论李鸿章：时势与英雄 / 043

一、《挺经》疑云 / 045

二、“汉奸”问题 / 058

三、李鸿章之过 / 069

四、毕相伊侯久比肩 / 085

五、裱糊匠的衣钵 / 092

论袁世凯：学与术 / 103

一、学与术 / 104

二、袁世凯之术 / 108

三、袁世凯之学 / 125

四、遗言之谜 / 132

五、称帝时机 / 143

六、袁世凯的镜像 / 152

论亲贵：人才与国运 / 159

一、人才与国运 / 160

二、奕䜣 / 166

三、文祥 / 172

四、荣禄 / 180

五、刚毅 / 188

六、奕劻 / 195

七、三品以上皆浑蛋 / 204

后记 / 213

论慈禧太后

知识与国运

按一般叙事，中国近代史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1]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连头带尾将近一百一十年。其中前七十年，属于大清王朝晚期，是以有“晚清七十年”（唐德刚书名）之说。这七十年间，紫禁城共经历五位皇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不过同治帝与光绪帝虽然位居九五之尊，却非大权在握，反而一度沦为虚有其表的傀儡，实权则操于他们的生母或养母慈禧太后之手。就此而论，同治、光绪二朝（1862—1908年），也许更应该称作慈禧时代。

慈禧时代长达四十七年，约占晚清三分之二的时段。慈禧死后三年，大清覆亡，这绝非简单的时间关系，固然不能说慈禧之死导致了大清之死，然而她若不死，大清想必还能苟延残喘一些年头。与慈禧同年去世的晚清重臣王文韶曾对何刚德说：“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汝须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则大事更不可问。”[2]——老太太即慈禧。由此种种，可知慈禧之于大清的重要性：她与李鸿章，一君一臣，俨然晚清的缩影或代言人，他们费尽心机，竭尽全力，支撑帝国存续，同时他们身上显而易见的局限性，禁锢了帝国突围的步履，他们的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正对应帝国的命运。

---

[1] 本书论晚清史，一般采王朝或干支纪年，并用括号标注公元纪年；论民国及其后历史，直接采公元纪年。

[2]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一、慈禧的知识

慈禧最大的局限性，窃以为表现在知识或思想。

政治家当然不必是思想家，却不能没有思想。换一个更中性的说法，政治家必须具备与其时代使命相匹配的知识素养。一旦知识结构出现问题，势必影响其所把握的政治方向，问题越大，方向感越差。

慈禧的知识素养到底是什么水平呢？这与其人一样充满争议。好玩的是，在这一点上，吹捧她以至于把她捧上天的人，不是同胞，而是外国佬。如英国人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白克好司（Edmund Backhouse）《慈禧外纪》所云：

> 慈禧心思灵敏，突过于人，其热心政权，亦独秉特性。其天资之卓绝，性情之坚毅，加以一生经历之多，艰难困苦，险阻备尝，此其所以成为伟人也。年十六岁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尝有史臣在旁讽诵，故能通古今治乱大势，又能诗善书画，有此聪明学问，故能久揽大权。[1]

曾入宫为慈禧画像的美国人凯瑟琳·卡尔（Katherine Carl）《慈禧写照记》云：

> 慈禧太后能为诗词，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又能为古文辞，

[1]［英］濮兰德、［英］白克好司：《慈禧外纪》，陈冷汰译，沈阳：辽沈书社，1994年，第8页。

得大宗气派。中国言文，并不一致，欲以胸中所有之理想，以文字出之，实非易事，而尤难期望于一般之妇人。太后独能振笔疾书，洋洋千言不穷，斯真希有之才。太后尤能满文，平日最喜浏览古名家诗文集，而尤喜读英武悲壮之诗。……慈禧太后最富记忆力。盖中国人本以富于记忆力见称于世，而慈禧太后尤为此中杰出之才。彼于古名家之诗文词，能滔滔背诵，如数家珍。予自谓西人不能及也。[1]

这些记述可信吗？先看作者。光绪九年（1883 年），濮兰德来到中国，给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当私人秘书，随后供职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官至总办，同时兼任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驻中国通讯员。基于这双重身份，他在历史前台表现相当活跃，如戊戌政变康有为经上海出亡香港，《苏报》案章太炎、邹容受审等，皆有其影踪。他还采访过李鸿章，撰有《李鸿章传》。如果说此人声誉尚可，那么其搭档白克好司，通译为巴恪斯或巴克斯、巴恪思，则被视为声名狼藉的骗子或疯子。除了大名鼎鼎的《慈禧外纪》，巴恪斯另有一部关于慈禧的作品《太后与我》（据称原作拟名《秽乱清宫》），满纸臆想，通篇意淫，更适合当作情色小说来读。[2]《慈禧外纪》虽为二人合著，精通汉语、满语和蒙古语的巴恪斯则是主导，他在书中大肆杜撰、伪造史料，如《景善日记》《荣禄

[1]［美］凯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陈霆锐译，［英］濮兰德等：《慈禧外纪》，第 337 页。

[2]［英］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太后与我》，王笑歌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遗折》等，害苦了许多读者和研究者，以致连重译此书的秦传安都直言不讳："正是因为书中被他（巴恪斯）做手脚的地方太多，我才斩钉截铁地认为：这是一本十分恶劣的书。濮兰德大概并不知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上了巴恪斯的老当，成了受害者，一世英名，毁于一书。"[1]鉴于这种种情状，可知此书对慈禧的描述，不用过于当真。

再说文本。无论《慈禧外纪》还是《慈禧写照记》，均称慈禧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经史子集，名家诗文，无所不读。可惜这一说法难以得到有效证据支撑，如《清史稿》等官方史书对此一字不提，吴相湘称慈禧"出生地点以及其幼年少年情形，甚至十七岁被选入宫以前的生活，都没有文献可征，委巷传闻无可采信"[2]。结合慈禧家庭背景来看，其父叶赫那拉·惠征，在吏部当了十五年笔帖式（文书），四十岁后才被提拔为吏部文选司主事，才具并不出色，亦无文名可言，所能给予儿女的文化教育，只怕有限。慈禧的妹妹婉贞（光绪帝之母）、弟弟桂祥（隆裕太后之父）等，形象无不平庸——《慈禧外纪》称桂祥"为一最著名之无赖"[3]，且早年"贫困不能自

---

[1]［英］濮兰德、［英］巴克斯：《老佛爷的一生：慈禧外纪》，秦传安、虞丽绮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引文见秦传安：《重译〈慈禧外纪〉札记》，不过此文并未收入译著。

[2]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15页。委巷，原指曲折的小巷，借指民间，引申为僻陋、鄙俗之意。

[3]［英］濮兰德、［英］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7页。顺道说一点，《慈禧外纪》开篇谈慈禧家世，错谬百出，如称惠征"殁于安徽，女仅三龄"，实则咸丰三年（1853年）惠征病故于江苏镇江，其时慈禧十九岁，已经入宫；称荣禄是慈禧的亲戚，实无此事；称慈禧"三次垂帘听政，专权者五十余年"，三次当为两次，五十余年当为四十余年……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存”[1]——皆可作为佐证。

推论之外，还有实证。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曾公布慈禧在辛酉政变期间亲自书写的密谕——其时形势急迫，保密起见，只能自己动手——全文如下：

> 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虽董元醇奏敬陈管见一折，一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正，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在行归正；又在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正合朕议。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何敢违祖宗旧制，此所为是贵从权，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阳奉阴违，自行改写，敢敢抵赖，是成何心！该大臣看朕年幼，皇太后不明国是所至。该王大臣如此胆大！又上年圣驾巡幸热河之议，据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之议。朕仰体圣心左右为难所至，在山庄升遐。该王大臣诓驾垒垒，抗旨之罪不可近数。
>
> 求七兄弟改写。
>
> 进成后，在传著恭亲王总理赞襄正务，是否，求兄弟著议。[2]

我曾拿这封密谕作考题，让学生来挑错别字，看看谁挑

---

[1]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许指严等：《史说慈禧》，沈阳：辽沈书社，1994年，第414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御笔诏令说清史：影响清朝历史进程的重要档案文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得最多。正文加补注，共计二百六十字，其中错别字十七个。如“权理朝正”，“正”当为“政”；“在行归正”，“在”当为“再”，“正”当为“政”；“正合朕议”，“议”当为“意”；“此所为是贵从权”，“为”当为“谓”，“是”当为“事”；“敬敢抵赖，是成何心”，“敬”当为“竟”，“成”当为“诚”；后文两个“所至”，“至”当为“致”；“据是”，“据”当为“俱”；“诓驾垒垒”，“垒垒”当为“累累”；“不可近数”，“近”当为“尽”；“进成后，在传著恭亲王总理赞襄正务”，这一句最见真章，共有三个错字，“成”当为“城”，“在”当为“再”，“正”当为“政”……

除了错字连篇，密谕之文理，大都不通。这一点慈禧心知肚明，故而在密谕之后特地叮嘱“求七兄弟改写”。七兄弟即醇亲王奕譞，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本生父，既是慈禧的小叔子，也是妹夫。同辈兄弟当中，奕譞文化素养最高，著有《九思堂诗稿》等，他的确有资格帮慈禧润色文字。

慈禧初出茅庐，便露马脚。四年后，形格势禁，她不得不再次亲自起草上谕，企图罢黜执掌军机处的恭亲王奕䜣，全文如下：

>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出有因，实属暧昧知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以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

> 挟致，往往谙始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嗣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嗣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1]

必须承认慈禧的进步，经过这四年垂帘听政，其措辞大有讲究，文理通畅多了，尤其文气，凛然有王者之威。不过爱写错别字的老毛病如旧。正文共计二百三十字，其中错别字十一个。如“嗣此重情”“嗣此情形”“嗣此种种重大情形”，“嗣”当为“似”；“是出有因”，“是”当为“事”；“诸多狂敖”，“敖”当为“傲”；“以仗爵高权重”，“以”当为“依”或“倚”；“诸多挟致”，“致”当为“制”；“往往谙始离间”，“谙始”当为“暗使”；“用人行正”，“正”当为“政”（这一处错得蹊跷，后面“议政”之“政”倒是写对了）……此外还有一处笔误，“朕归政之时”，“归政”当为“亲政”，因这封上谕，名义上出自同治帝，不料慈禧代入感太强，忘记转换，从她这厢，该说“归政”。

对照四年前的密谕，我们会发现一点有趣的事实：此前“是”“事”不分，而今一如既往（“是贵从权”“是出有因”），此前“正”“政”不分，而今一如既往（“权理朝正”，“在行归

[1] 王开玺：《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37—38页。

正”“用人行正”)。与此相应，慈禧的自知之明也是一如既往。她把上谕发给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忘交代：“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

通过慈禧亲自书写的这两封密谕和上谕，足以推翻《慈禧外纪》《慈禧写照记》等关于其知识素养的美化工程。不消说青年，哪怕修炼到晚年，她也无法做到“能为诗词，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又能为古文辞，得大宗气派”；[1]稍微生僻一点的字，如张一麐之“麐”，照样不识，还得询问大臣。[2]要言之，终其一生，她的文化水平，对应今日学历，大概在初中生与高中生之间。那些无稽之言、不经之谈，把她推到硕士、博士的高度，要么昧于真相，要么别有用心。无论哪一种，都有碍我们认知其人的真实面目。

---

[1] 这两封密谕和上谕，由慈禧亲书，如呈堂证供，暴露了其书法水平，王开玺称之为“字迹歪歪扭扭，如同孩童涂鸦，看不出有任何书法功底”(王开玺：《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第35页)。我见过慈禧晚年朱笔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体只能说端正，与康熙、乾隆等皇帝抄写的《心经》一比，高下立判。凯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称慈禧“尤善书法，能作擘窠大字，受赐之人，无不珍同拱璧”，认为可比翰苑中人。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云，太平军兴起之后，咸丰帝宵旰忧劳，“以后（慈禧）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这些显然都是不实之词。此外，慈禧的画作多由缪嘉蕙代笔。金梁《光宣小记》云，“凡流传御笔，笔势生动者为太后亲笔，而较拘束者则皆缪所代也。”(金梁：《光宣小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2] 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一麐参加顺天乡试，考中第十名。“故事，顺天乡试前十名顺于未揭晓前进呈御览，余官年只十三岁，军机大臣拆弥封进呈，两宫见余年龄甚稚，异之。许星叔师时为军机大臣，奏称：‘臣上科典试江南，已中式张某副榜矣。’太后见名下末一字不识，军机奏此语麒麟之麟字同。”(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页）其时慈安已经去世四年，文中之太后只可能指慈禧。

需要注意，文化水平不等于政治水平，这是两个范畴的概念，尽管内在不无关联。文化水平低未必政治水平也低，文化水平高未必政治水平也高。慈禧属于前一种情况，她的政治水平远高于文化水平。以往我们喜欢强调她的权术，然而政治岂止权术一项，其决断力、平衡术、自我纠错等政治素质都是一流，自咸丰帝以下皇族，不论男女（包括备受好评的奕䜣在内），无人能及。由她执掌国柄，于危急存亡的大清王朝而言，实在是最不坏的选择。正是在她手上，帝国虽摇摇欲坠，却始终不曾解体。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的政治水平，终归还是受文化水平制约，就像有人谈政治与读书的关系：读书不一定懂政治，懂政治则必须读书。[1]所谓制约，我以为重点表现在政治视野与方向。书读多了，世面见多了，视野自然要开阔一些；视野开阔了，则可看清一个时代的潮流与方向。由此而论，尽管慈禧擅长顺势，敢于与时俱进，不过更多出于被动而非主动，近乎见招拆招，随波逐流，其政治视野终嫌狭隘，缺乏远见。若把近世比作激流，晚清比作一条破船，以她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保持船的平衡，而无法掌控船的方向，更无从预见时代或者说历史三峡的走势。她一生最大的局限，以及悲剧之形成，恰在于此。

二、慈禧问对

身为晚清的实际执政者，慈禧常常召见大臣，代表皇权发

[1]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14页。

问，臣子对答，是为问对。有些问对，被臣子写入日记或回忆录（胆子大的人，还要随机吐槽两句），正可作为解析慈禧的一手史料。这里且举数例，以窥究竟。

第一个出场的是晚清名气最大的人：曾国藩。同治七年（1868年）底，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陛见，前后入宫四次。其时同治帝还是少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执掌国柄。召见之际，曾国藩日记并未明言哪位太后在问话，只说“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以我们对两位太后性情的了解，当可推断问话者乃是慈禧。[1]十二月十四日（1869年1月8日），第一次召见，主题是撤兵与曾国藩的家世、经历等：

> （慈禧）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曾国藩）对：“办完了。”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撤几多勇？”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问：“何处人多？”

---

[1]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慈安沉默寡言笑，守家法，知大体。”（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2页）可知她一向不爱说话。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受召见，慈安太后发言五六次，故其日记特地提上一笔：“往时召对，慈安太后不甚发言。”（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页）。薛福成《庸盦笔记》记慈安太后圣德，曾对比慈安与慈禧，即文中东宫与西宫，亦云慈安讷于言：“当是时，天下称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错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窍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然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薛福成：《庸盦笔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得安静？"对："安静。"问："你一路来可安静？"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问："你出京多少年？"对："臣出京十七年了。"问："你带兵多少年？"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问："你从前在礼部？"对："臣前在礼部当差。"问："在部几年？"对："四年。道光廿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问："曾国荃是你胞弟？"对："是臣胞弟。"问："你兄弟几个？"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头。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旋叩头退出。[1]

十五日，第二次召见，主题是造船与曾国藩的病情；

皇太后问："你造了几个轮船？"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问："有洋匠否？"对："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问："洋匠是那国的？"对："法国的，英国也有。"问："你的病好了？"对："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很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问："你吃药不？"对："也曾吃药。"退出。[2]

---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三）》，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1583—1584页。

[2] 同上，第1584页。

十六日，第三次召见，主题是人事与吏治，中间照旧谈及撤兵：

皇太后问："你此次来，带将官否？"对："带了一个。"问："叫甚么名字？"对："叫王庆衍。"问："他是什么官？"对："记名提督，他是鲍超的部将。"问："你这些年见得好将多否？"对："好将倒也不少，多隆阿就是极好的，有勇有谋，此人可惜了。鲍超也很好，勇多谋少。塔齐布甚好，死得太早。罗泽南是好的，杨岳斌也好。目下的将材就要算刘铭传、刘松山。"……太后问水师的将。对："水师现在无良将。长江提督黄翼升、江苏提督李朝斌俱尚可用，但是二等人才。"问："杨岳斌他是水师的将，陆路何如？"对："杨岳斌长于水师，陆路调度差些。"问："鲍超的病好了不？他现在那里？"对："听说病好些。他在四川夔州府住。"问："鲍超的旧部撤了否？"对："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八九月间臣调直隶时，恐怕滋事，又将此四千全行撤了。皇上如要用鲍超，尚可再招得的。"问："你几时到任？"对："臣离京多年，拟在京过年，朝贺元旦，正月再行到任。"问："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你须好好练兵。吏治也极废弛，你须认真整顿。"对："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如今外国虽和好，也是要防备的。臣要去时总是先讲练兵，吏治也该整顿，但是臣的精力现在不好，不能多说话，不能多见属员。这两年在江南见属员太少，臣心甚是抱愧。"属员二字，太后未听清，令伯王

（伯彦讷谟祜）再问，余答："见文武官员即是属员。"太后说："你实心实意去办。"伯王又帮太后说："直隶现无军务，去办必好。"太后又说："有好将尽管往这里调。"余对："遵旨，竭力去办，但恐怕办不好。"太后说："尽心竭力，没有办不好的。"又问："你此次走了多少日？"对："十一月初四起行，走了四十日。"退出。[1]

时隔一月，已是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1869年2月10日），第四次召见，主题是练兵和吏治：

皇太后问："尔定于何日起身出京？"对："定廿日起身出京。"问："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对："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问："你打算练二万兵？"对："臣拟练二万人。"问："还是兵多些？勇多些？"对："现尚未定。大约勇多于兵。"问："刘铭传之勇，现扎何处？"对："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他那一军有一万一千余人，此外尚须练一万人，或就直隶之六军增练，或另募北勇练之。俟臣到任后察看，再行奏明办理。"问："直隶地方也不干净，闻尚有些伏莽。"对："直隶山东交界，本有枭匪，又加降捻游匪，处处皆有伏莽，总须练兵乃弹压得住。"问："洋人的事也是要防。"对："天津、海口是要设防的，此外上海、广东各口都甚要紧，不可不防。"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防海的事否？"对："近来因长毛、捻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585—1586页。

子闹了多年，就把洋人的事都看松些。”问：“这是一件大事，总搁下未办。”对：“这是第一件大事，不定那一天他就翻了。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问：“他多少国连成一气，是一个紧的。”对：“我若与他开衅，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讲和是要件件与他磨。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问：“也就靠你们替我办一办。”对：“臣尽心尽力去办，凡有所知，随时奏明请示。”问：“直隶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对：“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畏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几人。”问：“百姓也苦得很。”对：“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问：“你要的几个人是跟你久了的？”对：“也跟随臣多年。”太后顾带见之惠郡王云：“叫他就跪安。”余起身走数步，复跪奏云：“臣曾某跪请圣安。”[1]

曾国藩的记录原汁原味，加上其人品作保，可信度极高，故而我不厌其烦，全盘照录，以还原晚清君臣问对场景。纵观这些对话，似无出奇之处，太后问得平常，臣子答得审慎。日记近乎速记，并未多加议论，正符合作者谨小慎微的一贯性情。不过，这一月在京见闻，使曾国藩积累了满腹牢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不能在日记里说，便向亲信倾诉。第四次问对之时，慈禧曾问：“你要的几个人是跟你久了的？”曾国藩点将数人，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604页。

其一即他晚年最欣赏的幕僚和弟子赵烈文，此次保举为磁州知州。五月，赵烈文北上赴任，首先到保定拜谒老师，二人私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吐槽朝中大佬的机会：

> 两宫（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同治帝）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䜣）、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同治八年五月二十日，1869年7月7日）[1]

这里单说第一句。四次问对，慈禧发问数十次，在曾国藩看来，竟然“无一要语”，这话实在伤人。那么，曾国藩眼里的要语是什么呢？结合他和赵烈文的日记来讲，当时他所关心的国事，应是洋务和外交。其实这两点，慈禧也曾关注，如提问“你造了几个轮船”“洋人的事也是要防”等，只是这么浅薄的问法，难入曾国藩法眼，不免被他鄙夷。那边厢，慈禧最关心的则是湘军裁撤，一再提及，也许令曾国藩厌烦。这一来一去，遂使曾国藩判定慈禧“才地平常”。在“平常”与“要语”之

[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三），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259页。需要指出，曾国藩对慈禧原本评价甚高。辛酉政变，慈禧联络奕䜣，击败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曾国藩闻讯，曾在日记称赞“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与李鸿章“相与钦悚久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1861年12月31日）。

间，所呈现的慈禧与曾国藩的差距，端在政治视野。当曾国藩开眼看世界的时候，慈禧的目光只能企及他的背影或脚后跟。

慈禧与曾国藩这番问对，相当出名，后人常有论及。何刚德《春明梦录》为慈禧辩护，称其“甫经听政，诸事究未娴熟，故当曾文正（曾国藩）功成入觐之日，召对问答，不过敷衍数语而已。文正集中所载，自非虚语”——“甫经听政”一说不当，此时慈禧已经执政八年——随之笔锋一转，“嗣后历四十余年之世变，备尝艰险，体悉下情”。召见臣子，则能侃侃而谈，“其英明处，不能不令人钦服”。[1]

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继续举例。第二个出场的是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光绪元年（1875 年）初，马嘉理案爆发，酿成外交事件，中英久经谈判，签订《烟台条约》。其中一款即大清派遣使臣前往英国道歉，这副令时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重担，最终落到郭嵩焘肩上。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1876 年 9 月 6 日），郭嵩焘入宫觐见，以年近六十、病势日深等理由推辞任命，慈禧遂加慰劳：“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总理衙门那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如今李鸿章在烟台，岂不亏了他，亦被众人说得不像样。”[2]这些话，虽有点安慰性质，却也可见慈禧对洋务与国情的了解，已经相对深入。

---

[1]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 15—16 页。

[2]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 3 卷，第 50 页。

再过两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使英法，行前受慈禧召见，问对情形，与郭嵩焘相仿：

……

（慈禧）旨："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曾纪泽）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

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

问：“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对：“外国称‘外部’，所办之事，即与中国总理衙门公事相同。闻英国近亦改称总理衙门。其实外国话都不同，也不唤外部，也不唤总理衙门，只是所办之事相同就是。”（光绪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78年10月14日）[1]

此中有一细节。慈禧问曾纪泽，外国是否也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面可以说明，她对外国、外交等并不怎么熟悉；另一面，与臣子问对，于她也是学习的过程。话说慈禧一直在学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她已经年过古稀，依然与皇帝一道，听大臣讲课。课程包括《四书》《书经》《庭训格言》《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国朝掌故》《各国政略》等。《各国政略》后来改作《西史讲义》，从“新航路之发明”“新大陆之发现”讲起，包括“法皇路易十四之霸业”“俄皇彼得之雄略”“普鲁士之勃兴”“美利坚立国”“法兰西内乱”，以及“英国宪政之沿革”“德国联邦之制度”“美国政策之变迁”等。[2]单看内容，相

[1] 曾纪泽：《曾纪泽日记》（中），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776—778页。原文曾国藩之“藩”字画圈替代，以避家讳。

[2] 茅海建：《清末帝王教科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各类〈讲义〉》，氏著：《依然如旧的月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24—129页。

当时髦。当然课本和老师是一码事，学生能否学到心里去，则是另一码事。

这一年，还有一场值得记录的问对。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学识兼优才堪大用”为名，保荐曹汝霖。慈禧召见，谈及日本立宪：

（慈禧）问：日本立宪是哪一年立的？

（曹汝霖）对：日本于明治十四年颁布立宪，到明治二十三年，才开国会。

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

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

问：日本国会的议员，怎样选举的？

对：他们国会分上下两议院，上议院又名贵族院，议员是按照定额，由日皇于贵族中有功于国的，及硕学通儒、大实业家中钦派的。下议院是按照各省定额，由各省人民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当选。

问：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

对：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

问：他们党派哪一党为大？

对：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

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

太后听了，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

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1]

---

[1]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曹汝霖对慈禧观感甚好："仰窥太后，目光炯炯，声音不高不低，对于奏对，不厌求详，一再下询，想见她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更可见她思想并不顽固，可惜平时没有人以各国新政灌输上陈。"并判定"太后是精明强干、喜揽大权、不甘寂寞之人"。

1906年，大清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立宪运动逐步展开，其模板正是日本。然而从种种发问来看，无论对于立宪，还是日本政治，慈禧都不无隔膜；至于立宪目的，视之为团结，也是典型错位，驴唇不对马嘴——曹汝霖的误导，可视为一种政治话术，投其所好，诱其上道，即便如此，只怕还是难以将立宪的精义输入慈禧衰老而封闭的心灵。据恽毓鼎《澄斋日记》，慈禧临终之际，忽然感叹：“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1911年11月21日）[1]痛悔之情，溢于言表。不难判断，这才是她的心里话，代表了她对立宪的真实态度。由此盖棺论定，她一生拼杀，不是输在了能力，而输在了由知识与思想所决定的政治视野，纵使尽力顺应潮流，却始终未能认清时代前进的方向。一旦方向出错，则不只前功尽弃，还可能倒行逆施。故此，她非但无法领导近代中国的第二次大转型，反而沦为阻碍转型的最大绊脚石。

三、慈禧与义和团

关于慈禧的知识与思想，还有一个经典案例，即她与义和团的关系。

---

[1]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61页。慈禧对立宪的认知错位，乃是那代人的通病。以立宪求团结与以立宪求富强一样，皆把立宪当作手段，而非目的，既为手段，一旦与愿景不合，随时可弃若敝屣。晚清立宪运动之失败，最大原因即在于此。

这个话题需要从一部电视剧说起。2003年，张黎导演的《走向共和》一经播出，即刻风靡，并且长久不衰，至今依然为人津津乐道。对一些受众而言，此剧直接刷新了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其功效，被比作拨云雾而见青天。不过，电视剧终究是艺术作品，大多情节都当不得真，倘若谈古论今，以之为据，不免贻笑大方。我曾遇见一例。有人谈义和团，竟把剧中慈禧的台词拿出来作为论据。话说《走向共和》第二十三集，大清君臣一同观看义和团表演刀枪不入的各路神功，在“天助神拳，扶清灭洋”的口号声中，慈禧点头说赏，私下却对荣禄说：“……刚才看的那些个鬼把戏全是假的，骗不了我。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可要是用好了呢，起码是几十万的人力，若真是外交上跟洋人崩了，真的打起来，他们至少也是能消耗洋人弹药的炮灰。可究竟如何，现在还难说的很哪。”

鬼把戏、炮灰云云，足见慈禧老奸巨猾、心狠手辣，正符合她留给国人的历史形象或成见。因此这番话，信之者众，被视作庚子国变期间慈禧政治心理的精准表达。不过，倘若足够了解慈禧其人及背后的历史，不免有些疑虑：以慈禧的知识素养，对列强的一贯态度，以及彼时彼刻中国北方的政治与思想氛围，她又能否识破义和团的鬼把戏呢？

转头来看史料。关于义和团的史料，繁多而芜杂，窃以为当优先选择亲历者的见闻，哪怕见闻有限，他们所拥有的历史现场感却至为宝贵，无可替代。庚子国变期间，张伯英在京供职，“时余正充正蓝旗官学汉教习，地址在东城新开路，学中即

为拳匪盘踞。一举一动，皆得其真。”[1]三十六年后，他为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题跋，抚今追昔，为之黯然。文中写道：

> 当（义和团）初起之时，朝廷未必以为然，及遣刚毅等赴涿州查看回奏，孝钦（慈禧）渐有活动之意，然尚未敢深信。嗣由庄王（载勋）请旨令大师兄上法入宫演习，孝钦亲自命枪不中，然后深信不疑。自时厥后，出入宫闱，无论何处，皆许自由行动，为所欲为，不可收拾矣！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者，洵不诬也。[2]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有《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毛边纸抄本一卷，不知作者为谁，也曾谈到慈禧检验义和团首领的神功，不过引荐人是刚毅和赵舒翘：

> 后荣相（一说是刚相）与赵尚书查办此事回京，与义和团首相遇，探闻其所学，大旨如前所传谣言，又从而张大其词。二人不察真伪，反将团首带领进京，引见太后（慈禧）。该团首在太后前，更口出大言。太后亦深信不疑，令在御前小试其技，亦有一二可观，试以枪弹，果不入。太后大喜，谓果恃以驱逐洋人，一抒夙忿。是以待之极优，饬令充当前队，继以官兵，

---

[1] 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61页。

[2] 同上，第662页。

与洋人开仗。岂知团匪为首者，稍有符术，如白莲教之类，其枪子不入之故，则系拳教金钟罩工夫，非有大异也。而大臣被愚，太后被惑，岂非天哉！[1]

如这二则史料所言，慈禧曾亲身检验义和团表演神功，不过结论与《走向共和》相反，非但未能识破“那些个鬼把戏”，反而对其“深信不疑”，并且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与洋人开战的本钱。

由此出现了两种说法，针锋相对，非此即彼，到底哪个更可信呢？我所见的史料，应以支持后者——即慈禧相信义和团

---

[1] 佚名：《综论义和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第163页。第一句所云“后荣相（一说是刚相）与赵尚书查办此事回京”，当以括号里的说法为准，刚相即刚毅，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赵尚书即赵舒翘，时任刑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管顺天府尹事；查办此事指去涿州调查义和团。此事来龙去脉如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1900年6月5日），朝廷派遣赵舒翘与顺天府尹何乃莹前往义和团云集的涿州（涿州在顺天府治下），名为安抚解散，实为察看虚实。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对赵舒翘评价极高：“赵则起家科第，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此儿戏鬼混之义和团能否成事，明白易晓，决不至于不能鉴别。”（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页）事实也是如此，“居刑曹十年，多所纂定”的赵舒翘到现场一看，即判定义和团“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拳民既无纪律，望之皆有死色，不可恃也”。不料刚毅随后赶到——刚毅为什么跟来了呢？作为朝中最早、最坚定的义和团拥趸，其心中早有定见，根本无须考察，他之主动请缨去涿州，则为控制局面，唯恐赵舒翘坏事——在其恩威并施之下（刚毅对赵舒翘有提拔之恩），赵舒翘不敢立异，只能顺从其意，一同“盛称拳民忠义有神术”。彼时朝堂之上，荣禄抱病请假（相蓝欣认为是“政治请假”），且遭排挤，刚毅一言九鼎，话语权最重，当他力荐拳民可用，“太后愈信之”。慈禧信之最深，事后清算，怨恨也是最大，把全盘罪责都扣到他们头上，“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刚毅于逃亡途中病故，赵舒翘被赐自尽。

神术——的居多。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慈禧召集御前会议，讨论义和团事。太常寺卿袁昶反对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开战："臣曾微服往交民巷，见匪中枪而死者伏尸遍地，并不能避枪炮，究不足恃。"慈禧则道："此系土匪，决非团民；若系团民，决不至中枪炮。"[1]足见慈禧对义和团神术的迷信程度。

此外如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云，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慈禧决意与列强开战，"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予内帑银十万两。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2]并在颐和园筑渐台，高二十余丈，名"鬼见愁"——鬼者，洋鬼子也。高树《金銮琐记》诗云："汉宫络绎召神巫，八阵纷陈元武湖。昨遇瑶池青鸟使，宣传阿母受灵符。"注云："李阉召义和团入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3]李阉即大太监李莲英，乃是义和团的忠实信徒，曾作团民打扮，留影纪念，常在慈禧耳边鼓吹义和团的神术，推波助澜，功莫大焉。诗中所谓灵符，系义和团一大法宝或骗术，相传信徒领取之后，便可刀枪不入。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云："……津团有捷音，佛心欢喜，命大阿哥向东南方叩谢，此团规也，可谓笃信矣。"（光绪二十六年

[1] 佚名：《综论义和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第164页。

[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页。庚子国变期间，李希圣在京任刑部主事，属于亲历者。《庚子国变记》系其根据日记改编而成，可信度甚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将其置于全书之首，足见推崇。

[3] 高树：《金銮琐记》，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139—140页。

六月十一日，1900年7月7日）[1]如此等等，皆为佐证。

正面之外，还可从侧面印证慈禧如何迷信义和团的神术。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慈禧性情，喜人奉承，因此揣摩她的心思、喜好等，成了大小臣工升官发财之道，其亲信如荣禄、奕劻等，都是此道高手。当她的爱憎有所表示，献媚者必趋之若鹜，添油加醋，唯恐不足。罗正钧《劬盦官书拾存》曾谈及王培佑发迹故事："五月十九日廷议用拳排外，王首请加奖励。召见，称臣家世精拳技，即臣姊妹亦谙习红灯照，历述其术之神奇。"慈禧闻之大悦，令其署顺天府尹。[2]此风一开，应者云集，数以百计，皆视义和拳为奇货，纷纷夸耀其神术。"御史徐道焜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言自谓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言二童子殆非人，至则教堂自焚，已忽不见。太后喜，大以为神人也，下其书，览示天下。群臣又时时言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灯之属，能役鬼神，烧海中船尽坏，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于是太后焚币玉，自祷祠之，而未尝

---

[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八），手稿影印本，第36页。

[2] 罗正钧：《劬盦官书拾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第364页。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王培佑所升之官，应为顺天府府丞，未及三月特擢为府尹。此事他是当事人，其记述更为可信。庚子年初，朝廷举行京察大典，顺天府府丞高燮曾奉旨休致，按例该他升授，他与荣禄商量，情愿让给胡孚宸。"……未几，吏部题本上达，文忠（荣禄）面请以胡孚宸升授。讵本内列名在胡之前者，乃工科给事中王培佑，日前因事召见，奏言拳民忠勇可用，颇蒙记注。两宫忽见其名，谓此人甚好。文忠承旨出，王培佑遂升府丞矣。到任未及三月，府尹出缺，竟邀特擢。所遗府丞一缺，仍归余顶补。"（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15页）

至。”[1]正应了袁昶和许景澄的感喟：盈廷惘惘，如醉如痴！

当然，确实存在一批史料，暗示慈禧对义和团的神术不无疑虑。她之所以起用义和团，更多是一种政治策略，其主旨不在神术而在人心。庚子国变期间，恽毓鼎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跻身朝堂，见证决策。据其记录，五月二十日御前会议，当袁昶“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慈禧则道：“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2]有人曾拿“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一句论证慈禧看穿了义和团的鬼把戏，不过我们要注意此言语境，“法术不足恃”其实是袁昶的观点，慈禧接过话头，随之转移话题，以人心取代法术，并不等于否定法术。从“若系团民，决不至中枪炮”云云，正可知她的立场。

后来慈禧对吴永说：

> 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

---

[1]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14—15页。李超琼《庚子传信录》亦云：“御史徐道焜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口，夷舰触龙背皆立沉，此天所以灭夷也。’……御史陈嘉言言：‘与关壮缪语，得篆文帛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并称“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第211—212页）。洪钧老祖，古代神仙，太上老君之师；关壮缪即关羽，死后追谥壮缪侯。

[2]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61页。

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其势汹汹，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一般，全改了平日间的样子。载滢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杠，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1]

这番话虚实参半，需要分辨。慈禧说通过义和团“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使她幡然醒悟，“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前面三事顺序有误，火烧正阳门最早，发生在五月二十日，恰在当天，她还表态“若系团民，决不至中枪炮”，此后一误再误，终而向列强宣战。宣战之后，才有攻打东交民巷使馆、西什库教堂等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98—99页。

事，屡战而屡败，硬生生把她打醒。在此还可观察吴永的反应。他一面称之为“事后之谈”，即马后炮，一面不得不为慈禧开脱：“试想彼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手足耳目，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欢呼盲进，意兴勃勃。他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为洋人交涉受了多少委屈，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即自谓尚有主意、未尝放手云云，事实具在，亦不能谓之尽诬。”[1] 从“易于迷信”“不能谓之尽诬”这些暗藏机锋的话来看，对于慈禧的“事后之谈”，吴永心底终究不以为然。

这些史料，正反兼具，共同指向一点：《走向共和》的论调，显然高估了慈禧的眼睛和头脑。真相则是，慈禧既相信义和团的神术，“认为拳民神术可靠，定能消灭洋人，正可大张挞伐，一决雌雄”。[2] 同时有意以之为炮灰——这二者并不矛盾——不过这首先需要她自己作为炮筒子，她与义和团，已经相互捆绑。

由此再来说慈禧的知识结构，与义和团正有相通之处。慈禧一生，从未受过系统教育，无论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其知识来源相当驳杂，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此中最重要的一端，乃是戏剧：慈禧堪称资深戏迷，对戏剧的热爱也许仅次于对权力的热爱。与此相应，如柯文（Paul A. Cohen）、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等研究者指出，戏剧也是义和团的知识

---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 101—102 页。宫阃（kǔn），即后宫。

[2]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73 页。

库。[1]在时人眼里，义和团“装束一如剧中之武生”“语音似戏场道白”。[2]时任河北怀来县知县的吴永曾与当地义和团打交道，其记载详尽而生动：

> ……良久，左座一人忽面目抽掣，欠伸起立，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不知县太爷驾到，未能远迎，面前恕罪。”语甫竟，右座一人亦如法起立，曰：“吾乃吕洞宾是也。”左者即向之拱揖，曰：“师兄驾到，有失远迎，恕罪。”右者亦拱手曰：“候驾来迟，恕罪请坐。”左者复曰：“师兄在此，哪有小仙坐位?”右者曰：“同是仙家一脉，不得过谦。”左者曰：“如是一旁坐下。”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几欲为之捧腹。[3]

除了装饰、话语等，义和团所信奉的神灵，《义和团大辞典》列为四种，其一即“小说戏曲中的英雄豪杰，如刘金定、樊梨花、鲁智深、武松、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杨香武等”。[4]郭则沄《庚子诗鉴》曾描述义和团作法情景，将所附体

---

[1]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路云亭：《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年间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等。

[2] 柴萼：《庚辛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307页。

[3]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32页。

[4] 廖一中主编：《义和团大辞典》，转引自止庵：《神奇的现实》，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

的神灵归之于戏剧："习拳者持咒面东南方，三诵而三揖，即昏绝于地。顷之手足伸屈，口作长歔，一跃而兴，舞蹈不已。问其名，则关平、武松、孙悟空、黄天霸之类，皆戏剧中习见者。"[1]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则探析其源头，称义和团最爱神剧："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坛，所奉梨山圣母、孙悟空等，皆剧中常现者。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2]

我看过慈禧的戏单，虽也有《蟠桃会》等，神剧却非主流。不过，她所信奉的神灵，与义和团一样杂乱无章，堪称多神教或泛神教。从这一点上讲，她的信仰体系，亦与义和团相通。举其要者。一是关公。满族人素有关公崇拜传统或情结，慈禧概莫能外。宫中演剧，只要关公上场，她必离座，假装散步，以示对关公的尊敬；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她从陕西回北京，途经洛阳关林，还曾去拜谒一番。二是观音。据德龄回忆，慈禧每天都要礼拜白玉观音，颐和园中有一座宝塔，塔

---

[1]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第 33 页。龙顾山人系郭则沄之别号。

[2]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上海：上海书店，1982 年，第 14 页。罗惇曧晚号瘿公，以号行，他与李希圣应为好友，曾有"亡友湘乡李希圣亦元"等语，其所著《庚子国变记》一卷，大抵取材于李著，不过多有议论，如引文一段，则为李著所无。吴永则认为，戏剧源自小说，后者才是根本："北方人民简单朴质，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说与戏剧之两种观感。戏剧仍本于小说，括而言之，即谓之小说教育可也。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故各种教术之统系，于北方为独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 166 页）

中供奉观世音菩萨，“每当太后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即求于观世音菩萨，据说很是灵验”；可为佐证的是，慈禧拍照，常常扮作观世音菩萨，身后高悬云头状牌，上书“普陀山观音大士”，李莲英在一旁扮作韦陀天尊或散财童子，格格和宫女扮作龙女，以为烘托……如史料所示，关公和观音，都是义和团最尊崇的神灵，至于观音附体、转世云云，则是义和团最擅长的把戏。

知识与信仰的相通，使我想起两句名言。一是《吴宓日记》记载的陈寅恪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1]这句话曾被拿来论断慈禧与义和团。事实上，上诈的同时也愚，下愚的同时也诈，譬如慈禧会迷信义和团的神术，可见其愚，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反而不把神术当回事，打仗拖在队尾，驱使信徒作炮灰，可见其诈。二是后世的一个说法，譬如论某一节史事，称“上面是慈禧，下面是义和团”，这里的上下，我更愿意理解为一种同构关系。说白了，慈禧与义和团本是同道之人，同根相生，同气相求，同流合污，无足为怪。倘若把慈禧置于庚子年中国北方的乡村，她极可能加入义和团，也许还会成为红灯照的领袖呢。

慈禧晚年，对迷信并利用义和团一事悔之莫及，曾对人说：“平生无过举，惟庚子事如玉之有瑕。”[2]她却忘了，自己不

---

[1] 吴宓：《吴宓日记（1936—193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8页。原文云：“……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七七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偏安苟存。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1937年7月14日）

[2]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第30页。

是玉，而是瑕。

四、慈禧的政见

王照成名于戊戌变法，其时官居礼部主事，一折导致礼部六位堂官（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被皇帝罢免，震惊朝野。论派系，属于维新派，不过与康有为、谭嗣同等激进一脉并不合拍，他倾向渐进，曾规劝康有为："……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却遭康有为反唇相讥："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1]政变之后，他流亡日本，曾与木堂翁（犬养毅）笔谈，对于变法，有一极精辟的考语："总之敝邦之政变，荣刚及守旧党皆误国者，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2]这倒不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变法失败，维新派实难免责，"庸医杀人"一说，简直字字如刀，康有为们也许未必是庸医，所开出的药方却堪称虎狼方。

对戊戌变法的反思，持续到王照晚年。1927年夏秋之际，他作《方家园杂咏纪事》二十首——"方家园者，京师朝阳门内巷名。慈禧、隆裕两后母家所在也。恭忠亲王奕䜣曾言，我大清乃亡于方家园。"[3]——谈及戊戌旧事：

---

[1] 王照：《小航文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9页。

[2] 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3页。

[3]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79页。

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英之维多利亚即贪财，英人让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争买卖之故。此等内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1]

文中“景皇”指光绪帝，“二妃”即其妃子珍妃、瑾妃，“权利”系权力与利益合称。“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一语，乃是王照的名论，著述当中，常见踪迹。如其晚年为《戊戌六月礼部代递奏稿》作眉批云：“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2]

那么，慈禧是不是“绝无政见”呢？这则取决于我们怎么定性政见。若以流行的主义、思想、理论等为标准，慈禧的确没有什么政见，不消说慈禧主义、慈禧思想，甚至连一句响彻云表的政治标语或口号都未流传下来。有些名言，纵然冠于她的名下，如“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云云，实则与其毫无关系，或者被断章取义。譬如前一句，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作者应是刚毅：“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常语人曰：‘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吾有产

[1]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第83—84页。

[2] 王照：《小航文存》，第37页。

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1]而且，以《戊戌政变记》的政治品质，刚毅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只怕都成问题。后一句出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上谕，虽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考虑到当时皇帝形同“默然痴坐”的木偶，端由慈禧在背后发纵指示，因此视作她的声音，亦无不可。问题在于，结合上谕内容及台前幕后的行动，可知“量中华之物力”之量，意思不是尽量，而是考量，如要求“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审度情形，妥筹磋磨，补救一分是一分耳”，并期盼“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这么一说，可知为了妖魔化慈禧，此言如何被扭曲，其主旨不是卖国，而是减损，所表现的不是媚态，而是苦衷。[2]

倘若放宽对政见的定义，慈禧则非“绝无政见”，她的政见十分鲜明：实用主义（在一些人眼里，实用主义以利益为中心，随利益而转移，实在谈不上什么政见，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政治无关是非，只有利害，就此而言，实用主义乃是最好的政见）。其核心自然也是利益，论外在表现，则与一般实用主义有所不同。她的种种转向，与时俱进（退），重心在于紧跟时势：中日甲午战争，起初她对主战并无异议，中途见势不妙，

---

[1] 刚毅之言出自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三篇“政变前记”之开端，不过中华书局影印版《饮冰室合集》所录《戊戌政变记》一书并无此节，应为梁氏事后删削，由此愈发可见此言——以及醇亲王那句“吾国之兵，将以防家贼而已，非以御外侮也”——之不可信。

[2] 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新解》，《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8—133页。

立即转向主和；她扼杀了戊戌变法，两年后推行庚子新政，无论力度、广度、深度，相比前者，皆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一度迷信义和团的神术，被列强打醒之后，迅速与义和团切割并痛下杀手……要言之，今天的时势需要白脸，她便唱白脸，明天的时势需要红脸，她便唱红脸，翻脸比翻书还快，从不在乎打自己的脸——她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权力与利益。

明确了这一点，再看“但知权利，绝无政见”。不管是否承认实用主义是一种政见，这句话都可成立。以此论断戊戌变法，以及慈禧与光绪帝之争，亦无问题。作为一个唯利益论的实用主义者，慈禧对变法毫无成见，如陈夔龙所云“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她对变法的态度转换，“徒以利害切身”[1]：变法能强化她的利益，她便支持，将损坏她的利益，她便反对。故此，如何解决变法与慈禧的利益之纠葛，才是最大难题——王照献策“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所给予的只是名义，未必能中慈禧下怀。

有成见的不是慈禧，而是一些戴上了政治有色眼镜的国人。他们从结果逆推原因，认为慈禧作为刽子手，残忍扼杀了戊戌变法，从而判定她从一开始便反对变法。如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云：

> 至廿三年（1897年）冬，德人占据胶州，上（光绪）益忧惧，至今（1898年）春，乃谓庆王（奕劻）曰：“后若仍不给

[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19页。

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庆邸请于太后，始闻其怒，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庆力劝，始允曰：“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1]

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引用率极高。不过我始终以为，苏继祖此书可信度不该高估。作者虽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却非戊戌变法的局中人，变法期间，他也不在北京，加之一生潦倒，仕途止于小吏，眼界与见识十分有限，以致他的著述，号称“数旬访询，反复考核，采之都中上下口吻，证之京津先后见闻”[2]，却充满耳食之言和皮相之谈，矛盾与错谬之处所在多有。拿这段话来说，第一，光绪帝亲政之后，对慈禧实行“事后报告制度”[3]，手上不缺事权或话语权，如其一怒之下直接罢免礼部六位堂官，慈禧事后知闻，无可奈何，足证权力之大，“后若仍不给我事权”一说显然不当；第二，以光绪帝的柔懦，加上对慈禧的恭顺与畏惧，只怕不敢以“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来悍然叫板；第三，戊戌政变之前，光绪帝与慈禧的关系，并非如后世夸张的那般紧张、敌对，俨然势不两立，

---

[1]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 同上，第5页。

[3] 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将“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总结为“事后报告制度”：“在政变以前，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其作出的相关决定，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呈送慈禧太后并报告处理意见。这当然也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7页。

慈禧还不至于说出“我早已不愿他坐之”这样的狠话。苏继祖凭借自己的政治臆想，以及对光绪帝的忠诚（书中一直为光绪帝叫屈），虚构了这番对话，未免看低了慈禧。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亦载有慈禧与光绪帝关于变法的对话，虽似虚构，窃以为更能代表慈禧的心声：

> 后（慈禧）尝告德宗（光绪）：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1]

这两句话，不难找到印证。首先，发端于同治初年的洋务运动，虽由奕䜣、文祥、宝鋆等主持，慈禧则居领导之功，至少未从中作梗。戊戌年中，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曾与光绪帝最信任的朝廷重臣，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的张荫桓谈及慈禧：“太后原本即是喜欢革新派之人，故皇帝翻然归向革新之说，可使皇帝与太后之亲情更加密切……”[2]言下之意，论变法，慈禧乃是先驱，光绪帝则为后进，后进向先驱靠拢，正有助于团结。

---

[1]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许指严等：《史说慈禧》，第419页。

[2] 转引自茅海建：《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戊戌变法史事考》，第477页。顺道一说，王照称“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是王照误会了，外人对于慈禧的政见，并无多少误会。除了矢野文雄，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云，那些声称“太后敌视变法”的论调毫无根据或过甚其辞，他还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这则可呼应王照的论断。

其次，慈禧要求光绪帝不可像日本那样“更衣冠，易正朔”，以免“得罪祖宗”。这一点可参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慈禧之言：“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1]为变法划出边界，无可厚非，结合当时国情，恰可见慈禧的政治成熟。此外，《慈禧传信录》还记道，光绪帝曾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呈慈禧，“后亦称其剀切，第戒帝勿操之过蹙而已”。[2]这也是一说，可参周馥自编年谱：“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属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3]又如张权致其父张之洞信中云：“刘博丈（刘恩溥）言，今上变法甚急，慈圣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俱不看，但云：‘随他闹去罢。’”（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4]前后两种论述的差异在于，一者认为慈禧把变法的边界定于祖制（传统），一者认为定于方式，提醒光绪帝不要操之过急。

这两点之外，《慈禧传信录》还记载了一句慈禧说与光绪帝的话：“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5]其言如此，其行亦然。戊戌变法一名百日维新，始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终于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可以断言，至少在八月初三以前，慈禧非但不曾制约光绪帝分毫，反而给予了

[1]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第22页。

[2]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许指严等：《史说慈禧》，第419页。

[3] 周馥：《周馥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211页。

[4] 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5]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许指严等：《史说慈禧》，第420页。

他足够的支持和加持。譬如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变法开启。查《清实录》和《光绪帝起居注》，诏书发布前三天，光绪帝一直与慈禧同住颐和园，朝夕相见，变法决策，必定二人合力而非一方抉择。再看翁同龢当天日记："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 6 月 11 日）[1]——"上奉慈谕"，上即光绪帝，慈即慈禧，这足见变法意向之合；"今宜专讲西学"，足见变法决心之坚。

那么，慈禧何以从支持变法的推手，变成了扼杀变法的刽子手呢？此中关节，端在权力与利益的此消彼长。她同意变法，因为变法有助于巩固或扩大她的权力与利益；若不变法，帝国势必走向衰亡，其权力与利益则岌岌可危。这一点，连苏继祖都不否认："然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2]但是，当变法推进到一定地步，她发现，其权力与利益的损失，将远远大于收成，这不由得她不紧张、愤怒，最终拍案而起，一场血雨腥风随之袭来……

有人读到这里，也许会问：难道慈禧不知道，一旦变法废止，她的权力与利益终将受损吗？这正折射了实用主义者的最

---

[1]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 6 册，陈义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3122 页。

[2]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第 4 页。

大困境，奉行利益至上，往往缺乏大略，以致只顾眼前的利益，无法望见长远的利益。我们说过，慈禧一生，局促于幽深的宫闱，无论胸襟还是视野，都以狭隘著称。她固然擅长追随时势，然而晚清国运，每况愈下，哪怕与时俱进，只是得过且过。其工作，无非拆东墙补西墙，勉强涂饰，敷衍一时，有时因西墙缺口太大，把东墙全拆了都补不了。照此说来，李鸿章的自况或自嘲，同样适用于慈禧：裱糊匠。

论李鸿章

时势与英雄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梁启超挽李鸿章[1]

一看李的全集，我们只看见作事，看不见为人。

——蒋廷黻《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2]

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

——蒋中正序《亦云回忆》[3]

---

[1] 梁启超：《李鸿章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4页。

[2] 蒋廷黻：《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氏著：《中国近代史》（彩图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57页。

[3]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第1页。

一、《挺经》疑云

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曾国藩的孙女婿。作为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李鸿章对曾家子弟一向厚待。若非沾老婆的光，以吴永之才具，哪怕由李鸿章所亲信的幕僚、翻译罗丰禄推荐，未必能入鸾翔凤集的李鸿章幕府，遑论“以通家子弟相待”——所谓通家，即两家交好，如同一家——“督励而训诲之者，无所不至”。[1]吴永追随李鸿章，应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晨夕左右，几逾一载”，那正是李鸿章一生最失落、潦倒的一段岁月，被梁启超命名为“投闲时代”，而且是“闲之又闲者”。[2]如其自述：“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

---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19页。吴永娶曾纪泽次女曾广珣，曾纪泽另有长女曾广璇，嫁给了李鹤章（李文安三子，李鸿章大弟）之子李经馥，由此论起，吴永与李鸿章的侄子乃是连襟关系，二人之间又多了一层亲缘。此外，李鸿章幕府人才济济，不过更侧重实用。王尔敏《淮军志》曾对比曾国藩与李鸿章幕府：“李鸿章出身湘军幕府，于同幕人才，盛加称道，曾为诗云：‘满堂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对于湘幕地位，可谓崇誉备至。及其自组幕府，规模却远不能及。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各类人才荟萃，鸿章幕府，则仅注意实用。其所罗致专家，首重经纪庶务之才。因此淮军幕府多精明练达之士，而绝少道学先生，即文学侍从之臣，亦不多见。此自与鸿章个人性格有关。援沪之始，即曾函告曾国藩：‘人人皆劝请幕友，鄙性向看不起老幕。现随营诸友，惟凌筱南同年焕尚可帮忙，余皆不了了。’可知传统的官衙幕宾，本不在其所取之列，而延揽人才，当亦必经其主观的选择。”（王尔敏：《淮军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2页）吴永虽能做事，不过还谈不上精明练达，而以朴实见长。

[2]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89页。

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又曰：“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1]闲居于北京贤良寺中，门前冷落车马稀，年过七十的李鸿章终于有了些老人的气态，常与吴永抚今追昔，感旧之哀。最感念的故人，便是他口中的“我老师”、吴永的“太丈人”曾国藩。

李鸿章曾与吴永说起曾国藩的《挺经》：

> 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19—120页。

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云云。[1]

李鸿章只说了一条，再不言语。吴永催他，他含笑挥手曰：“这此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当时吴永不甚明白，事后仔细推敲，感慨道：“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词，究不知以下十七条，尚作何等语法也。”[2]

既名《挺经》，主旨自然是“挺”，宁思一时进，莫思一时停，有进无退，宁折不弯。如这个故事所示，老翁好言商量，对方寸步不让，老翁挺身而上，对方知难而退。[3]吴永的感悟，分作局外与局内，强调躬身入局，虽也可取，终归离题万里，由此正可见其资质之平常。而且，他还在期待后面十七条教诲，恐怕上了李鸿章的当。

首先，“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经》，世多知之”，[4]有无动笔，则成疑问。遍查其文集、书信、日记等，并无蛛丝马迹残

---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 123—124 页。

[2] 同上，第 124—125 页。

[3] 黄濬认为这个故事的主旨是刚柔并济：“据此，则《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唯老翁肯具俯身解袜之心，则亦不失挺身负责之刚也。”（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360 页）

[4]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第 359 页。

留于世。友朋当中，似乎只有欧阳兆熊提到“（曾国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1]，“欲著”二字极其扎眼。如今市面之上流传的《挺经》，一览即知出自后世编撰，甚至杜撰，乃是伪书。与此相应，还有一本曾国藩谈相术的《冰鉴》，也是不堪入目的托名之作。退一步讲，哪怕作为秘传心法，不立文字，口耳相接，我只见《庚子西狩丛谈》所云这一例，可谓孤证——历史学讲究孤证不立，罗马法谚语亦云：“只有一个证人等于没有证人。”吴永是老实人，想来不会说谎，李鸿章一向天马行空，不拘小节，完全可能代老师立言，至少十八条云云，当不得真。

其次，纵观曾国藩一生行事，论成功秘诀，与《挺经》的关系，则在两可之间。其早年的确锐意进取，时常挺上一挺。譬如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867年1月15日）夜，他致信曾国荃，回首往事，以身说法：“……李申夫（李榕）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2]这番话自是正理，符合《挺经》大义，可惜不尽属

[1] 欧阳兆熊：《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

[2]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70页。

实。事实则是，信中所言靖港之败、湖口之败，这两场败仗都导致曾国藩心灰意冷，投水自杀，狼狈之状，被左宗棠讥为“猪子”，远远谈不上他所标榜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咸丰七年、八年（1857、1858年），曾国藩因父丧在家守制，大悔大悟，迎来欧阳兆熊所总结的人生第三变，从此转向黄老之学，不再讲挺，而讲究退、忍。[1]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时在咸丰八年底，曾国藩要授予他秘传心法，则不该是《挺经》，而是《忍经》。当然，有人把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等事理纳入《挺经》，不是不可行，只是这么一来，《挺经》变成了百宝箱，世间万物都可以往里装。

相比曾国藩，李鸿章显然与《挺经》更加亲近。他这一生，若用一个字来总结，毋宁正是“挺”字。这一点，《清史稿·李鸿章传》曾予官方认证，并拿曾国藩作对照：“（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2]如史书所言，甲午战败，和约签订，清议大

---

[1] 欧阳兆熊云：“曾国藩一生凡三变，其书法，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庭坚，晚年学李邕，而参以刘墉，故而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一变为程朱之学，二变为申韩之学，三变为黄老之学，知其雄而守其雌，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第17页）

[2]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021页。恝（jiá）然，冷淡之意。此节似出自袁世凯撰《李鸿章颂德碑》：“（李鸿章）早贵至于晚岁，历常变夷险，未尝一日言退，疾病亦不轻请假。中东约定，论者犹未已，所亲有劝归者，公谓：‘此身于国家有不能恝置之谊。’”恝置，犹言淡然置之，置之不理。

哗，举国喊杀。大哥李瀚章见状，给弟弟写信，相约一同告老还乡，息影林泉，“鸿章自念柄用久，当与国休戚，不敢归难后人。”[1]这一挺，便是五年。到了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两宫仓皇西狩，国难思良将，板荡识忠臣，国人终于意识到，唯有远在南方的李鸿章出山才能收拾残局，“全国人士皆知扶危定倾，拯此大难，毕竟非公莫属。”[2]刘坤一催促李鸿章北上的电文措辞痛切到无以复加：“……宗社安危，全在中堂一人。中堂不到京，不能会议。事局非惟难定，且虑各国改易初心。千里蒙尘是何景象，各省无所适从是何危急！惟公念四朝恩遇之隆，两宫倚畀之重，同僚推许之切，天下仰望之殷，迅速北发，拯溺援焚，不胜泣祷。”[3]对此，李鸿章离开广州之时

[1] 李鸿章：《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两广总督李勤恪公墓志》，《李鸿章全集》第37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页。此文又见《吴汝纶全集》第一册，似为吴汝纶代拟。说到吴汝纶，则须另起一笔。话说李鸿章一生并非“未尝一日言退”，《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曾有引退之思，与幕僚吴汝纶谈及，吴汝纶则劝其不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896年1月28日），他致信李鸿章云：“……前承燕语，拟俟日本商约定议后，即欲请老南归。某妄意吾师近日所处，与前不同。前时当大有为之任，而迫以不能有为之势，徒为不知己者诟厉，不如遽释重负，以自适其适。近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向之忌嫉诋娸者，亦已志得意满，而相安于无事，似可无烦乞去，转涉悻悻者之所为。又况位尊望重，有道大莫容之虑，设有闾里小事，牵涉府中厮养，复遇孙佩南之流故与相持，非计之得也。某愚见为函丈熟筹，以为不如养安京辇，师长百僚，平时虚与委蛇，追东山绿野遗躅；一遇险难，群公错愕相顾之会，犹可时出绪余解纷排患，自效其忠荩为国之素，此公私两益之策也。区区愚虑，不识有当否？”（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112—113页）事态之发展，果如其所言。

[2]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19页。

[3] 刘坤一：《复李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刘忠诚公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82—83页。

也曾大发感慨："当今之世，舍我其谁！"[1]这才是《挺经》的风采。

关于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别，可以围剿捻军为例。剿捻起初由曾国藩主持，他主张"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中原战地，流寇驰骋，坚壁清野，自是正道，不过注定了一场持久战，最需时间和耐心。曾国藩只支撑了一年半，受不了各方压力，"念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2]，主动告退，这毋宁违背了《挺经》的主旨。李鸿章接手，不管战略还是战术，几乎都师承"我老师"，最大区别在于，"迭奉严旨而夷然顺受，果毅不挠"，遇到压力，敢于挺上一挺——持久战的要义，恰在一个"挺"字——挺了一年半，终于大功告成，先灭东捻，后杀西捻，逼捻军首领张宗禹投水而死（一说突围而出，从此隐姓埋名）。按《清史稿》，剿捻战略如"防河之策"，"皆国藩本谋也"，然而最终收功的却是李鸿章。这里面，除了天命或运气，与个人性情不无关系：一者知难而退，一者知难而进。由此不妨断言：曾国藩可能是《挺经》的作者，李鸿章无疑是《挺经》的行者。

李鸿章的《挺经》，第一表现为进取。毋庸讳言，他是功名之士，对权力极为热衷，曾对吴永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

---

[1] 李岳瑞：《悔逸斋笔乘》，孙静庵、李岳瑞：《栖霞阁野乘·悔逸斋笔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2]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9册，第11915页。

君，安能不热中耶？”[1]这番话也是正理，要报国，当做事，要做事，当有权，追逐权力，如老话所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也。像李泌《长歌行》所表现的那样自信而坦荡，反而叫人无可指摘：“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与李泌一样，李鸿章少怀鸿鹄之志，二十岁进京，作《入都》诗十首言志：“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己有殊恩。”“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趁少年时。”……[2]功名之心，溢于言表。后来曾国藩调侃门下弟子，云：“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李鸿章号少荃，俞樾字荫甫。“拼命做官”四字，道尽了李鸿章在权力场中一往无前的气概。入仕以来，除非被贬，几乎从不言退，甚至不屑以辞官相要挟。非但自己如此，他还以此教训后辈。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侄子李经羲（李鹤章之子）任广西巡抚，旋调云南巡抚，因云南财政艰困，有畏难之意，李鸿章致电训诫道：“汝体气素孱，眠食失常，良念。惟余垂八十，尚不敢以衰疾言退，壮年称疾，即非畏难、畏死，谁则信之。变法尚未定，滇当因地制宜，直抒所见。疆臣论事，必期切实可行，勿蹈浮夸、迂谬之习。”[3]要指出的是，李鸿章拼命做官，却非官迷，他追逐权力，则因需要掌权来做事。三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他这辈子心志都在立功。

---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26页。

[2] 李鸿章：《入都》，《李鸿章全集》第37册，第69—70页。

[3] 李鸿章：《寄滇抚李经羲》，《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58—259页。

第二表现是担当。梁启超对比曾国藩与李鸿章，称前者“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后者一大特长，即“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慨。[1] 吴汝纶为李鸿章作神道碑，有“公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之赞词。[2] 日本人德富苏峰亦云，李鸿章从不畏避责任，这是其最不可及之处，哪怕有时明明与他无关，一旦落到身上，皆当之而不辞（即今人所云“背锅”），这则可见他的大气。[3] 举例来说。甲午战争之后，有一天奕䜣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断然答道：“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奕䜣嘿然而罢。[4] 这是替袁世凯背锅。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召见李鸿章，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与康有为本无交情，反而有隙，犯不着为其说话，不过他强烈不满由维新转向守旧的政治风气，遂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

---

[1]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 107 页。

[2] 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铭》，《吴汝纶全集》第 1 册，第 215 页。

[3] 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第 116 页。

[4] 王伯恭：《蜷庐随笔》，王伯恭、江庸：《蜷庐随笔·趋庭随笔》，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25 页。马关和谈期间，李鸿章也曾回护袁世凯。如第一次会谈结尾，伊藤博文问：“……请问袁世凯何在？”李鸿章答：“现回河南乡里。”陆奥宗光问：“是否尚在营务处？”李鸿章答：“小差使无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0 页）

逃，实是康党！”如此强悍，反而令慈禧默然。此外他在京城还常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1]这是帮康有为声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络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反对立溥儁为储君，“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2]大大得罪了慈禧，遂遭通缉，被迫去澳门避难。南下逃亡途中，赵凤昌托人向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求情，请其高抬贵手，在广东地界放经元善一马，李鸿章答：“我决不做刀斧手。”“此语真爽快，使人放心……”[3]这是护经元善出逃。

第三表现为坚忍。空有进取和担当，倘使不够坚忍，终难结出正果。裱糊匠之外，李鸿章还有一个罕为人知的自况：撞钟之和尚。俗话讲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形容人得过且过，敷

---

[1] 孙宝瑄：《孙宝瑄日记》（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82页。此条录自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1900年1月12日），孙宝瑄系孙诒经之子、孙宝琦之弟、李瀚章之婿，即李鸿章的侄女婿。是时李鸿章南下赴任两广总督，途经上海，曾与孙宝瑄私谈，故有此记。称李鸿章与康有为有隙，则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沈曾植、文廷式、陈炽等发起强学会，李鸿章有意捐款二千两白银，不仅被拒，还遭讥嘲。他咽不下这口气，在出访欧美之前曾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书》）此外，他对康有为变法并不看好，曾在致长子李经方信中吐槽：“学堂之事，上意甚为注重，闻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工商等事，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言听计从。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借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1898年8月16日）

[2] 经元善：《上总署转奏电禀》，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1页。

[3] 赵凤昌：《经元善通电收回立大阿哥成命经过》，转引自刘忆江：《李鸿章年谱长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88页。

衍度日。李鸿章则反其意而行之，曾表态“当永为撞钟之和尚，不复作还俗退院想耳”，即在位一日，便苦干一日，坚忍一心，日拱一卒。[1]试看光绪元年（1875年）他写给郭嵩焘与丁宝桢的两封信：

> 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即修炮台，添防兵，绝非可云抵御。尊论欲求制胜，朝廷之计似更茫如捕风，我辈只有尽所能为，其所不能为者，天数、人事之穷，无如何也。（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一日）[2]

> 总之，时势至艰，物力至窘，实不足办此大事（指创立水师）。我辈身当其境，只有量力经营，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而已。（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五日）[3]

李鸿章对于晚清的国情与时势，有极明澈的洞察。后人赞美郭嵩焘为“近代清醒看世界的第一人”，与郭氏互为知己的李鸿章庶几近之。困局之中，清醒者往往悲观，悲观者往往无力，

---

[1] 引言出自李鸿章《复刘仲良制军》，《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65页。此信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其时甲午战争败局已定，刘仲良即刘秉璋，时任四川总督，作为淮军名将，受李鸿章牵连，遭弹劾而罢职，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遭遇也是如此。针对刘秉璋来信“火气满纸”“乞身之疏又上”，李鸿章表示“吾守不闻不见要诀，来函亦谓此为上乘禅，当永为撞钟之和尚，不复作还俗退院想耳”。盛宣怀曾撰联语云：“儒者一出一入有大节，老僧不见不闻为上乘。”

[2] 李鸿章：《复郭筠轩廉访》，《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92页。

[3] 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95页。

李鸿章则不然，进取与担当精神，鼓舞他奋然前行，“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曾国藩语），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尽所能为，听之天数——即“尽人事，听天命”，此言之主旨当在前三字——正是坚忍的要义。

关于李鸿章的坚忍与《挺经》的关系，吴永讲过一个小故事。话说李鸿章落难贤良寺，袁世凯曾来拜访，云：“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话未说完，李鸿章大怒，呵斥道：“止！止！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此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事后他告诉吴永：“……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1]

最后一点表现，只能说无奈或无赖。马关和谈期间，日本漫天要价，李鸿章做好了谈判破裂、苦战到底的最坏准备，曾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28页。

垂泪对美国顾问科士达（John Watson Foster）说："……万一日本不答应，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作长期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抵抗日本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1]——数十年后，抗日战争之持久战，大致同此思路。虽然日本人如伊藤博文十分尊重李鸿章，然而败国之臣，谈判桌上寸步难行。等到最后一次会谈，一向豪气干云、视金钱如粪土的李鸿章，忽然变成了斤斤计较的小贩，向伊藤博文苦苦哀求道："日前临别时，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现有新报一纸在此，内载明贵国兵费，只用八千万，此说或不足为凭，然非无因。""请让少许，即可定议，当电明国家志感。""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2]这艰难一幕，读之简直令人落泪。

更不幸的是，时隔数年，悲剧重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奉命进京议和，自广州登船，南海知县裴景福等送行，问道："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当如何办法？"李鸿章答道：

> （列强）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忿，先以此二者要我，而后注重兵费偿款，此势所必至也。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

[1] 窦宗仪：《李鸿章年（日）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09页。稍后刘坤一亦有持久战之议："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

[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第46—48页。

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1]

撞钟之和尚，再次现身，不过这一回表达的不是坚忍，而是颓丧。我读李鸿章，从未见他说过这般消沉的话。如裴景福所云："公生平坚忍倔强，虽处甲午乙未之变，从容镇定，未尝以郁闷之色示人。及庚子难作，每深谈时事，便泪含于眶，气之衰痛之剧也。"[2]至此可知，《挺经》再挺，李鸿章的骨头再硬，终究不敌陆沉的国运。

二、"汉奸"问题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是一副无情对，上下联内容全不相干。上联所云杨三，本名杨明玉（一作鸣玉），兄弟辈中排行第三，故称杨三。他唱昆曲，演丑角，一般称昆丑，因昆曲起源于苏州昆山，有苏昆一派（昆曲曾分京昆、苏昆、高阳昆三派），又称苏丑。同治、光绪年间的戏剧界，有"同光十三绝"之说，其中仅两个丑角，一是京丑刘赶三（刘保山），二即苏丑杨三。"杨三已死无苏丑"，意在赞誉杨三的苏丑表演臻于化境，堪称绝唱，只怕后无来者。下联所云李二，即李鸿章，兄弟六人，排行第二，故称

---

[1] 李岳瑞：《悔逸斋笔乘》，孙静庵、李岳瑞：《栖霞阁野乘·悔逸斋笔乘》，第154页。

[2]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转引自刘忆江：《李鸿章年谱长编》，第669页。

李二。他不仅被骂作汉奸，还被斥为“清末第一汉奸”，与古今中外的各大汉奸如秦桧相提并论。杨三与李二对照，关乎一段以讹传讹的史事，正须一一道来。

淮军名将刘秉璋四子刘体智《异辞录》云：

> 平壤之败，诏夺文忠（李鸿章）三眼翎，褫黄马褂。次日，伶人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其时勤恪公（李瀚章）子经楚佑三明保入都，市井无赖怨赶三者，假佑三名，俟其出，执而鞭之，赶三寻死。余尝戏问佑三弟叔云云：“令兄奈何辱死名伶?”叔云曰：“谓吾兄杀人者，未免誉之过甚。吾兄闻淮军败，傅相受斥，正不知匿于何所矣。”余亦为之失笑。[1]

伶人赶三，指刘赶三。文中交代，那天上演的剧目叫《丑表功》，这是京剧而非昆剧，所以演丑角的应是刘赶三而非杨三。张伯驹曾有诗赞刘赶三：“骂世敢嘲李合肥，方巾难演是耶非。赶三一死无苏丑，唯有春山唱打围。”注释云：“清末前，戏班皆昆乱兼演，老辈无不能昆者。苏昆以丑角特见优，故乱弹班亦极重苏丑。庚子前以刘赶三最有名，刘一日演戏嘲及李鸿章，有‘拔去三眼花翎’一语，而受责罚。甲午后，李一力主和，士大夫轻之。赶三病卒，有人为联嘲李云：‘赶三已死无苏丑，李二

[1] 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0页。此书作者一说刘秉璋长子刘体仁。

先生是汉奸。’一时传之。”[1]按张伯驹之说，刘赶三出身京昆，演丑角亦称苏丑。不过以赶三对李二，显然不如杨三工整。

此中另有一个问题。刘赶三的死期，一说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一说七月初十日（8月10日）；李鸿章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被光绪下旨“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交部严加议处”，则在八月十八日（9月17日）。这三个时间点一列，可知问题出在哪里。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之时，刘赶三已经过世了，绝无可能上演《丑表功》，“骂世敢嘲李合肥”。刘体智、张伯驹所记皆误。

照此说来，故事的主角应非刘赶三，然而判为杨三，于史无征。好在既为无情对，当是闲人手笔，“杨三已死”与“李二先生”本来不必发生关系，生搬硬套，凑足故事，反而显得不解风情。且让杨三的归杨三，李二的归李二。这里不谈杨三的演技，单说李二的汉奸问题。

李鸿章被骂作汉奸，不独是甲午后的事，而贯穿其后半生。具体说来，罪行大致有四：一，师夷长技，兴办洋务；二，对外战争，一再主和；三，签订条约，割地赔款；四，收人钱财，出卖国权。第四点特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中俄密约》谈判期间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旅大租地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收受俄国人巨额贿赂一事。不过此事疑云密布，连基本事实都不清楚，仅有俄人一面之词，属于孤证。目前可以断定的是，俄国人向李鸿章承诺，只要他促成大清与俄国签

[1] 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氏著：《春游纪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约，将酬谢白银五十万两（一说五十万卢布），然而俄国人到底送了没有，李鸿章到底收了没有，并无答案。是以学界或者存疑，或者直接否认。[1] 莫须有之事，姑且搁置。

前面三点，俱是事实。需要辨析的乃是情境与观念。所谓情境，即彼一时此一时。如洋务运动，今人自然能给予公正评价，视其领导人为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探索者，然而在李鸿章的时代，洋务与汉奸挂钩，则成大清主流，如守旧派领袖倭仁所云，“夷人吾仇也”，师夷长技，即为“事仇”，认贼作父，即为汉奸。当时不消说办洋务，只要与“洋”字沾边，譬如使节、翻译、留学生等，在大多国人眼里，都是汉奸，无不挨骂。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立场不可谓不公，结论不可谓不正，舆论却不满意，认为他袒护洋人，以致半世英名，毁于一旦，有人竟然诅咒他应该早死：“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郭嵩焘出使英国，按朝廷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将从上海到伦敦旅途见闻制成《使西纪程》，呈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为之刻板刊行，因书中对西方国家有所美言，招致守旧派人人唾骂，日日参奏，“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2] 在致沈葆桢信中，郭嵩

---

[1] 马忠文：《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氏著：《晚清人物与史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22—146 页。对此疑案，刘忆江《李鸿章年谱长编》给予八字断语：“言出有自，查无实据”（第 564—565 页）。

[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 10 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 年，第 7454—7455 页。

焘自述所受折辱之重："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光绪二年十月初五日，1876年11月19日）[1]更可怕的是，其身后尚且不得安宁，险遭鞭尸：义和团啸聚华北之际，刑部郎中左绍佐趁势上疏，要求清算两大汉奸，"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此时距离郭嵩焘谢世已经十年。对比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所承受的骂名，何止十倍百倍，好在他深得《挺经》真传，不至像曾国藩那样"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反而对清议不屑一顾，依旧我行我素。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1876年10月30日）夜，他致信老部下刘秉璋，论及洋务，满纸豪气："至谓鄙人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2]

至于第二、三点，可合在一起来谈。自成为朝廷重臣，掌握和战大计以来，李鸿章对于中外战争，一再持重。[3]其宗旨，可用中法战争期间他向朝廷的一句进言来总结："……谋划之

---

[1] 郭嵩焘：《复沈葆桢》，《郭嵩焘全集》第十三册，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第266页。

[2]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497页。

[3] 据《清史稿·李鸿章传》："……（同治九年）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月，日本请通商，授全权大臣，与定约。十二年五月，授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六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调文华殿大学士。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国家旧制"以后数句，大体出自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铭》。

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1]这绝不是简单的主和，而在和战两难之间，隐藏了更深沉的苦衷与更长远的考量。要言之，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百年以来，几乎所有中外战争，中国都徘徊于“战难，和亦不易”（借用胡兰成书名）的困局之中。战难，由于国力、军力等俱不如对手，直接说，即打不过，这正是李鸿章“断不可轻于言战”的出发点。如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初起，李鸿章不愿去前线督战，理由是“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态度如故，缘由亦然。曾任李鸿章幕僚的吴汝纶对大清军队知根知底，称海军不如日本，陆军亦未必能应敌。[2]刘秉璋三子刘声木也说：“……然当时我国陆军万不能敌日本陆军，海军万不能敌日本海军，稍有知识者无不知之，不待智者也。德宗景皇帝昧于外情，轻于尝试。文忠久知淮军暮气甚深，海军又属新练，厌战主和，原属不得已之苦衷。力沮战端，终不见纳，致遭不幸，文忠一人，实难尸其咎也。”[3]

---

[1] 李鸿章：《妥筹边计折》，《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331页。

[2] 吴汝纶：《答李勉林》（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九日，1894年8月27日），《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92页。

[3]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94—1095页。对于中日军队的差距，时人（包括刘坤一这样的宿将）知之者甚少，而迷失于一种盲目的自信与虚幻的激情之中。对此赫德吐槽道：“如今在一千个中国人中有九百九十九人肯定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想法相反。”外国人冷眼旁观，判断相当精准。如英国海军部情报处云：“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当然对于这一破落局面，李鸿章本人不能说没有责任。

明确了这一点，可知甲午战争李鸿章最大失着，还不是屡战屡败，而是压根不该开战。其时在李鸿章治下任直隶布政使的陈宝箴以此批评道："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若嫌这段话不好理解，可参黄秋岳注解："盖义宁父子（即陈宝箴及其子陈三立）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1] 这是典型的局外人之论，有以上帝视角责人之嫌，不过"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一语，的确是破解甲午迷局的密钥。

由此再说和亦不易。主和往往有两大对手，一是侵略中国的列强，二是国内的主战派。前者的胃口纵然贪婪，若非以亡国灭种为侵略目的——如一度疯魔的日本，对于此种敌人，唯有决一死战——终究还有斡旋的余地；后者的道德高调、激情与无知毋宁更难对付，须知愚昧一经道德加持，其破坏力简直

[1]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第330—331页。黄濬字秋岳，以字行。此节提到《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陈三立曾呼吁诛李鸿章以谢天下，"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故有"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一语。

所向披靡。就甲午战争而论，李鸿章不是输给了前者，而是输给了后者。陈宝箴以为，李鸿章明知大清不堪一战，则当跑到主战的光绪帝面前，椎心泣血，以死相争，如此十有七八可打动皇帝。这不啻痴人说梦。开战之前，李鸿章何尝没有奋力抗争呢，奈何上有皇帝的威迫，中有清议的批判，下有各省的挤兑，导致他战也得战，不战也得战。[1]有人为他叫屈，称之为“以一人敌一国”[2]，还是低估了形势的严峻，实质则是“以一人敌两国”：日本和中国。

这里要声明一点：李鸿章式的主和，绝不等于投降，投降派自然是汉奸，主和派则有其一言难尽的苦心与远虑。他们首先需要考量的问题，即在战和两难的语境之下，如何使中国的损失或牺牲最小化，如不开战而直接赔款，与开战败北而赔款，哪个数目更小。这笔账，清议不会或不屑去算，这些人“惟以

---

[1] 黄秋岳称李鸿章“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后半句完全属实，前半句有待商榷。慈禧起初主战，却不顽固，见势不妙，立马转向主和，称之为毒后，未免苛刻。论主战派的责任，光绪及其师翁同龢所代表的清议力量显然更大。此外，李鸿章被迫出战，还涉及满汉矛盾。王锡彤《抑斋自述》云：“当日海军经费，由各省加征厘税。竭力通筹，既成巨款，即购巨舰，并大买军火。慈禧太后忽命修颐和园，醇亲王即嘱李文忠移海军经费解京成之。盖当海军成后，李之威权日盛。满人顿生疑忌，故特掣李之肘，俾海军之进行中止。比甲午战起，又迫此幼稚不完之海军与日本开战。遂一蹶不振。李之威名扫地，而中国从此遂精气销亡矣。”（王锡彤：《抑斋自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17 页）

[2] 梁启超《李鸿章传》云：“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此说应出自曾在北洋水师供职的英国教官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回忆录：“从一义言，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陆战尚懵然不知也。”

战为美名，曾不思战败之后，何以自处”[1]。李鸿章则不得不精打细算，然而算计再精，还是不敌“书生贪功之高调”：

> 倭事初起，廷议决欲一战，李相（李鸿章）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内意不许。及平壤败后，英俄两使居间，则劝出二千万。其时清议，皆谓李相通倭，业已积毁销骨。李相面告二使谓：“大皇帝决计开战，某系领兵大臣，和议非所与闻，请入都与恭邸议之。”其后议卒不合。……旅顺、威海既失，海军覆没，中国决无能守之望，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去冬已索五万万，今春乃减至二万万，此非李相口舌之功，乃入境被刺，倭恐见讥欧洲，兼得割地之益，乃减为此数。[2]

赔款之外，还有不容低估的军费开支、战争损失等，对比日本人起初索要的六百万两，孰大孰小，不难取舍。只是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主和一说，则输先手。究其本质，李鸿章式的主和派并非不爱国，恰恰相反，正因过于爱国，才不愿贸然开战，所谓老成谋国，乃是“最深沉的爱国者”，被贴上汉奸的标签，实在滑天下之大稽。与此相应，那些高调的主战派，

---

[1] 吴汝纶：《答黎莼斋》，《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01页。此信未署日期，应作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黎莼斋即黎庶昌，与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并称曾国藩四大弟子。

[2] 吴汝纶：《答陈右铭》，《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04—105页。陈右铭即陈宝箴，属于清议一派。

貌似爱国，往往误国更深。

其次需要注意，李鸿章式的主和，绝非彻底避战，而是把战争尽量往后拖延，不惜以赔款为代价。其策略，可美其名曰以金钱换时间，正如抗日战争之持久战力图以空间换时间。所换来的时间，则当用于变法自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图来日开战，一雪前耻。不幸的是，自中法战争以来，用赔款换来的宝贵时间，一再被浪掷。“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致一发不可复收。”李鸿章致新疆巡抚陶模信中感伤道，“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1]

此外，战争失败，如何善后，也是抛给主和派的包袱——主战派事先几乎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事后大难临头，或者如煮熟的鸭子，或者如沉默的鸵鸟，反正不愿背锅。[2]对战败国而言，任谁去谈判、签约，都是不光彩的事，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终归得有人担当。甲午战争，大清惨败，李鸿章作为责任人之一，不得不出头顶缸，以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

[1] 李鸿章：《复新疆抚台陶》（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1895年11月8日），《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85页。

[2]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1894年9月27日），慈禧令翁同龢到天津见李鸿章，谈善后事，翁同龢一再推辞，最后慈禧表态道：“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翁同龢终于答应。慈禧又道：“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翁同龢则对曰：“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5册，第2733页）事已至此，翁同龢为了维护自己的清名，依然不愿议和，是谓“为主战而主战”，误国更深。

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勉强可以说咎由自取。[1]六年后庚子国变，与他则全无干系，他屡进忠言，反被朝廷当作耳旁风，被义和团打成二号汉奸。等到大难临头，还得他出手救场，不辞劳苦，扶病北上，与列强周旋于谈判桌上，朝夕焦思，彻夜不眠，最终心力俱竭，遂至一病不起，简直用性命换来了《辛丑条约》。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豪杰，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好汉，如果还被骂作汉奸，视为卖国贼，则有何天理可言，有何人性可讲？

至死未能摆脱汉奸骂名的李鸿章，临终之际依然在忧国忧民。如其绝笔诗所示：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2]

不过此诗被指伪作，《李文忠公遗集》《李鸿章全集》等均未收录。可查证的是，李鸿章自知病危，曾致信盛宣怀诀别：“兄小别经年，竟成永诀，坠欢回首，黯痛销魂。上年燕北之

[1]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97页。

[2] 据友人谌旭彬兄考证，1919年11月10日，《申报》之“自由谈”栏目刊载了一首题为《李鸿章》的诗作，诗云：“威威车马据征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二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内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寒。海外干戈犹未息，英雄莫作等闲看。”此诗由仙籁氏投稿，应为悼念李鸿章之作，疑似流行的李鸿章绝命诗之原版。就诗论诗，原版显然更胜一筹。

行，早已安排死所，不意委身许国，复蒙锡命自天，恩沐幽明，怯难报称。《语》云："死而后已。兄竟未已矣。蒙尘两圣，困苦庶民，每用抚怀，潸然泣下。"信中附有两首诗：

四运方兴日，当王受固危。
英雄难自奋，威德任人为。
布置休轻法，俄延更失机。
攘丹疏内典，媚奥问宣尼。
负土能胜任，征兰实可嗤。
怀清防利欲，美玉保无疵。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
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最后叮嘱道："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1]

三、李鸿章之过

梁启超《李鸿章传》开篇便道："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2]

---

[1] 李鸿章：《致盛杏荪府丞》(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末，1901年11月初)，《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273页。

[2]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3页。

作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紧要人物”，以及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第一人”，李鸿章自然不是庸人，一生毁誉纠缠，殊难分辨。俗语云“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施与其人，却也勉强。无论当年，还是今世，落在他身上的谤议都远过于赞誉，前者才是主体，所以不妨改作“谤满天下，誉亦随之”。其所受之谤，有些纯为无稽之谈，发自闲人的私心与愚人的偏见，早已如秋后枯叶，随风飘逝，“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有些则属时代错位，待时代的车轮驶入正轨，国人的视野恢复正常，终将发现，原来盘旋于李鸿章头上的不是阴霾，而是光芒；还有一些，却是实在的过错，不容为尊者讳，因为小者关乎命运，大者关乎国运。

如果说曾国藩近乎圣贤，李鸿章则属豪杰，不过那一身豪气，则有两面性。《清史稿》说他既能忍辱负重，偏又才气自喜。所谓才气自喜，按我的理解，即恃才而放旷，自负而轻慢。梁启超云：“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1]吴汝纶则换了一套说辞，称李鸿章“性阔达，喜嘲谑，忌者益众”[2]，这一反一正，意思几乎相同。梁启超还说，李鸿章的轻慢，尤其针对外国人，“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如其在欧洲访问期间，好问外国人的年龄和家产，随员提醒道：“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

[1]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111页。

[2] 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铭》，《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217页。

而已。”[1]这固然快意，却非好事，不仅有损西人体面，还导致李鸿章对西方的认知，永远无法深入。

对待同胞，也是如此。在后辈面前，李鸿章喜欢倚老卖老，动辄称对方为“小孩子”，哪怕人家年已而立、不惑。戊戌政变之后，张元济请他出面调和皇帝与太后的关系，他叹了一口气道：“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庚子年北上议和，路过上海，张元济拜见，请他不必再为大清效力，他还是那句“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2]

---

[1]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111页。李岳瑞（字孟符）《李文忠公遗事》记载了好几则李鸿章轻慢外国人的故事：“甲午以前，人皆詈李文忠媚外，今沟犹瞀儒，尚持此论。不知文忠卑视外人之思想，始终未尝少变，甲午以后，且益厉焉。其对外人，终不以文明国人待之。此老倔强之风力，今安得复睹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当易海舶。日人已于岸上为供张行馆，以上宾之礼待之。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竟宿舟中。新船至，当乘小舟以登，询知为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无如何，为于两舟间架飞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总署也，总署故事，凡外国使至，必有酒果款之，虽一日数至，而酒果仍如初，即此项已岁糜数千金。公至署，诸使来谒，署中依例以酒果进，公直挥而去之曰：‘照例，外宾始至，乃款在酒果，再至，则无之也。’诸使皆色变，然竟不能争。法使施阿兰狡甚，虽恭忠王亦苦之。公与相见，方谈公事，骤然询曰：‘尔今年年几何矣？’外人最恶人询问年龄，然慑于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则是与吾第几孙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与尔祖剧谈数日，尔知之乎？’施竟踧踖而去，自是气焰少杀矣。丁酉岁暮，俄使忽以书来求见，公即援笔批牍尾曰：‘准于明日候晤。’时南海张樵野（张荫桓）侍郎在座，视之愕然曰：‘明日岁除矣，师尚有暇晷会晤外人乎？俄使亦无大事，不过搅局耳，不如谢却之。’公慨然曰：‘君辈眷属皆在此，儿女姬妾，团圆情话，守岁迎新。惟老夫萧然一身，枯坐无聊，不如招三数洋人，与之嬉笑怒骂，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辈可无庸来署，老夫一人当之可矣。’其侘傺如此。”（李孟符：《春冰室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3—84页）沟犹瞀（mào）儒，意为愚昧；侘（chà）傺（chì），失意之态。

[2]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转引自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96页。这两句“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第二句后面还有一句“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虽嫌轻慢，背后则有无限沉痛。

其实这还算客气了。他对僚属，“恒倨傲侮慢，无所不至”。袁世凯任直隶按察使，在小站练兵，曾向他面陈练兵事宜，反遭呵斥：“呸！小孩子，你懂得什么练兵，又是订什么合同？……”[1]另有一说，他若赏识、勉励下属，好用合肥土话骂道：“贼娘好好地搞。”下属被骂，无不喜形于色，自觉将受重用。好玩的是，有一候补知县，不知李鸿章这一秉性，挨骂之后，一本正经回应道：“卑职不敢贼大人娘。”[2]轻慢反被轻慢，可谓报应不爽。

轻慢一来失之于傲，二来失之于诚，深化下去，终是大病。《清史稿》批评李鸿章“才气自喜”，随后道：“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3]由此上升到用人的政治高度。说起李鸿章用人，历来横遭物议。梁启超《李鸿章传》曾专门批评这一点。书中论北洋之败，“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关于用人问题，“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4]

具体说来，李鸿章用人，第一大毛病是唯亲，与曾国藩任人唯贤，恰成对应。此处之亲乃是泛指，即李鸿章好用关系户，如老部下、老乡等（这两大群体，重合度极高，淮军之为

---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29页。

[2] 小横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观》，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81页。

[3]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9册，第12022页。

[4]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49—50页。

淮军，即以安徽人尤其以合肥人为主，王尔敏曾制淮军统将表，共收录四百三十二人，安徽籍者有二百七十九人，高达百分之六十四）。[1]胡思敬《国闻备乘》有“李文忠滥用乡人”一条云：

> 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自谓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上，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刘铭传与鸿章同县，因事至天津，观其所用人，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因私戒所亲，谓北洋当有大乱，汝辈游橐稍充者，宜及早还家，毋令公私俱败。未几，中东事起，大东沟一战，海军尽毁，皖人治军务者，若丁汝昌、卫汝贵、龚照玙等俱误国获重咎。内外弹章蜂起，鸿章亦不自安，力求解任。知其事者，皆服铭传先见。[2]

对此，郑孝胥曾大加讥讽：“北洋之用人，如以鼠驾辕、使豚犁田耳，此岂能致豪杰者哉！”（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日，1894年9月5日）[3]外国人的说法更不客气，直言“彼（李鸿章）之左右多为寄生虫”[4]。当寄生虫多如牛毛，则使淮军渐渐

---

[1] 王尔敏：《淮军志》，第159页。

[2] 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14页。

[3]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34页。

[4]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语，转引自叶曙明：《李鸿章大传：大清裱糊匠》，第154页。

沦为一个外强中干的利益共同体。李鸿章作为宿主，并无刮骨疗毒的觉悟与壮士断腕的勇气，而选择与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甲午战争，淮军将领丁汝昌、叶志超等屡战屡败，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被朝廷严谴，李鸿章却拼命辩护，称海战失败，败在船速不如人，临阵易将，无以服众心云云。这已经不是担当，而是偏袒。话说回来，以丁汝昌的将略，充其量只是中材，加之陆军出身，统领海军，实在难以胜任，若在太平时节，尚可敷衍，一旦遭遇强敌，则如无头苍蝇，最终杀身成仁，虽有死节之美名，实则早已误国，于事无补。这一切，正是李鸿章任人唯亲所酿制的苦果。当初创建北洋水师，重用老部下丁汝昌，张佩纶曾致信表示反对，称以丁汝昌当杨岳斌（杨岳斌原名载福，乃是曾国藩一手提拔的湘军水师名将，与彭玉麟齐名，战力则更胜一筹），“虽在妇孺必不谓然”，不料李鸿章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丁汝昌才不配位，卒成祸端。

唯亲之外，李鸿章用人，还有一个毛病，即《清史稿》所云“好以利禄驱众”，他自己也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这两大病灶，恰好呼应。一者导致其属下“非庸碌即贪劣”[1]，“左右又无良佐”，一者导致“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老话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利益只可能用于一时，难以用于一世；更要命的是，

[1]“（李鸿章）官直隶二十四年，吏治不修，所任将士，甲午之战，聂士成外，无一不望风逃溃者。由其平时待之若仆厮，诸将贪纵侵冒，鸿章亦绝不过问，致一败不能复振。其洊拔之官吏，如周馥、龚照瑗、盛宣怀之流，非庸碌即贪劣。……”（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对一支军队而言，依赖利益，永远无法建构坚不可摧的政治认同感。北洋水师何以“一败不能复振”，这也是一大原因。

谈起李鸿章的用人，张佩纶有一说法：“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晚节若此，爰莫能助，夫复何言！”此言背后，另有隐情。“小人之有才者”应指盛宣怀和袁世凯。张佩纶与盛宣怀一向不和，加上李鸿章长子李经方，这三人，被张佩纶判定为甲午战争三大罪魁祸首：“……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1]不过喜用有才的小人，能否视之为毛病，则成疑问，千百年来，争议不绝。不必说李鸿章，“我老师”曾国藩，当年用丁日昌等，何尝不知这是小人呢，然而不得不用，“丁虽宵人，而筹前敌财用无不精速”，与丁日昌共事的李鸿裔出自曾国藩幕府，虽是君子，“才力却逊于丁，衿度则不可同日而语”；又有徐海道道员高梯，与丁日昌同类，曾国藩称之为“诈人”，“顾好名，能做事，诈为善，虽诈不能不取。”针对赵烈文的质疑，他则感慨

---

[1] 这两段引文出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二月底张佩纶致李鸿藻的信，信中还有一段对袁世凯的评语：“……与之深谈数次，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公以通家子弟畜之则可，以天下奇才目之则万万不可。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更恐误公。与之实有恩而无怨也。斯人不用，吾言不效，此信作梦呓观，则大幸耳。”（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571—572 页）张佩纶对李鸿章的用人风格，一直不满，曾致信建言：“公云：‘非变法，国不可保，遑计身家？’此则名论，然亦似是而非。……北洋水陆各军何尝不参用西法者？乃当一羊质虎皮之倭奴，便已相率溃散，可知变法尤在变人，若仍用时相私人以为才，仍取泰西余唾以为法，徒使千圣百王所留之礼仪廉耻扫地无余，卒之人心不古、徒法不行，国仍不保。”（转引自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年，第 298 页）

“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一语道尽用人之难。[1]

说罢用人，再说敛财。李鸿章有些贪名，应与一副广为流传的对联有关：“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宰相者，李鸿章也，安徽合肥人；司农者，翁同龢也，江苏常熟人，他曾任户部尚书，古称大司农。此联容易望文生义，从肥瘦、熟荒等字眼，以为讥讽李鸿章、翁同龢如硕鼠，攫取民脂民膏，导致天下荒寒。事实上，翁同龢应是晚清最清廉的高官之一，李鸿章虽不以清廉著称，但是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听过他贪腐的丑闻，除了收受俄国人五十万白银或卢布的莫须有故事？顺道说一句，他的大哥李瀚章倒是著名贪官。

李鸿章既以名利驱逐天下士，对于钱财，自然不能无所用心，不过他也不曾过于用心。倘若把利分作公利与私利，他追求的乃是公利，即“计利当计天下利”，至于私利，顺其自然，有则笑纳，无则不必强求。其财富来源，大致分作两块，一是俸禄和各种陋规——陋规属于清朝官场的灰色收入，一般不计贪腐之列，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圣贤，也会随俗；二是股权投资，洋务运动一大内容，即办企业，或官办，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李鸿章作为发起人，持有一定原始股，实属理所当然，沃丘仲子（费行简笔名）《近现代名人小传》批评李鸿章创举实业，公私不分，无复条理：“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2]梁启超《李鸿章传》亦云：“招商局、电报局、开

[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第1102—1103、1113—1114页。

[2]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1]相比俸禄、陋规等，这项收入，才是大头。对此暴利，有人视之为改革的红利，认为改革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纵有所得，不该苛责。这话则在两可之间，政治终归是政治，生意终归是生意。

也许有人好奇：李鸿章到底有多少钱呢？关于其家产，常见说法共计三种：梁启超《李鸿章传》云：“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2]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称李鸿章死后“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3]容闳认为超过四千万。这里不妨参照一条史料。李鸿章去世后三年，其直系子孙分家，留下一份合同，共十一条，涉及田产、房产、当铺等，未提及股份、银号。有人据此推测李鸿章家产，认为应超过白银千万两，与沃丘仲子说法吻合。按当下购买力换算，大约十亿人民币。这个数据，结合其堂堂宰相身份，应不至于使人十分惊诧。

不过我读李鸿章家书，发现其生前手头并不宽裕，一度可用拮据来形容。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李经方本生母郭氏病逝，回籍奔丧，李鸿章致信叮嘱道：“闻伊家用近颇拮据，此次在客边料理后事，需费必增。大伯电云，已寄千金，目前或可敷衍，将来搬柩厝葬，动须花钱。尔使费本不宽余，又为日太短，交卸后无薪费可支，殊为焦念。我应代筹若干，大约

[1]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112页。

[2] 同上，第112页。

[3]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第202页。

二三千金，尚可勉力，俟尔信到，再为酌见，昨于致榘等函内提及。惟丧具称家有无，汝婶及榘等既非素封，汝亦虚有其表，不必效三婶、五叔之丧，花至巨万，炫耀乡邻。继述显扬大端，岂在此等俗情末节，一切宜从俭约为要。”[1] 此时李鸿章还处于鼎盛时期，然而拿出二三千金，都要勉力；并以节俭说教儿子，可知平日并无挥霍之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他给李经方写信，两次谈及经济状况：

> 吾年衰耄，当终老京师，岁需食用应酬万余金，时形竭蹶，不复能顾家事。兹因李楼小宅倾圮，不得已勉筹修费六千余金。此吾百岁后栖神之所，岂容毁坏，其他不遑兼顾矣。[2]

> 顷接庐州绅士公禀，请创设西学堂，自是救时急务。余自留京后，各处禀牍概不批行，薪桂米珠，度日维艰，亦无力倡捐巨款，深为抱歉。[3]

李鸿章平生不善作虚词，何况家书，所以此中所言完全可信。后一封信尤其令人感慨，他对家乡一向爱护，对洋务一向

---

[1] 李鸿章：《致李经方》，《李鸿章全集》第 35 册，第 228 页。

[2] 李鸿章：《致李经方》，《李鸿章全集》第 36 册，第 192 页。竭蹶，有枯竭、匮乏之意。拿出六千两银子都要“不得已”，一万两银子则使他表示“不复能顾家事”，可知绝非豪富。“吾年衰髦，当终老京师”云云，背后另有一事可说，李鸿章这样的大佬，在北京竟无房产，甲午之后，一度寄居于贤良寺，这在今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此亦间接可证李鸿章并非豪富。

[3] 李鸿章：《致李经方》，《李鸿章全集》第 36 册，第 196 页。

积极，如创设庐州西学堂这样的救时急务，倘若财力允许，必定大加支持，然而囊中羞涩，只能深为抱歉。凡此种种，可见李鸿章家产，可能还不如梁启超所估算的那么多。

此外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曾广钧是曾纪鸿之子，曾国藩长孙，光绪十五年（1889 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由于在京生活豪奢，用度不敷，曾写信向李鸿章求助。不料李鸿章回信，不假辞色，将其痛斥一通：

> 载诵别笺，具知窘况，良用太息。东华索米，原不易居。执事以北海之天逸，兼叔夜之龙性，米盐靡密，固所不为，然以一岁而耗至九千金，则实近时所罕有也。文正公在翰林日，都中所用，屡见于家书，制节谨度，无一不可为后世法。鸿章早年随宦，迄于通籍，累年京邸，何尝闻词臣家有如此用度哉！自台从北还后，有自都来者，辄详询近状，云年来颇从博戏，所往来者，皆桓元子、刘希乐之客徒。初闻颇以为疑，既而言者甚多，乃不能不以为深虑。此何等事，而可习以为常！执事人才、门第，当代罕伦，方冀进德修业，为今日第一流人物，若少有不慎，则为众谤之的，其丛累且过于平人，损财犹其末矣。少年纵宕，贤者不免，贵在能改，不必远征前史。昔闻文正公论当代贤哲，谓大概皆识之于早年，独不测胡咏芝之成就遂能如此。夫以文忠之忠勋盖世，其少日行习，至竟为里党所非，苟非改过之速，进德之猛，讵有后日之业？敬为执事诵此言，幸勿谓已负俗累，遂不可湔洗，尤不可以为小节而听其自然也。此间局面奇狭，与两江迥殊，计事授食，绝无饶裕，

故向无干修之席，即极小书院，亦未有遥领者，一时实无从设措。惟需用甚迫，兹寄去三百金，聊竭芹棉，以后难多接济，尚希格外撙节。鄙人与执事累世交亲，不同恒泛，既有所闻，不敢不告。爱之深，期之远，不觉其言之戆也。[1]

此信极见李鸿章仁义、耿直的性情。他厚爱曾家人，却不纵容，对于曾广钧呼卢喝雉、纸醉金迷的行径，直言无讳，痛下针砭。信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然以一岁而耗至九千金，则实近时所罕有也”，可见九千金之于李鸿章，也是一个大数目，否则不至惊诧如斯；[2]二是仅赠三百金，并声明今后再难接济，除了有意斩断曾广钧挥霍的手脚，亦可从侧面印证李鸿章手头并不阔绰。

内政之后说外交。俗云弱国无外交，晚清固然积弱，李鸿章却有外交家之名，而且被誉为近代中国两个半外交家之一（唐德刚语，两个是李鸿章与周恩来，半个是顾维钧），足见本事之大。他惯用的策略，即以夷制夷。这在早期，尚且可行，如以法国制英国，再以英国制法国。其可行之前提，在于英、法等列强，侵略中国，意在通商、传教等，彼此之间，还有辗转腾挪的缝隙。等到日本崛起，发动战争，以割地为目的，俄国等起而效之，再令它们相互制衡，则如驱虎吞狼。如果具备

[1] 李鸿章：《复翰林院曾广钧》，《李鸿章全集》第35册，第241页。

[2] 前引戊戌年致李经方信，李鸿章称在京城“岁需食用应酬万余金”，貌似与曾广钧相当，不过一来这是九年后的事，二来曾广钧只是七品官，李鸿章则为当朝一品大佬，二者用度毫无可比性。

狮子一般的实力，完全可以挑起虎狼之争，坐收渔利；如果只有绵羊一般的实力，纵使挑起了虎狼之争，最终受害的恐怕还是自己，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开打的日俄战争，堪作镜鉴。要言之，李鸿章式的以夷制夷，有如小孩子玩火。

由此来说李鸿章晚年一大失策：联俄制日。其标志即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黄遵宪记载道："公（李鸿章）之使俄罗斯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1]西洋者，俄罗斯；东洋者，日本。联络俄国以牵制日本，李鸿章自以为得计，孰料驱虎不成，反而引狼入室。纵观中国近代史，俄国狼子野心，对中国伤害之深，不亚于日本，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黄遵宪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在李鸿章死后，挽诗讥讽道：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
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
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
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2]

---

[1]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钱仲联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62页。

[2] 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四首》，氏著：《人境庐诗草笺注》（下），第1062页。李鸿章因平定太平军之乱封一等肃毅伯，死后追封一等肃毅侯。钟叔河为《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作序，亦以"老来失计亲豺虎"为题（蔡尔康、林乐知编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4页）。

不过，联俄制日的责任，是否该由李鸿章一人承担呢？黄秋岳认为，联俄论出自慈禧旨意，以翁同龢为中介，由李鸿章一手落实。[1] 只是其举证略显无力，慈禧显然拿不了这么大主意。事实则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大清庙堂，主张联俄制日，蔚成风气。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五日（1895 年 7 月 7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折》，满纸胡话，称“俄疆宇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实为千古所未有，垂之史册可谓美谈”“第倭之强，非俄所愿，倭之扰我东三省，尤为俄所忌。是以中倭和约业经割予辽东，而俄与法、德勒令退还，讵专为倭，亦自为耳。我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以便宜，俄必乐于从我，纵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东三省与俄毗连之地，倭必不敢生心，则保全之利，较沿海各省奚啻万倍！”[2] 十二天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密陈结援要策片》，口径与刘坤一如出一辙，主张与俄国缔结军事同盟，“……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一切视其所资于我者量为协济。面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并与议定若何报酬之法。盖俄深忌英独擅东方之利，中俄相结则英势稍戢，

[1]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第 658—659 页。

[2] 刘坤一：《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折》，《刘坤一奏疏》第 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3 年，第 957—958 页。

俄必愿从。……”[1]这么一说，李鸿章又成背锅侠。

最后要说的是李鸿章最大的缺陷或过错。梁启超有名言云：“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里的“识”，一般理解为学识（梁启超屡屡讥讽李鸿章不学无术），我姑且释作知识。李鸿章的知识素养，虽远高于慈禧，却未突破那一代政治精英的上限，与曾国藩、张之洞等一样，一生局促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桎梏之下。他对西方或现代的认知，仅限于器物或技术，而不及制度与文化，如外国人观察的那样，“鸿章之所以有名者，为善待外人，注重物质进步而已，其政治见解则更寻常无足取。”[2]对此，梁启超书中一再批判道：

>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3]

---

[1] 张之洞：《密陈结援要策片》，《张之洞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2页。

[2] 田贝语，转引自叶曙明：《李鸿章大传：大清裱糊匠》，第154页。

[3]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6页。文中引用孟子之言，歠（chuò），指饮、喝，亦指羹汤；放饭流歠，即大口吃饭喝汤，在古人看来，这是十分不得体的行为。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1]

……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2]

---

[1]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 50 页。

[2] 同上，第 53 页。

这些论述，近乎春秋责备贤者，不过既然推许李鸿章为晚清七十年第一人，如此责难，并不过分，尤其对比同时代的伊藤博文，更可见李鸿章的思想局限。他的事功之巅峰，止于洋务运动，再往前进，则非其知识结构所能支撑。洋务运动的两大口号，自强与求富，最终都成梦幻泡影，自强不强，求富不富，他也拯救不了垂死的大清，反而为之殉葬。要言之，他几乎具备了造势的一切条件，唯独昧于世界大势，所以他终究只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

四、毕相伊侯久比肩

黄遵宪诗云："毕相伊侯久比肩。"毕相即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清末民初通译为毕士麦或毕士麦克，故称毕相；伊侯即日本第一任内阁首相、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曾封侯爵，故称伊侯。前者长李鸿章八岁，属于同代人；后者小李鸿章十八岁，晚了一辈，不过其人少年成名，风云际会，与李鸿章几乎同步登上波澜壮阔的东亚历史舞台，后来甲午战争、马关和谈等，更是直接对手，龙争虎斗，一决高下。久比肩云云，无论从哪方来讲，都非虚词。

与黄遵宪相应，梁启超也曾以李鸿章对比外国人。《李鸿章传》最后一章，共列举古今中西人物十六位，作为传主的参照系，其中外国人六位，俾斯麦、伊藤博文俱在榜上。这背后，需要注意一点因素：李鸿章在其时代，对外而言，乃是当

之无愧的大清代言人（其时外国人对于大清，往往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太后和皇帝），堪称世界级人物，享有世界级声誉。《清史稿》夸他“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虽嫌过甚其词，也是一说；又云：“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1]这一时伟人，除了俾斯麦和伊藤博文，还有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等，都曾与李鸿章坐而论道，谈笑风生。以之为参照，正可反观李鸿章一生成败。

李鸿章与“一时伟人”齐名的说法，我见过不下三种。一是“当今天下三大老”：李鸿章、俾斯麦和格莱斯顿；二是“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李鸿章、俾斯麦和格兰特；三是“当世四大伟人”，语出格兰特之口：李鸿章、俾斯麦、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任英国首相）与甘必大（法语：Léon Gambetta，曾任法国总理）。这三份名单，不论真伪虚实，都少不了李鸿章和俾斯麦。无独有偶，李鸿章最著名的绰号之一，正是东方俾斯麦。

这个绰号是否名副其实呢？李鸿章能否媲美俾斯麦？首先，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却不曾被称作西方李鸿章，二人之间，高下立判，更强的那个人，才有资格被借重、作参照。其次，梁启超说，李鸿章被比作俾斯麦，不是谀辞，而是妄言：

---

[1]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9册，第12021—12022页。

> 李鸿章何足以望俾士麦？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士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士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士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1]

俾斯麦之后，格莱斯顿出场，被梁启超称作“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相形之下，李鸿章则是“功名之士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两者相距整整一个时代。[2]在另一场合，李鸿章又成了“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3]不论以哪个说法为准，李鸿章都是梁启超笔下的旧时代之英雄。倘以时代论英雄，俾斯麦恰恰也是如此，他属于帝制而非民主的时代，属于铁血而非文明的时代，正如他的墓志铭所示：“威廉一世皇帝忠实的德意志仆人。”唯有越过他的政治尸骸，德国才能真正进入新时代。

就此说来，俾斯麦与李鸿章乃是同一时代之英雄，何以在梁启超笔下，差距如此之大？无非一成一败而已。梁启超口口

---

[1]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108—109页。

[2] 同上，第109页。

[3] 梁启超：《二十世纪之新鬼》，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7页。

声声“非以成败论人”，终究未能免俗。不过成功与否，亦难定论。在《李鸿章传》成书之际，对俾斯麦的评价是一码事，彼时德国国运如日中天，俾斯麦虽然黯然辞世，整个国家依旧笼罩在他盛大的光芒之下。再过二十年，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俾斯麦的评价则是另一码事。譬如1918年，马克斯·韦伯谈及俾斯麦的政治遗产，断言道：“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政治教育的国家……习惯于期待一位伟大领袖为国民提供他们的政治……（德国）已经习惯于耐心并宿命地服从以‘帝国政府’之名所作的一切决定。”一言以蔽之，俾斯麦留给继任者的乃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成熟度”而且“没有任何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国家”，“他建立的是一个伪民主政权，并操纵这个政权以达到不自由的目标”。[1]结合一战，再论成败，则有沧海桑田之慨。

所以我不认为，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便是对后者的侮辱。他们的差距，如学问、智术、胆力、视界，亦非如梁启超所夸饰的那么大，有些关节，反而相通。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命运，都具有一种深沉的悲怆感甚至荒谬感，这尤其表现在与权力、时势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强权者死于更强的权力，造势者败于更大的时势（论一战之责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实为罪魁祸首，然而论造势，俾斯麦则是始作俑者，他只能开头而无法收尾，这正是时势的力量）。

李鸿章与俾斯麦曾有一面之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出访德国，专程到俾斯麦的庄园

---

[1] 转引自［美］海伦娜·罗森布拉特：《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从古罗马到21世纪》，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77—178页。

拜谒，极尽倾慕之情，尽管当时他尚且在朝，俾斯麦已经下野，然而一个身败名裂，一个功成名就。除了请教的姿态，如“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等，最后那番留言，足见对俾斯麦的敬重：“仆闻王盛名三十余年，不过如空谷之应声耳，今乃觌面见之，直如剑气珠光，不敢逼视。”[1]这不完全是客套话。须知李鸿章一生倨傲，极少低头，当世人物，也许只有俾斯麦能让他如此钦服，自叹功业不如远甚。

说罢毕相，再说伊侯。梁启超对比李鸿章与古今中西人物，各有评语，论俾斯麦尚且公允，论伊藤博文未免苛刻：

>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2]

---

[1] 蔡尔康、林乐知编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67—68页。蔡尔康是中国媒体人，林乐知是美国传教士，二人曾合作《中东战纪本末》等，属于王牌搭档。林乐知曾称赞蔡尔康：“余之舌，子之笔，将如行之于影，水之于气，融美华于一冶。”

[2]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110页。

相比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其绰号东洋俾斯麦，恰与李鸿章同名）与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其生也晚，故而于维新之初“未尝有大功”，不过三杰均英年早逝（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死于1877年，大久保利通死于1878年），这之后，伊藤博文俨然日本政坛第一号人物，说他之轻重于日本，不如李鸿章之轻重于中国，恐怕难以成立。后面又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实在贬斥过了头。倘如梁启超所言，哪怕打个一折，才学如伊藤博文的日本人不下十个，东亚史与世界史必将改写。事实上，伊藤博文的时代，能与之比肩的日本人，二三子罢了。“创造近代日本之人”（伊藤之雄所撰伊藤博文传记之副题），岂是浪得虚名，无足轻重？

抛开国运，单看才略。伊藤博文之雄才，也许略逊于李鸿章，论大略，似乎胜出不止一筹。所谓大略，即政治视野与格局，在中国与日本的近代，一大表现，在于对西学的接受与研究。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这又如何是游学欧洲那么简单呢？伊藤博文勤勉好学，数十年如一日，对西学的研读如饥似渴。日本有一家老字号书店叫丸善书店，创办于明治维新初期，开业之时，伊藤博文便是常客，平日下班，若无应酬，便雇车到书店，在二楼西洋书专柜之前尽情浏览，然后挑出一大堆打道回府。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期间，他和他的团队所需要的英美政法参考书，皆从丸善书店采购。当时西洋书相当昂贵，开销甚巨，以致伊藤博文死后，家中除了藏书，几无存款和值钱的东西。

李鸿章读过这些书吗？勘察其文集、年谱等，不难发现，他的读书生活简直乏善可陈。如果说前半生戎马倥偬，分身乏术，那么马关议和之后，虎落贤良寺，他该有暇读书了。不过所读之书，据吴永观察，还是《资治通鉴》等中国经典，“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1]前面说过，他的开眼看世界，停留在坚船利炮、火车铁路所代表的器物之变，对于政法、经济等新知识的接受度，不比同时代的读书人好到哪里去。纵使天纵英才，怎能禁得起这般漫长的消磨与荒废呢？就大略而言，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与伊藤博文天津初见之时，便已失却先手，此后悬殊愈发分明。[2]“毕相伊侯久比肩”，等到甲午年，终于是一句笑谈。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俾斯麦死前不久，曾访问德国最大的港口汉堡，望见远洋轮船纷纷出航，他低声道：“是啊，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世界……”[3]遗憾的是，李鸿章至死都不曾

---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25页。

[2]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伊藤博文到中国谈判朝鲜甲申政变善后事宜，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印象。中日《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云：“该使（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对伊藤博文的赞美，正对应他的缺陷。《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走笔至此，不由感叹道：“……果然，不十年而甲午战起，李伊再见于马关。小别十年，景象全非，东亚两杰，相形见绌，而中日两国之兴衰，亦系之矣！可胜慨哉？可胜慨哉！”（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天津：大公报馆，1932年，第260—261页）

[3]［俄］阿·叶鲁萨里姆斯基：《外交家俾斯麦》，［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同鸿印、杨德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96页。

预见“一个新的世界”，忧患之中，他念兹在兹的还是一个日渐衰亡的旧时代，以及自己如何在旧时代中安身立命：“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五、裱糊匠的衣钵

李鸿章在生命最后一年，辗转于屈辱的谈判桌与凄凉的病榻之间，最终心力交瘁，油尽灯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1901年11月6日），他自觉大限将至，提前换上寿衣。追随他将近四十年的周馥从保定匆忙赶来，所见一幕，即“相国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中午，犹不瞑目，周馥只好伸手帮他合上眼皮，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他忽然目张口动，欲语泪流，须臾而断气。[1]英雄末路，悲戚如斯，令人肝胆欲碎。

李鸿章死前一周，曾大口吐血，群医束手，知难久延，于是口述遗疏，由次子李经述笔录，这大抵可视为他的政治遗嘱。后世传言，其遗折曾举荐山东巡抚袁世凯接替他所留下的直隶总督一职。如王伯恭《蜷庐随笔》云：“……遗折命于晦若（于式枚）主稿，举周馥为代。杨士骧时与晦若同在文忠幕中主缮写，辄于周馥下添注山东巡抚袁世凯，于是项城（袁世凯）遂

[1] 周馥：《周悫慎公自订年谱》，转引自刘忆江：《李鸿章年谱长编》，第731页。周馥与李鸿章的深挚交谊，可以其悼诗为证：“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继合肥督直矣。”[1]汤用彬《新谈往》云：“……合肥遗折至，力保袁世凯才略堪任艰巨，请以继任直督，并请速回銮，以慰中外之望。诏并从之。”[2]电视剧《走向共和》采纳此说，并在遗折当中添油加醋，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举荐之说固然动人，却非事实。李鸿章遗折共四百余字，可分两节，前文叙述病情，字字血泪；后文交代政事，竭忠尽智。兹录如下：

> ……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讨谟。臣在九原，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纊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3]

这便一目了然。李鸿章遗折，并无一字涉及袁世凯，甚至并未谈及其职务之继任。这等大事，倘若皇帝不来垂询，臣下

---

[1] 王伯恭：《蜷庐随笔》，王伯恭、江庸：《蜷庐随笔·趋庭随笔》，第84页。

[2] 汤用彬：《新谈往》，转引自徐一士：《一士谭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2页。

[3] 转引自徐一士：《一士谭荟》，第122—123页。

主动推荐人选，则属冒昧以至僭越，只可能引来不必要的猜忌。李鸿章沉浮宦海数十载，怎会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呢。何况，即便让他举荐接班人，他也未必会选择袁世凯。如刘体智《异辞录》所云，李鸿章病重，有人劝他保举继任之人，他答道："继任有人在，我不欲保耳。"——"有人"即指袁世凯。[1]

接班人问题，得从曾国藩说起。曾国藩有一名言，出自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1862年5月4日）致曾国荃信："……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2]所谓替手，即接班人。当时曾国藩所选头号替手，便是李鸿章，人事之外，他还有意以淮军取代湘军。与此相应，李鸿章一向以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自居，曾氏死后，其挽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借用武侠小说的

---

[1] 刘体智：《异辞录》，第188页。当时袁世凯气候已成，的确是接替李鸿章的最佳人选。不止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都看到了这一点。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盛宣怀听说李鸿章病危，立即给袁世凯发电报："傅相昨日两点钟不能言，神气恍惚，病势甚危。北门锁钥，微公莫属。齐鲁替人，四顾为难。公自思之。"（刘路生、骆宝善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44页）而且外国人亦如是观。与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同日，张之洞致电朝廷，称德国驻华公使穆默（Alfons von Mumm）从北京到湖北密谈，表示希望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今年以来，所见各国提督、领事，大意皆盼袁抚为北洋大臣，众口一词，不仅穆一人也。"（转引自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45页）

[2]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17页。这一招，不止李鸿章学会了，袁世凯也学会了。他曾告诫曹汝霖："你记着！凡办大事，对于要紧地位，总须预备两三套人才，以备万一，不至临时失措。"（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4页）

说法，门生长即掌门大弟子，尽管论入门先后，李鸿章并非居首——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和李瀚章一同拜在曾国藩门下，如果他自称大弟子，则置胞兄于何地——然而他毫不客气，偏偏这么措辞，显然志在争曾国藩的衣钵。彼时论官位，论勋业，曾门弟子，无人能出其右，一众同门纵使不满，却也不便呛声，只好任由他来当大师兄。

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同样继承了“我老师”的一些手段。曾国藩主张办大事以选替手为第一义，他也不敢怠慢，早早留意人才。淮军将领，以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等最为优异，皆可独当一面，可惜刘铭传出身草莽，张树声只是廪生，唯有刘秉璋符合李鸿章对功名的要求（按高阳之说，李鸿章希望替手与其一样出身科甲，这是汉人入阁拜相的必备条件），却与之政见不合，譬如对洋务运动的态度；而且张树声小李鸿章一岁，刘秉璋小李鸿章三岁，说起来都是同代，谈何接班呢？这么一来，李鸿章只好把目光投向淮军之外，最后选中了曾与他“并马论兵，意气相投”的故交张印塘之子、清流大将张佩纶。不料阴差阳错，造化弄人，张佩纶未能当上他的接班人，而成了他的乘龙快婿。

李鸿章对张佩纶的欣赏，于私如下嫁爱女，于公则不遗余力回护与提携，另外可以一句名言为证。青年袁世凯在朝鲜建功立业，其上司吴大澂帮忙造势，曾对李鸿章说：“公向谓张幼樵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1]——幼樵系

[1]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校印本，第32页。

张佩纶字。李鸿章一贯目无余子，睥睨众生，称张佩纶为天下奇才，足见推许之深。吴大澂和张佩纶乃是好朋友，同属清流党，为了抬举袁世凯，不惜拉老友垫背，并非存心否定。其实袁世凯对张佩纶也是十分服气，他有“天下翰林三个半”之说，三个指张佩纶、徐世昌、杨士骧，半个则是张謇。

由此再说袁世凯。他出身淮军，屡受李鸿章提携、保护，一向被认为出自其门下。不幸甲午一役，北洋沉沦，李鸿章“四十年之勋名威望，一旦为倭约丧尽”[1]，袁世凯为了东山再起，只得改换门庭，所攀附、投效的政坛大佬，包括李鸿藻、翁同龢、荣禄及李莲英等，从此与李鸿章渐行渐远，甚至渐生嫌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记载了两个故事，一是袁世凯为翁同龢当说客，请李鸿章让出大学士位置，反被斥为“真小人”；二是袁世凯大谈练兵事宜，被李鸿章当众挫折，以致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后者可参刘体智《异辞录》所载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吐槽：“中日战罢，高阳李文正（李鸿藻）用项城（袁世凯）为将，以新法练兵于小站。文忠自马关归，偶与语及，曰：‘余败军之将。候袁大少爷成军后，可以一战。’项城闻言，憾之终身。”[2]此外，庚子年李鸿章北上议和，张之洞在背后捣鬼，成天乱出主意，袁世凯则与之串通一气，力言张之洞当进入军机处，盛宣怀执掌户部，中国始有办法。李鸿章之女李经璹（张佩纶之妻）写信向父亲转述此节，感叹“中国风气、人

[1] 张佩纶语，转引自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与人物三编》，第298页。

[2] 刘体智：《异辞录》，第140页。

才如此，即炮台不毁，洋械仍来，亦终不能自强也”，并提醒“小人最不宜结怨耳”。[1] 如此种种，可知晚年李鸿章与袁世凯的关系之疏离，既非同心一体，遑论薪火相传。[2]

以袁世凯之精明强干，当知李鸿章对他观感如何，是以刻意保持距离。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夏，李鸿章患病，消息传到山东，有人建议袁世凯发电报问候一声，他答：“不可，彼且疑我欲得其位。”[3] 其谨慎如此。不过李鸿章死后，他立刻换了一种态度。试看其所撰挽联，以及为天津李鸿章专祠所撰楹联：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己，愿宏志业继萧规。

---

[1]《李经璹致李鸿章》（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1 年 1 月 19 日），《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669—670 页。张佩纶、李经璹夫妻皆斥盛宣怀为小人，无关私怨，而属公论。盛宣怀属于典型的“小人之有才者”，李鸿章待他，不可谓不厚，他也将李鸿章引为毕生第一知己，然而甲午之后，李鸿章失势，他与袁世凯一样，两面三刀，落井下石，如在致友人恽祖翼（时在张之洞治下任湖北按察使）信中抱怨道：“弟事合肥（李鸿章）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湘乡（曾国藩）、益阳（胡林翼）功业盖天下，首在荐贤。今后洋务之难，不尤难于发捻军务耶？南皮（张之洞）任洋务知人用人，可不比湘乡、益阳耶？湘乡用人，惟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用人，惟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57 页）连“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这样的话都能说出口，未免令人心寒齿冷。

[2] 窃以为李鸿章后半生最看重的人，前有张佩纶，后有盛宣怀（陈三立为盛宣怀撰墓志铭，称其“最受知李文忠公”；如前所引，李鸿章平生最后的书信与诗，即致盛宣怀，托以国事，足见推重），袁世凯从不在其列。

[3] 刘体智：《异辞录》，第 188 页。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1]

郭令、汾阳，皆指郭子仪，封汾阳王，人称郭令公；临淮，指李光弼，封临淮王。二人都是唐朝中兴名将，前者于后者有荐举之功。袁世凯以郭子仪比李鸿章，而自比李光弼，倒也贴切。“再传弟子”“代将中年”“愿宏志业继萧规”（即萧规曹随）云云，亦有传承衣钵之意。又撰李鸿章颂德碑云：“世凯初以通家年少谒公，一见即许以任大事，旋奏付以东方专面之寄。屡疏荐达，语极崇重，同时宿将老吏皆惊异焉。从公二十年，迄于代将。庚子之变，提衡南北，更同患难。尝谓相从之久，相知之深，莫世凯若矣。”相比对联，所述更详，用情更深。不过这终究只是他的一面之词，而搁置了李鸿章的心思。

倘以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两代一心、一脉相承为参照，那么袁世凯的“我老师”，即对他赏识、栽培最有力的人，勉强可推荣禄。自小站练兵开始，袁世凯便归兵部尚书荣禄节制，后因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被御史胡景桂弹劾，朝廷派荣禄前去查办，兵部司员陈夔龙同行。据后者回忆：

……文忠（荣禄）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

[1] 转引自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143页。

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迨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复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俞允。[1]

这是荣禄第一次保全袁世凯。第二次则在两年后戊戌政变，袁世凯受召进京，被迫卷入康有为、谭嗣同等策划的围园劫后之阴谋，回到小站，虽向荣禄告密，依然难脱嫌疑，以慈禧之猜忌，纵使能保住脑袋，仕途只怕到头了。陈夔龙记道：

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慈圣意不能释，姑令来京召见。袁最机警，谄事东朝，前事不惮悉诿之主坐（光绪），而宫闱之地，母子之间，遂从此多故矣。[2]

这两次政治事故，皆使袁世凯转祸为福，遇难呈祥，未损分毫，反得扶摇。是以徐一士说：“……汲引而扶持之者，荣禄

[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70页。

[2] 同上，第71—72页。

之力为尤多。世凯之谨事荣禄，实其得志之最大原因也。”[1]

“谨事”二字，所透露的信息，除了感激，还有忌惮。据郭则沄《南屋述闻》，其父郭曾炘曾任军机章京，素为荣禄所倚重。有一天上班，荣禄问道：“慰庭（袁世凯）欲以直督兼领山东，君意如何？于昔亦有例乎？”郭曾炘听后悚然曰：“往昔鄂文端（鄂尔泰）、年羹尧等虽有其例，然皆以用兵暂资节制，非今所宜援。”荣禄深以为然，叹息道：“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地。”[2]荣禄精于相术，看人眼光甚准，袁世凯枭雄本色，早见端倪。他若在世，作为老上司，恩荣并济，尚可压其一头；一旦过世，无人能制，只能任其纵横。

不过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尚且谈不上衣钵相传。无论立德与立功，荣禄都不比曾国藩、李鸿章，并未开辟天地，本无衣钵可言。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相比曾国藩的衣钵，李鸿章的衣钵到底是什么呢，是否值得传承？只怕连李鸿章自己，对此都不无疑虑。他曾向吴永感慨：

>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

---

[1] 徐一士：《一士谭荟》，第115页。

[2] 龙顾山人：《南屋述闻》，王树枏、龙顾山人：《陶庐老人随年录、南屋述闻（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7页。南屋者，军机章京办公处，在乾清门西侧的隆宗门内，其对面的北屋则为军机大臣办公处。

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1]

由此，李鸿章得了个“裱糊匠”的外号。裱糊匠的衣钵，有几多传承必要呢，正如一间破屋，有几多裱糊必要？他死前尝以贤臣自许，辛亥年的袁世凯，虽不愿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却也无一丝忠臣孝子的心思。从其《登楼》诗来看，“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云云，足见推倒一世之智勇的雄心壮志。所以说，袁世凯绝非李鸿章及其时代的继承者，而是终结者，李鸿章选择为大清殉葬，他则把大清送进了坟墓。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21页。

论袁世凯

学与术

一、学与术

高友唐《高高轩随笔》云：

> 南皮（张之洞）于万寿山附近六郎庄筑小园避暑，恒召幕僚于茅亭敲诗钟消遣。戊申八月十五日，以“中”“秋”两字鹤顶格，令每人拟十联，拟毕，小饮赏月。忽询近日有何新闻，余对有友自沪来，闻郑孝胥评论时人，颇滑稽，谓岑春煊不学无术，公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南皮捻须笑曰：“余自问迂拙，郑谓我无术，诚然，然有学二字，则愧不敢当，不过比较岑、袁多识几个字。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至谓端有学有术，则未免阿其所好。学问之道无穷，谈何容易，彼不过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附风雅，此乌足以言学耶？”[1]

高友唐名维宗，字友唐，辽宁铁岭人，“居张之洞幕十余年矣”[2]，故能闻此隐秘。戊申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其时张之洞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端方任两江总督。郑孝胥曾追随前者，此刻则在后者幕府，吃谁的饭说谁的好话，月旦时贤，不免偏袒。这四句评语，可谓名论，精当与否，有待分说。

称岑春煊不学无术，虽嫌刻薄，却非全无道理。岑春煊之

---

[1] 高友唐：《高高轩随笔》，转引自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2] 同上，第46页。高友唐有“余在南皮幕府凡十三年”等语。

发迹，一靠出身，二靠趋时，三靠运气，论才具，则非一流，甚至还不及端方；其行事全凭一股蛮劲，有屠官之名，加上清末民初一直与袁世凯作对，在近世属于政治正确，故而备受好评，获誉刚直。[1]时人对他的评价，倒也公正，不掩其长，不隐其短，如徐一士云："春煊勇于任事，时望甚隆，而亦不免以学养未足、气质近粗见病。"[2]胡思敬则批以八字："其刚可用，其智则黯。"[3]民国初年，孙中山曾与岑春煊一同反袁，在致旅居加拿大的中华革命党党员胡维壎信中谈及对其人观感："至岑春煊，本旧官僚，见识思想均极愚陋，断不足维持中国，奉之者不过借为傀儡而已。"[4]……由此种种，可知其人底色。

---

[1] 岑春煊父亲岑毓英，官居云贵总督，故其为官二代，门第显赫；戊戌年，他受光绪帝召见，力陈国势危急，非发愤图强，不能图存，并以纸老虎为喻，使皇帝动容，被特擢为广东布政使，一时视为异数，然而观其政见，却不该视为维新派，他则自许为"强直果敢之臣"；庚子国变，两宫西狩，他率兵赶来勤王，机缘巧合，遂受慈禧赏识，青云直上，此事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记之甚详，不得不感慨运气使然。他任两广总督等，以敢于弹劾官员著称，遂有屠官之名，与张之洞屠财、袁世凯屠人（民）并称，三屠之名，流传几遍中外。陈夔龙曾为岑春煊辩诬，认为"不学无术"之说殊不尽然："制军（岑春煊）幼承庭训，雅负权略，余官京曹时，曾见其受业于吾乡李苾园尚书之门，执弟子礼甚恭，部务之暇，辄手持一卷，拳拳服膺云。"（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32—33页）不过我们所论之学，显然不是读书多寡那么简单。

[2] 徐一士：《一士谭荟》，第230页。

[3]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76页。

[4] 孙中山：《复胡维壎函》（1916年4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9页。岑春煊身上，并非尽是旧官僚的愚陋，譬如作为晚清重臣，他对清室毫无愚忠，称："昔日委质为臣者，今且与故君同为国之公民，而区区效忠一姓之狭义，皆当随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大势之所趋耶。"（岑春煊：《乐斋漫笔》，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37页）这等眼界，远胜康有为等遗老。

称端方有学有术，显然是郑孝胥的大号马屁。端方这个人，优点是聪明，善于顺势，窥见时代流行什么，便讲什么，戊戌变法讲维新，立宪运动讲宪政。问题在于，他的知识素养远远跟不上他的转向，譬如预备立宪，满人里面，数他嗓门最大，怎么立宪，却一知半解；出洋考察宪政，他是带队的五大臣之一，然而考察报告，还得请梁启超捉刀代笔。这样的与时俱进，实质则是赶时髦，虚头巴脑，徒有其表；更要命的是，他一向“知进而不知退”。要言之，论学他远不如张之洞（尤其把学分作学问与见识，在后一点上，更是相形见绌），正如论术他远不如袁世凯。郑孝胥所月旦的这四个人，数他结局最惨，与其学、术之贫乏不无关系。[1]

辜鸿铭曾对比张之洞与端方，对后者的论析尤为精辟：

> 张文襄（张之洞）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

[1] 何刚德曾与端方在工部同事，后在江苏为上下级，对其多有了解。在他眼里，“渠（端方）少颇不羁，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鉴赏金石，颇负时名。惟其热中太甚，倒行逆施，知进而不知退。自调直督罢斥后，仍求四川一差，以为再起之计，致遭惨杀，死事不无可悯。然平心而论，不得谓非自取也。”（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50页）

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曰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1]

辜鸿铭对张之洞的考语，“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前四字自然成立，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领袖人物，他乃是这面大旗之下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后四字则待商榷，窃以为他的毛病，并非聪明不足，而是聪明过头，喜好取巧——我曾说，若以一字论断晚清政坛大佬，张之洞可谓“巧”。[2]与此相应，郑孝胥称其无术，也是误判。他的回应“余自问迂拙”云云，故作谦抑，明贬自己，暗踩他人，可见其术；再如徐致祥弹劾他，声言论章奏之工、议论之妙、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中外诸臣，无人能及张之洞，亦可见其术。是以他的学与术都没问题，最大匮乏，则在于勇。刘坤一曾批评他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因血性、气概不足，一生周旋于中西、新旧之间而难以突

---

[1]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陶菊隐：《张文襄幕府纪闻·近代轶闻》，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2] 羽戈：《过渡时代的张之洞》，氏著：《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9—194页。

破，徘徊于圣贤与豪杰之间而两头无着。[1]

郑孝胥这四句话，最精准的一点，当是谈袁世凯。不学而有术，可谓不易之论。后人论袁，常拾其牙慧。如黄远生云："袁公者利用之手段有余，爱国及独立之热诚不足，又其思想终未蜕化……"[2]并称在时人眼里，袁世凯"权谋百出，专以手段胜"[3]。徐凌霄、徐一士云："袁氏为人，有术而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综袁一生，富于魄力，工于手腕，从善言则能为伟举，惑浮议则不免成大眚，质美未学，良可慨惜。"[4]

由此来说袁世凯的学与术。既然他以术见长，姑且先言其术，再言其学。

二、袁世凯之术

说起权术，我们的印象往往不大好。譬如称一个人，尤其

---

[1] 先贤论人，有圣贤与豪杰之分，以及不为圣贤便为豪杰之说。尽管朱熹云："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大意是，豪杰不必是圣贤，圣贤必须是豪杰。事实上，这二者的界限还是相当分明。拿近世人物来说，曾国藩可谓圣贤，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均属豪杰。张之洞的尴尬在于，貌似两样都沾，实则两头不靠，作为文臣，其理想自然是圣贤，然而一生行事不脱豪杰气，以圣贤的标尺丈量，他缺少一个"诚"字，以豪杰的标尺丈量，他缺少一个"勇"字，因此只能摇摆于二者之间。

[2] 黄远庸：《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氏著：《黄远生遗著》，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1页。黄远生本名远庸。

[3] 黄远生：《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氏著：《游民政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4页。《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共四篇，加上《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一文，曾收入黄远生遗著，后遭删削。

[4]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90—291页。眚（shěng），意为过错。

是政治人物，怀揣权术、精于权术云云，大体而言，不是什么正面评价。不过需要注意，权术之为贬义，问题不在其本身，而在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当权力不受制约，政治坠入暗黑的密室，权术势必为虎作伥，形同洪水猛兽，令人谈之色变；反之，如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权术的副作用则将受限，甚至可能被纳入正道，造福众生。说白了，权术乃是工具，不妨视作中性词，它的利弊，取决于为谁所用、怎么用，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运用的语境或土壤。也许正基于此，先贤并不排斥使用权术，而讲究有经有权、有学有术，欲成大事业，必须二者兼备，不可偏废，倘若只居其一，有学而无术，则缺乏行动力，有术而无学，则缺乏方向感。

中国是权术大国，人才辈出，近世尤甚。如慈禧，也曾被指“有术无学”[1]。她对平衡术的运用，晚年已臻化境，不过其手段不够全面，亦无多少名局可言，终逊袁世凯一筹。袁世凯的强项，在于全能，翻云覆雨，移星换斗，花样百出，最擅铁人三项——古之驭人，有三板斧之说：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施之以金钱），威之以刑杀——这三点，他都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抛开此中是非，则不得不推其为一代宗师。谓予不信，试看这些故事。

袁世凯幕府，藏龙卧虎，各有所长。其中负责理财的是河南卫辉人王锡彤。他受招揽，正式入幕，应在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其时袁世凯已经下野。八月北上，经营京师自来

[1]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第4页。

水公司等实业，直至年底袁世凯嫁女，他才返回河南彰德，参加婚礼。不料袁世凯见面即问："北行半年矣，归里省亲乎？老人倚闾望久矣。"他答："过女公子喜期当归里。"袁世凯道："尚有数日之隔也。彰、卫火车道一小时可达，何不归里一视。昔余自朝鲜归，母夫人在堂，他皆不顾，惟匆匆归省。李文忠公骂余曰：'忘八肚中一根枪，归（龟同音）心似箭。'余一切不顾，惟急于见母耳。嗟乎，人生有母乐也。"随即"呼左右备珍食数事，送王老太太"。他由是感慨："余此时感激之忱，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公能体贴人心至此，宜乎收揽英雄，人人乐为效死。"[1]

此即典型的结之以恩义。袁世凯这一招，对症下药，高明之至。因为王锡彤一不爱权，二不贪财，三不好名，却是大孝子，唯母命是从。早前为加入袁世凯幕府一事，他曾犹豫不决，其母则道："袁公天下豪杰，汝平日所倾佩者。今既见招，奈何不往？且京津虽远，较禹州近也，火车畅行一日可达。何时思我何时可归，我若思儿亦可电召，何惮为！"[2]此事遂一言而决。对于这种人，大官小官，金山银山，都不如"北行半年矣，归里省亲乎"这一句温暖的问候好使，不如"备珍食数事，送王老太太"这一份贴心的礼物好用。从另一面来讲，这也充分体现了袁世凯的洞察力，招揽王锡彤之时，便知其人性情与好

---

[1]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50—151页。卫指河南卫辉市，王锡彤是此地人；李文忠公即李鸿章，他用歇后语骂袁世凯，足见喜爱。

[2] 同上，第147页。

恶："我知君孝子，求忠臣于孝子之门。"[1]

袁世凯还有一个幕僚叫阮忠枢，乃是他在晚清最倚重的笔杆子。[2]二人相识甚早，属于贫贱之交：青年袁世凯北上投军，青年阮忠枢北上应试，途中偶遇，欢若平生，同行同宿，由此订交。后来袁世凯从朝鲜回国，混迹京城，四处钻营，欲走大太监李莲英的门路，阮忠枢从中牵线，助力甚大。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请阮忠枢担任文案。他治军极严，手订军律二十条，第十八条云"在营内吸食鸦片烟者，斩"，只有阮忠枢一人可例外。此间另有一个故事，据袁世凯三女袁静雪回忆：

> 有一天，阮忠枢向我父亲说，他在天津某妓院里认识了一个叫做小玉的妓女，他们两人感情很好，想纳小玉为妾。我父亲当即说，这是有碍军誉的事情，严正地当面驳斥了。阮忠枢觉得，这既是关系军誉的大事，长官不准，也就只好作罢。过了不久，我父亲说是到天津有公事，邀阮忠枢一同前往。下车后，天色已晚，我父亲便邀他先去看一个朋友。他们走进一个院门，看到屋子里铺设得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烧，并且还摆着一桌很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头一面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从屋里搀扶出一个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

---

[1]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48页。

[2] 负责文案的幕僚，俗称文胆。袁世凯的文胆，最知名的共计三人：阮忠枢、张一麐、夏寿田。其中以阮忠枢思想最为陈旧，进入民国，因不适应新式公文写作，被袁世凯外放，奔走于张勋等北洋将领之间，负责联络、勾兑等，于式枚遂有"可怜跑死阮忠枢"之讥。

阮忠枢当时不明所以，真个是如入五里雾中，及至细细一看，才知道便是自己所要娶的那个小玉。原来，我父亲在阮忠枢和他商议之后，就秘密地派人给小玉赎身。等到把事情办理妥帖了，他才引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更加忠实地给我父亲效劳，一直到洪宪帝制时期，还是始终如一的。[1]

如果以为王锡彤、阮忠枢系袁世凯幕僚，容易为其恩义所笼络，说服力有限，再看一个案例。林长民乃是共和党、进步党大将，与梁启超同一系统，并非袁世凯班底，一度还是明争暗斗的政敌。袁世凯复辟帝制，发动之初，林长民任参政院秘书长，其父林孝恂在上海患病，他到总统府请假，袁世凯“极致殷勤，命车送人参鹿茸皮货诸珍之属约值二三千金，俾为老人颐养”：

林至沪不二旬，乃翁病殁，循例发讣，并撰哀启，以告于袁，袁赙赠银三千元。长民治丧毕，入都销假，至新华宫稽颡致谢。袁氏扶起慰藉，背诵林氏哀启，自始至末，随诵随流涕，一语不遗。长民惶悚，伏地叩颡不已。袁氏复拭泪扶而送之。长民自此于参政院惟袁氏之颐指是使矣。林氏尝密语人曰：“以日理万机者而于极不相涉之哀启，强记而面诵之，其责望于我已达严重之极点，不从之，即取我命矣！”[2]

---

[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9页。

[2] 沈恩齐：《袁世凯与林长民》，《人文月刊》1937年第1期。

这个案例，恩义、金钱以及“即取我命矣”的刑杀，三板斧都用上了，对付林长民这般不以风骨见长的政客，不由得其不低头。[1]

这里需要指出，林长民的哀启，袁世凯未必需要强记。其人天赋异禀，记忆力超群，近乎过目不忘。据其七子袁克齐回忆：“他（袁世凯）的记忆力很强，他见过的人，虽隔数十年后，仍能道其姓名、籍贯。”[2]黄炎培为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作序云：“袁长于记忆。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见时，一语及所在省区人物或政事，袁谙熟之程度，往往过于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惮之。”[3]与黄炎培一样出身革命党的张钫之见闻，更加生动。1912 年 6 月 7 日，

---

[1] 林长民是典型的政客，身段一向柔软。屈服于袁世凯后，极尽献媚之能事。刘成禺《洪宪纪事诗》云：“新华名字刻银瓶，御笔泥封制掖庭。日下艳传林博士，小臣近得小宁馨。”注云：“侯官林宗孟长民，能文章，善议论，书法《瘗鹤铭》，佳士也，而思以政治家见长，卒丧其身。洪宪建号，出力最多，位不过上大夫，得意之间，殊形郁郁。洪宪纪元，宗孟生子，一日朝见项城曰：‘臣长民民国元年，曾生一子，一月即殇，足见共和制度，不适宜于人民。今上元旦登极，圣主当阳，春和四被，长民竟诞生一子，伏呈皇上，肇锡嘉名，他日长成，永为帝国良好臣民，门楣之光，宗族之庆云云。’项城执笔书赐‘新华’二字，命侍从文官长刻于银瓶，缠以黄绶，双龙镂匣，制美香檀。某日礼官齐往林宅，长民列案谢恩，正位龛上。满月设汤饼宴，先行礼启匣，而后会宾客，抱新华出遍示诸友曰：‘此小宁馨儿，今上赐名。’前在沪谈及新华事，汤济武化龙曰：‘予曾恭逢其盛，亲闻“今上赐名”四字。长民好谈欧制，人皆以林博士呼之。……’”（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183 页）

[2]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 80—81 页。

[3]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 页。

张钫从陕西进京，到总统府拜谒袁世凯，见面之后，从张钫籍贯河南新安县铁门镇谈起。袁世凯说："我二十岁时来往陕西，经过铁门，住过两宿，还记得店在路南，街东有河，两山对峙，形势和风景都很好。"张钫惊讶其记忆力之佳，说得全对。"他接着又谈他幼时经过豫陕所见到的崤函之固、潼关之险、关中倚山带河的形势以及周、秦、汉、唐的遗址残迹，甚至比我知道得都详细。"随后谈张钫的家事，"这时我心中暗想，他日理万机，怎么对我家的琐细事都知道得这样清楚！"虽以反袁为使命，张钫不得不承认，袁世凯辞色温和、洒脱，很有魔力。[1]

继续说袁世凯笼络人心的故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被免去直隶总督，进京任外务部尚书，入军机处，成为中枢重臣。按惯例，他要四处拜客，这一天拜到了内务府大臣增崇家里。其时增崇之子察存耆还是小孩子，据其回忆：

> 有一天，他（袁世凯）来拜会我父亲（增崇，字寿臣）。那天我正在学房上课，我父亲的跟班到学房来叫我，说是袁世凯来了，他要见我。我父亲唤我去见他，并要我先换换衣服。我听说是袁世凯，非常高兴。因为我曾西听一言东听一语，在报上也曾见过不少关于袁宫保的故事。今天遇到这样一个机会，我正好看看他是怎样的与众不同。
>
> 我走出书房，换好衣服，就打定主意要给他行旗礼（请安）。若是父亲申斥我行错了礼，我就说因为不常行汉礼，一时忘了。

[1] 张钫：《我在反袁护国期间的经历》，氏著：《风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76—177页。

于是我跟着我父亲的跟班走进客厅。一进门，我走了几步，随即又向前抢行到袁世凯跟前，认认真真地给袁世凯请了一个安（屈一膝），叫了一声“大爷”（“大爷”也是旗人中称呼比较亲近的人的敬语，对汉员则应当称“老伯”“太世叔”等等）。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似的离了他的客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我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意料之外。当时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双手紧紧拉着我的双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过头去对我父亲说：“让我们先谈一谈。”我父亲当然便不再言语。原来那时的习俗，尤其在官场里，若要同人家子侄说话，并不直接问本人，而要先向其长辈说明，再由其长辈命其好好回禀，然后才由其本人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这时袁世凯便问我：“经书都读过了吧？”我说：“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读经是要慢慢地读的，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我当时想，我们旗人太不讲究读书，不可叫他小看了，我要显显我的志气，也给我父亲听一听，就回答说：“为将来考学堂，目前正预备学堂的各门功课。现用的教科书，只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几种，似是有点不足。”袁世凯说：“好，好。明天我就给送过来。”他一面说一面看着我父亲，又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于是我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

我一面走一面想，袁世凯张口老弟，闭口老弟，给我还安。

这可一点也不像我所见过的那些汉员如王文韶（大学士）、鹿传霖（尚书）那样的神气。我见王文韶时，我给他一揖到地，他连座位都不离，手里的水烟袋也未放下，只是半起半坐、歪歪扭扭地拱一拱手就算还礼。我对王文韶那种倚老卖老的傲慢神气很不高兴。我对老师陈述了方才见袁世凯的情况。老师是旗人，听了之后，也连说："瞧瞧人家，这才真正是干才。要是多有几个袁世凯，中国何愁不强！"老师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可是外边都说袁世凯居心叵测，也许和曹操一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也真说不定啊。"

第三天的中午，我刚下早学，就看见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可能即"五车"之意）。门房的人对我说："袁大人差片给少爷送书。"我一看那张大红名帖上的"袁世凯"三个字上，又加了用墨笔写的"世愚弟"三个小字。打开书箱一看，其中有天文、地理、经济、政治、音乐、教育，以及兵法、军事、哲学、法律、国际公法、伦理等各种东、西洋学说的译本，还有多种教科书，真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而且都是京师大学堂所编辑，直隶或湖北官书局出版的。[1]

有人会说，袁世凯礼待察存耆，和他聊天，给他送书，醉翁之意，则在增崇。这属于合理推测，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哪怕是敷衍，对待一个孩子，功夫都能做到这一步，足见袁世凯笼络人心之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何况袁世凯未必在敷

[1] 察存耆：《袁世凯与奕劻》，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189—191页。

衍，他的情商极高，最擅长与人打交道，就像其幕僚张一麐所描绘的那样："……（袁世凯）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1]

结之以恩义过后，再说厚之以爵禄（权位与金钱）。这是袁世凯最惯用的权术。与李鸿章一样，他也"好以利禄驱众"，早年无权无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自出任直隶总督，执掌北洋之后，一手持禄，一手持利，四面出击，所向披靡。所收买的人，下不必论，上可至先后领导军机处与内阁的庆亲王奕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病重，袁世凯推测将由奕劻领导军机处，遂派幕僚杨士琦送上白银十万两（一说二十万两），成功搭线，"奕劻既掌枢府，家中大小婚丧喜庆之事都由袁世凯一手包办，无须自费一文。"[2]从另一面来讲，奕劻为袁世凯办事，也是死心塌地，以致肝脑涂地，连老祖宗的江山都能舍弃，主动劝清帝逊位，被溥仪记了一笔黑账："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3]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奕劻与其子载振也曾有意劝进，却又畏首畏尾，转请徐世昌出头，说来更是不堪。[4]

---

[1]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第43页。

[2] 察存耆：《袁世凯与奕劻》，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188页。

[3]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4] 据沃丘仲子（费行简）《徐世昌》一书，载振曾奉其父奕劻之命晋谒徐世昌，载振道："项城天与人归，似宜速正大位，俾天下宁一。"徐世昌笑道："然则，君父子何不劝进？"载振道："恐贻我宗人笑，故以告子，乞为领袖，敦劝项城。"徐世昌道："然则，我不独畏贻旧日同官笑乎？望君勿再言。"（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第27页）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曾抛开陆军部、海军部的军需司，甚至抛开财政部，专门设立了一个财政机构，叫军需处，由爱将唐在礼兼任处长。军需处最重要的开支，名曰特别费；特别费最重要的用途，名曰政治怀柔。怀柔对象五花八门，除了政敌、媒体等，连袁世凯自家的北洋系，有时也得用钱收买。唐在礼曾列出一个名单，知名人物不下八十，其中满人如奕劻、世续、荫昌、铁良，北洋系大将如冯国璋、倪嗣冲、郑汝成、张勋、曹锟，地方实力派如龙济光、唐继尧、张作霖、汤芗铭、赵倜，进步党如梁启超、汤化龙，革命党如蓝天蔚、张绍曾、汪精卫，以及前面提到的张钫等，此外还有“自己人”一栏，包括朱家宝、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阮忠枢、段芝贵，当然少不了杨度。[1]对此名单，袁世凯大可志得意满，高喊一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能以利禄驱众，则当善于谋利。袁世凯筹款也是一把好手。他任直隶总督之初，曾大施权术，筹得巨资。此事多有记载，以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叙述最详：

> 李文忠既薨，项城继任直督。两宫回銮后，国帑一空如洗，太后饬项城筹特别款项。项城欲使所属各富僚报效巨金，因于署设盛宴，折柬邀饮，道以己意。各官皆历言窘状，所得俸金，不敷需用，婉词谢之。项城思得一策，会届岁阑，忽传天津蔚长厚票号执事某甲入署，伪言刻有大宗公款，欲存储贵

[1] 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122—135页。

号。某甲立允其请，询以需息金若干，项城曰："三分。"某甲笑曰："敝处存款，其子金至重不过八厘，若曰三分，实不能负担。"项城曰："此官款也，不可以他项论。"某甲曰："敝处惯与官场往来，所存之官款亦至夥，如某藩司三十万，某臬司二十万，某道员、某总办、某统领各有所储，先后不下百余万，其息率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无有出一分以外者。"项城曰："吾不之信。"某甲曰："宫保如疑吾言为伪，吾行取根账呈核何如?"项城颔之。及某甲携簿册至，正欲展阅，忽戈什哈（护卫）告有客谒见。项城谓某甲曰："子姑返，此簿册俟吾检阅后再交还也。"某甲唯唯出。越日，往索簿，阍人则以未核对，如是者数次，已届新年正月上旬矣。清例，每逢荐岁，印委各官必诣督辕贺禧。项城见名列簿册者齐集，乃同时传见，且留之饮宴。席间，又提及筹款事，各官仍如前言以对。项城艴然变色曰："吾颇闻公等各有巨资储蓄蔚长厚票号，胡均告我穷匮耶?"各官力辨其无，项城于袖中出簿册以示之，众一致不敢承认。项城曰："吾固谓公等必无此造孽钱者，是必奸商假托公等名义也。"于是立以电话召票号执事某甲至，厉声斥曰："适吾遍询各大人，咸谓并无巨款存汝号中，汝胡为假用其名?法当惩。"某甲俯首不答。项城曰："既为人假冒，盍以是款入官?"乃不容置辩，派员偕某甲去，按册名提取，约百余万金。各官怅惘而退，徒呼负负而已。[1]

---

[1]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上)，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218—219页。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亦有记载，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10—11页。

虽有黑吃黑之嫌，这个权术故事，读来却相当快意。这也印证了一点，权术并非通体厚黑，有时亦可发光。

最后再说威之以刑杀。袁世凯在后世，被严重妖魔化，好色如命、嗜杀成性云云，天下之恶皆归焉。实则他的性情，绝非残虐不仁，而以宽厚著称，对于暴力，则如圣人谈兵，往往不得已而用之。他这一生，青年纵横朝鲜，杀伐果断，然而其地近乎战场，势所必然；此后唯有在山东巡抚任上对付义和团一节，大造杀孽，横遭物议，背上了“屠人”或“人屠”的恶名。话说当时朝廷已经明诏褒奖义和团，视之为义民，他为什么还敢于剿办，何以向朝廷交差呢？其权术由此派上用场。为了驱逐义和团，他软硬兼施，一面哄骗：“津沽战船毕集，洋兵麇集一方。现已调兵勒捕，断难任其逞强。洋人罪大恶极，无不立见消亡。谕尔拳民义勇，均各效力疆场。现既叠邀重赏，尤应激发天良。速赴前敌助战，毋再羁留故乡。”[1]一面威胁：“凡真正拳民，均已赴京、津助战，其在内地逗留者，决非真正义民。凡伪充义民滋事者，杀无赦。”[2]对此，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称道“妙想绝伦”。

另有一说。有人问袁世凯：“上谕命保护义和拳，公何独剿之不遗余力？”他回答：“我所剿者，皆土匪假托义和拳。上谕所谓义和拳者，皆能赤身与子弹相拒，岂有应枪而倒，尚得

---

[1] 张寄谦：《义和团在山东活动情况二三事》，《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106页。

[2] 同上，第217页。

谓之义和拳乎？”[1]言下之意，如果死在官兵枪下，说明没有神通护体，必是假义和团，盗名欺世，死了活该。其权谋之深，措辞之绝，令人叹为观止。不得不说，这一招威之以刑杀确实管用：以枪杆子恐吓义和团，使他们要么逃出山东，要么偃旗息鼓。自此，“而直隶境内之匪，亦遂不敢越雷池一步”[2]“……直东交界之德州成一有匪无匪之界线，拳匪不能越山东而南，长江乃以定互保之局。”[3]

袁世凯使用权术，最经典的一例，窃以为应是与日本人谈判“二十一条”。1915年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件，意在使中国变成“高丽第二”。袁世凯与日本斗争已逾三十年，自然不从，可是国力强弱悬殊，拒绝即开战，开战则必败，两难之际，正考验他的权术。谈判期间，他几乎穷尽所有手段，如造势、拖延、策反、以夷制夷等，硬生生把二十一条砍到十二条，即《中日民四条约》。哪怕协议达

---

[1] [日] 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如书中记载，袁世凯此举，似得自部下程某：“袁在山东正剿义和团，忽奉谕旨，命各督抚招募义民练拳。有统兵官方得胜，先一日奉袁命令拔队往沂州剿匪，至是往谒袁，请示行止。袁曰：‘余命尔办假义和拳，非命尔剿真义和拳。’方又请示如何分别义和拳真假。袁曰：‘真假尔均不知，焉能统兵？’回顾先锋官程某曰：‘尔知之乎？’程甚慧，遂告曰：‘遇义和拳但迎击以枪，毙者假也；真义和拳能避枪炮，击必无伤。’袁遂以方事委程。”（第211页）

[2] 同上，第138页。

[3]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第34页。此节提到袁世凯如何识破义和团神术的故事：“拳匪起于山东，袁抚继毓贤之后。时袁之翼长为姜桂题，本淮军宿将，目不识丁，言于袁曰：‘有神拳师不畏枪炮，盍试之？’袁乃听其所为。拳师云：‘须搭高台，三日行法。’三日后，袁令陆军环而发枪，拳师尽殪，乃悟其诈。”（第33页）

成，他也不肯买账，而试图架空、破坏。此事交给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叔度）办理，据曾氏回忆：

> 我草一条陈，内容大致言，已答应了的各条，宜速筹补救之法：（1）破坏杂居，宜订一外侨内地杂居条例；（2）破坏租地、购地，宜订一外侨永租地权条例；（3）破坏警察顾问，宜订聘雇外人条例。于条例中寓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似此之类，尚有若干条。条陈上后，项城（袁世凯）告我云："你的条陈，意在破坏，但你系法家，只知法律，单靠法律，破坏不了条约。我已筹画好了：（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云云。[1]

此外还有一段插曲。张一麐——即曾彝进文中云"项城所用老秘书某君（苏州人，屡以正言规项城，项城极尊此人，而不尽用其言）"——本来反对签订"二十一条"，签约之后，听说袁世凯嘱咐曾彝进暗中破坏，大不以为然，劝阻道："既签定条约，即应忠实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与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彼明言不能应允之故。如彼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

[1] 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

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我意本应坚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客所为。白水黑山，暂同弃地，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亦一策。”袁世凯斥为书生之见，并云：“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1]

这些办法，实属无赖，到底有没有用呢？不妨看看日本人的反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发生在大隈重信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时期。1916年10月，大隈内阁倒台，起因即对华外交办理不善。寺内正毅继任，改武力压迫为经济渗透（如“西原借款”），从豪夺变作巧取。其下野之时，曾为自己表功：“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予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2]——这则是日本人的权术。

我们讲了这么多袁世凯的权术故事，若论留给后世的最大启示，与其说为权术正名，不如说充分呈现了权术的局限。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梁启超曾撰文痛斥道：“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曷尝有所谓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纵横披猖，盘旋薰灼于人人心目中而已。”[3]岂止中华民国这四年如此

---

[1] 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第288—289页。

[2]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第116页。

[3] 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08页。

呢，袁世凯平生行事，正以黄金与白刃——有时加上恩义——为利器，纵横捭阖，网罗天下。他用恩义笼络了一些人，黄金收买了一些人，白刃威慑了一些人，这些人中，不乏高人雅士、英雄豪杰；然而终归还有一些人，不为恩义所欺，不为爵禄所动，不为刑杀所夺，如宋教仁、蔡锷，以及1915年后的梁启超等。他们信仰的是真理，怀抱的是大义，坚守的是人格。在此三者筑成的铜墙铁壁之前，权术暴露了极其脆弱的一面，几乎一触即碎，毫无用武之地。对此，严复的弟子侯毅总结道："项城（袁世凯）以智术驭下，误以为举世之人，皆可以威胁以利诱，故其术可以笼络千百中才，而不能网罗一二奇士，此其所以败也。"[1]

还得注意一点。借鉴古人的术、势、道之说，权术者，顾名思义，与道无关。[2]就前二者而论，术只是小节，势才是大道，术的力量，只能操纵二三子，势的力量，则可激荡一国风云。故而权术大师的眼光，往往不在术，而在势，他们大都擅

---

[1] 侯毅：《洪宪旧闻》，王建中《洪宪惨史》附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96页。袁世凯的用人风格，被视为他之败亡的一大原因。徐世昌云："……民国以来，没有任重致远之才，都是争权夺利之徒。……项城利用若辈，自无远大成就之可言。"（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364页）王锡彤云："今大局渐定，一班青年志士死者死，逃者逃，中央不一顾及，乃搜求一班亡国之清流以为座上客，又甄录一班嗜进无耻、热中利禄之恒流以充塞庶位，欲以勤求治理，殆其难哉！"（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03页）

[2] 法家好讲法、术、势，道应为后人所加。杨虚白曾借这三者谈武术，所言甚是精妙："任何武术，学到极致都几近于禅。力最下，招其次，招之上才是术，然后是势，最高才是道。"（杨虚白：《挥戈》，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52页）后来他又修正了这一说法，认为武术的最高境界不是道，而是返璞归真，即"本来"。

长借势，更高明的人，还能造势。武昌首义，袁世凯出山，上下其手，左右开弓，挑动大清与革命党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便是借势的典范。不料数年以后，他竟复辟帝制，逆流而动，站在了势的反面。此刻哪怕他的术再多，与大势相抗，必败无疑。[1]

三、袁世凯之学

说罢术，再说学。学，顾名思义，首先指学问。古人考量学问，最世俗的标准，当推功名。不幸的是，袁世凯功名太低，两次参加乡试，皆名落孙山，与举人无缘。光绪八年二月初九日（1882年3月27日），他在信中向三哥袁世廉发誓："弟不能博一举人，不能瞑目。"[2]然而不久即将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大呼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3]自此效仿班超，投笔从戎，戎马半生，誓言落空。试看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大都是进士出身，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张之洞更是高中探花，左宗棠功名止于举人，竟成心病，耿耿于怀数十年。袁世凯还不如左宗棠，

[1] 王锡彤称袁世凯"公一生得力处在乘机以立功，而洪宪乃自己造机"（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38页），此处之机即势，乘机即借势，袁世凯的确是此道高手。然而复辟帝制，名为造势，实属逆势。势可分造势、借势、顺势、逆势等四种。逆势者，无不败。

[2] 袁世凯：《致三哥袁世廉函》，《袁世凯全集》第1卷，第10页。

[3]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7页。

则不免被俗人鄙视、吐槽，讥为“不学”。[1]

昔日之功名，可比今日之学历。我们都知道学历与学问的关系：有学历不等于有学问，没有学历不等于没有学问。那么姑且把功名或学历搁在一旁，从读书和作文——古人考量学问，还有一个直观标准，即观其读书多少，作文如何——观测袁世凯的学问。说到读书，柴小梵写袁世凯，第一句话便是“袁世凯读书甚少”；[2]袁世凯自己也说一生“历事时多，读书时少”，看来无可掩饰。从书信、奏折等来看，他的文笔不坏，却也谈不上有多好；虽能吟诗作赋，如“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大有气魄而失之雅驯，在郑孝胥这样的大诗人看来，则难入流；其书法出自馆阁体，虽然笔力雄健，有云游雨骤之势，不过终究未能自成

---

[1] 斯蒂芬·R.麦金农曾对比袁世凯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和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参加自强运动的上一代老牌政客不一样的是，袁世凯对正式的政治思想问题不太感兴趣，也不太敏感，这在其仕途生涯被证明是一大致命弱点。尽管袁氏可能是其同代人中最为实干的改革者，但对他的解释总是简短而乏味。作为重视行动而又沉默寡言的人，他最关心的是手中权力的大小。”（[美]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牛秋实、于英红译，张学继审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页）袁世凯与李鸿章、张之洞的这点区别，原因之一正可归结于“学”与“不学”。由于“不学”，袁世凯不大关注政治理论与观念，有时甚至无力去思考这些问题。他更接近实用主义者，尽管他曾用办事为自己包装：“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陶菊隐：《张文襄幕府纪闻·近代轶闻》，第32页）

[2]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上），第216页。

家数，难称一流……由此而言，袁世凯还是无法摆脱“不学”的标签。

前面说过，学不仅指学问，还指见识。关于见识，我们谈李鸿章的时候，曾以从西方舶来的“新思想”为参照。李鸿章没有新思想，那么“再传弟子”袁世凯有没有呢？1915年6月19日，严复致熊纯如信中云：

> 大总统（袁世凯）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国事之所以重可叹也。[1]

严复对袁世凯的批评，有一要点，即“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决定了其认知与视野，只能治理一地，难以治理一国，适合旧日帝制，而非今日共和。这一点在当时，可谓共识。黄远生一再强调，袁世凯温故而不知新，“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又其思想终未蜕化，故终不能于旧势力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2]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撰文解剖其人，共列出七大缺点，称“袁氏之第一大缺点，则其头

---

[1]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四)，氏著：《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4页。

[2] 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氏著：《黄远生遗著》，第12、1页。

脑与今世之国家观念，绝对不能相容也”，其头脑装满了“二十年前老督抚最腐败最顽固之思想”，因此，“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1]袁世凯死后，黄炎培总结其失败之教训，第四条云“其知识不与地位称，必败”。[2]

更详尽的论述，来自曾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1912年秋，他与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

> ……他（袁世凯）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
> 我说，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

---

[1]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氏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4—19页。可惜此文未能写完，止于第二节“袁世凯是否可称为政治家”。

[2]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页。

年来又传播到亚洲。我接着说，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他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提这段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1]

1913年11月，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第一次觐见袁世凯，判定“他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

[1]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6—87页。

他（袁世凯）不了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虽然他受过训练，见多识广，但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没有到过外国，也不懂得外国语。因此，他对于中国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只可能有一个淡薄的、模糊的观念。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同样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他只把这些当做必然有的恶事而接受下来，且认为其应用范围越小越好。[1]

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呢？涉及动机，不可追问。[2]不过，如顾维钧、芮恩施等所回忆的那样，

---

[1]［美］保罗·S.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21、25页。芮恩施说袁世凯“没有到过外国”，实则袁世凯青年时期曾征战朝鲜。对此，梁启超有所解释：“夫袁氏产生于六十年以前，且其足迹未尝出国门一步。袁氏曾到高丽，其时高丽犹中国领土也。袁氏不独未尝出国门，并未一到扬子江流域。其不能晓解现代文明之真相，本不足深责。”（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氏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13页）当然梁启超此言也有问题，袁世凯少时曾在南京生活，并在上海谋事，南京、上海都属于扬子江流域，其年未弱冠，足迹已经遍布江南塞北。梁启超所言高丽即朝鲜，甲午战争之前为大清属国，翌年签订《马关条约》，第一条即承认朝鲜独立：“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

[2]对此问题，贝克的看法斩钉截铁：“他（袁世凯）的政治经验仅限于帝制的方法，他可能对共和主义有些模糊印象，却不会使用共和方法，就像他知道空中飞人如何旋转，自己却不会旋转一样。他的习惯已经定型，无法突然改变，而此习惯是帝制，而非共和的。不必幻想假如袁世凯内心倾向共和，历史的进程将会改变。铁的事实是，他内心不倾向共和。”（John Earl Baker, *Explaining China*，转引自张玉法：《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军事对抗（1912—1914）》，氏著：《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

袁世凯对于民主、共和等现代政治观念，茫然无知抑或一知半解，比他所鄙视的“中国的老百姓”好不了多少。其中，他对政党与议会政治尤其充满偏见，不知其利，徒见其害，认为由此而生的乱象，将使新生的民国四分五裂，卷入瓜分豆剖之祸，所以他选择的对策，不是疏导，而是强行压抑与禁绝。黄远生的一位朋友说：“袁总统一世不会办的事是财政，将来中国恐以财政亡国。”黄远生批道“此迂言也”，他认为“袁总统一世不会明白的事是政党”。[1]

要言之，袁世凯的知识结构问题——除了严复所云缺乏科学、哲学知识与世界眼光，还缺乏政法知识与历史眼光——不仅严重束缚了他的政治视野，还在他身上造就了一种转型时代所特有的分裂：其肉身进入民国，头脑滞留于清朝。就像他所治下的国家，制度进入民主，观念滞留于专制。这样的分裂，使这个共和国的执政者在治理过程当中左支右绌，进退维谷，最终沦为共和危机的制造者。当危机爆发，他的知识局限所滋生的危害，愈发巨大而鲜明：其视线，不是习惯向前看，而是习惯向后看；其方向，不是知难而上，而是知难而退；其手段，不是创造新办法，而是重启老办法。所谓老办法，即帝制，他企图复辟帝制来应对共和危机，殊不知帝制本身便是最大的危机；他竭尽所能都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因为他自己便是最大的问题。

从袁世凯的悲剧，可知一个转型国家的执政者，如果缺乏

---

[1] 黄远生：《政谈窃听录》，氏著：《黄远生遗著》，第248页。

足够的现代知识，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与国运，“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大体说来，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对应国家转型的方向感，构成了转型成败、国运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有之转型未必成功，没有必不成功；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下限。以袁世凯为例。假如他具备“科哲知识”“世界眼光”等，中华民国便一定能够崛起吗？谁也不敢打包票；反之，如历史所示，恰因他的“不学”，使共和陷入危机，转型陷入逆流，逆水行舟，一退千里，竟退回起点之前。对此，他在死前幡然悔悟，甘愿领受自己的罪责，不失英雄本色，只是相比其个人身名俱败，国运沉沦，至今百载，思之更令人痛心不已。

四、遗言之谜

1916年6月6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他留给那个崩裂的世界最后一句话，不止一个版本，最流行的说法，无疑是那句“他害了我”。与此相应，待袁世凯死讯传出，时人纷纷感慨他为小人所蛊惑，误入歧途，倒行逆施，身败名裂，忧惧而死。譬如曹汝霖称“一世英主，惑于佥壬，一念之差，贻恨千古，可悲也夫”[1]——“佥壬”即小人；王锡彤说“一班宵小益得以种种媚术蛊之，而洪宪之祸作矣”；[2]张謇哀叹道：“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

[1]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66—167页。

[2]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38页。

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1]连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清朝遗老恽毓鼎，都为之惋惜不已：“初衷忽变，为德不卒，忠信两失，实左右群小误之也。”[2]……那么，袁世凯口中的“他”与时人眼里的“佥壬”“宵小”“群小”等，到底是谁？

有人含糊其辞，有人则正色直言。张瑞玑《吊袁项城》诗云：“有子不才误刘表，失计无端听蒯通。”[3]虽用典故，却不隐晦，稍通史事，可知前半句指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后半句指其幕僚杨度。

复辟帝制，除开袁世凯本人，袁克定当数第一推手。彼时若论袁世凯称帝谁最热心，谁最卖力，将来谁收益最大，答案都是袁克定（袁世凯当总统，以袁克定的才具，哪怕老子一力扶持，至多官居一部之总长；假如袁世凯当皇帝，作为嫡长子，袁克定则与其觊觎的皇位近若咫尺）。帝制运动的关键环节，皆可见他的忙碌身影，如筹安会之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之组建等。最出格的行径，则属篡改《顺天时报》，伪造舆论，误导其

---

[1] 张謇：《张謇日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808页。

[2]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771页。虽然政见分歧，恽毓鼎对袁世凯盖棺论定倒也不低：“袁大总统上午十时逝世，年五十八岁。固一世之雄也，一误于辛亥之推倒清朝，再误于乙卯之欲登帝位，结果如斯：众叛亲离，赍恨长往。若使辛亥之冬力主君主立宪，奉宣统皇帝于上，而己以王爵筦内阁，揽大权，削平东南巨乱，何惭千古第一流人物。即不然，始终以总统制治世，为民国第一任开先，亦不失为英杰。初衷忽变，为德不卒，忠信两失，实左右群小误之也。”

[3] 张瑞玑：《吊袁项城》，转引自卫洪平编著：《张瑞玑先生年谱》，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16页。

父。[1]是以在袁世凯病情最严重的时刻，袁克文（袁世凯次子）

---

[1] 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一事，引用率最高的史料应是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谌旭彬判定不实，认为民国时期并无此说，事实乃是袁乃宽等伪造上海《时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时人所撰《虎厂杂记》云："筹安时代，京中各报，慑伏于权力之下，咸一致拥戴。唯《顺天时报》颇多讥讽不满之词。然此报为日人机关，且日人什九与项城不睦，宜其有非难之声。故时人则不重视之。唯上海各报，除薛大可组织之《亚细亚报》外，所持论调颇为国人所注目。……项城在京中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竟瞠目结舌，觳觫而不能对。"（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第190—191页）然而，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则云："袁氏称帝，欲假民意为护眼，而攀龙附凤之徒，遂汲汲于民意之制造。北京报纸三十余家，千篇一律，颂皇恩之浩荡。惟《顺天时报》，独持异致。每日必有攻击君宪之词，而报端大书'中华民国五年'数字，尤足引起一般之感触，令人有满目河山之悲。然在袁氏视之，未免为民意君宪之污点。去之不得，乃有八万金收买之议。交涉数四，卒被拒绝。（此处可见日人拥护其政府政策之坚定。反之，若中国人在国外，组织一种日报，其所在地之政府，亦出数万金收买，能拒绝之乎？）不意袁克定、袁乃宽等，于此无法之中，妙想天开，不出新华宫一步，居然有君宪论的《顺天时报》出版。此种假扮之《顺天时报》，每天只出一份，送阅者只袁皇一人，而销路则不越新华宫门外。斯真吾国政治罪恶史中，不可忘之一事，亦北京新闻界中可痛心之一事也。"（杨光辉、熊尚厚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85页）此条录自《民国日报》1919年2月4日，足可推翻谌旭彬的论断。另据侯毅《洪宪旧闻》："闻项城所阅报纸皆由府中人修改后重印进呈，多称颂功德之文。一日王士珍进谒，项城示以报纸，颇有矜色。王曰：'外间报殊不尔。'乃检外报呈阅，项城默然，始知为左右所绐也，然势已不可挽矣。"（王建中《洪宪惨史》附录，第93页）虽未明言谁伪造报纸，伪造何种报纸，其所述之大概，可与《虎厂杂记》《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等互证。约略言之，亲信伪造报纸欺骗袁世凯，使其困于信息茧房之中，殆无疑义。

曾冲袁克定抱怨道："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1]袁家人纷纷表示同感。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曾抚棺痛哭，大呼："我对不起爸爸！"[2]王锡彤前去吊唁，安慰袁家诸子，袁克定"自称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致贻祸老父"。[3]看来，袁克定害了袁世凯，乃是事实，当事人与旁观者都不讳言。

不过舐犊情深，袁世凯并未降罪于长子。据袁克齐回忆："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日），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4]这么说，则把袁克定视作受害者，看来那句"他害了我"，与其无关。

相比悔恨交加的袁克定，杨度态度相当强硬。作为《君宪救国论》的执笔者与筹安会的发起人——前者被视作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信号弹，后者则可比先锋队——对于袁世凯的败亡，他不觉得自己该承担什么责任，反而认为袁世凯辜负了他所守护的君主立宪制。试看其挽袁世凯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

[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63页。

[2]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83页。

[3]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37页。

[4]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79页。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1]

问题来了。这边厢，杨度否认自己害了袁世凯；那边厢，袁世凯的遗言，在一些场合，直接变成了“杨度误我”。无独有偶，时人论袁世凯复辟帝制之误，有一派声音，首先归罪于杨度。除了“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可恨筹安六贼，败我公一世雄名”等相对笼统的说法，还有一些则直接点名，如薛子奇云：“用杨度而天下之政客走开，用夏午诒而天下之幕府走开，用段芝贵而天下之军人走开，用梁士诒而天下之理财家走开。”夏午诒即夏寿田，与杨度同出王闿运门下。章太炎云：“袁之败由于三人反对三人：梁启超反对杨度，张一麐反对夏寿田，雷震春反对蔡锷。”[2] 1916 年 7 月 14 日，官方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列出八名要犯，杨度排名第一，堪称祸首之首。两说针锋相对，我等何去何从？

关于杨度，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军师、帝王师、心腹幕僚等（刘艺舟剧本《皇帝梦》讽刺袁世凯，“新华宫”一节云：“孤王酒醉新华宫，杨皙子生来太玲珑……”简直把杨度写成了袁世凯的男宠）。事实上，杨度进入袁世凯幕府，为之出谋划策，迟至武昌起义之后，比王锡彤还要晚。民国初

---

[1] 杨度：《挽袁世凯联》，《杨度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11 页。据杨度之女杨云慧所藏抄件，挽联还有一个版本，措辞十分决断：“共和决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以还，再评此谳；君宪不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2]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 2 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年，第 260 页。

年，他不受重用，郁郁寡欢，欲对袁世凯施加影响，有时还得借重他的师兄、时任总统府内史的夏寿田——相对袁世凯，他与袁克定的关系毋宁更加亲密。其时袁世凯手下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之说，纵是闲人的杜撰，足见人才之盛。这里面，论才人与策士，徐世昌、赵秉钧（此人文武双全）、杨士琦、梁士诒、阮忠枢、张一麐等，与袁世凯的亲信度，以及袁世凯对他们的倚重，都在杨度之上。若把幕僚排排坐，杨度恐怕不在最核心的那一层。

进而言之，即便杨度是袁世凯最亲近的幕僚，便可令主公言听计从吗？须知袁世凯既有海纳百川、礼贤下士的一面，同时极具主见，极其自信以致自负，从不轻易受人左右。据黄远生观察：

> ……在其（袁世凯）平日能容颐指气使之人，而不能容师友及平等之人，故能进规随之谈，而不能容忠谅之士。故夫巧谋杂计，其所喜也；直言新策，其所怫也。自以阅历深，气魄伟，平生历史宏富复杂，举世无二，除左右驰驱效死力者外，皆以竖子视之，而不悟今日潮流之不可抗。其左右亦无敢进言者，谀言日至，而忘其非。忽帝忽天，而不审大局之将不可救。故其直系之党益多，而其举动将益自蹈于根本背谬之地。[1]

说白了，袁世凯只能容纳支持他的人，不能容纳反对他的

[1] 黄远生：《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氏著：《黄远生遗著》，第35—36页。

人；只能听取赞美他的话，不能听取批评他的话。拿复辟帝制来说。大幕拉开之时，赵秉钧已经去世，徐世昌模棱两可或王顾左右，严修、梁士诒、张一麐、王锡彤等均表示反对（后来梁士诒在“三次长参案”与“五路大参案”的压力之下被迫转向赞成）。论分量，这些人的意见显然都重于杨度，却因不合袁世凯心思，统统被抛诸脑后，置若罔闻。反过来讲，袁世凯称帝，不是因为采纳了杨度的意见，而是因为他本来便作如是想，以其自负的性格，假如不愿称帝，哪怕杨度写上一百篇《君宪救国论》，都将归于徒劳。故而丁中江说：“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1]

袁世凯的自负，另一面则表现为担当。1916 年 3 月 22 日，他召张一麐进宫——张一麐因反对复辟帝制，被袁世凯有意闲置，从政事堂机要局长调任教育总长，“阳为显擢，意实疏外”，此外还受到枪击、投炸弹等武力威胁，险些丧命，“仆自筹安会起，至帝制取消，此半年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2]——主动道歉：“予昏聩，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不可。”令即《撤消承认帝位案停止筹备事宜令》，一般称《撤销帝制令》，原由接任张一麐政事堂机要局长一职的王式通起草，袁世凯不大满意，请张一麐重拟。张一麐建议直接撤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随之宽解道：“此事为小人蒙蔽。”袁世凯则答：“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张一麐不由感慨“犹

[1]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 2 集，第 268 页。

[2] 转引自鲍牧松：《张一麐三谏袁世凯》，《书屋》2015 年第 1 期，第 39 页。

是英雄气概也”。[1]

张一麐起草完毕，袁世凯审阅，把文中谴责帝制派的语句尽数删去，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最后表示“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2]此即王锡彤所盛赞袁世凯的一点：“其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从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即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3]孙中山也说“袁之为人，甚有肩膀”。[4]须知古往今来，执政者敢于认错，勇于担责，相当难能，更常见的情形则是转嫁责任，诿过于人，如奸臣、太监、后宫、外戚等，他们往往沦为误国的代表。此中典型，当数崇祯，遗诏直言“皆诸臣误朕”，所谓“每抚心自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

撤销帝制之后，袁世凯与张一麐重归于好，常常抵掌而谈，有时并无要事，只是闲聊。他反思道：“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张一麐）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

---

[1] 张一麐眉批，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83页。

[2] 袁世凯：《撤消承认帝位案停止筹备事宜令》，《袁世凯全集》第34卷，第767页。

[3]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37页。

[4]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35页。

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只能与仲仁谈耳。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可不惧哉。”“读书时少”，造就了他一生最大病灶。“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则可见其忏悔与担当。对此，张一麐再次感慨：“观此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项城能出此言，毕竟是英雄本色。”[1]

这便令我怀疑，袁世凯死前到底有没有说过“他害了我”呢？因为这句话，与其生前三番五次强调“不能咎人”“不必怨人”“于人何尤”的情节严重不符。相形之下，另一版本也许更加可信。袁世凯临终之时，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张镇芳等守在病榻边上，徐世昌问：“总统有什么交代？”袁世凯竭力吐出两个字：“约法。”[2]陈志让《袁世凯传》的中译者将“约法”译作“立宪”，虽属失误，毋宁更为传神。[3]堪为注脚的是，袁世凯死后，张一麐在其办公桌抽屉里面发现了一副他亲自书写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4]

---

[1]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90页。

[2]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2集，第256页。

[3] [加] 陈志让：《袁世凯传：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王纪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4]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2集，第256页。另见陶菊隐：《政海轶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张瑞玑诗云："死不灰心真健者，生能悔过即英雄。"[1]

补记

袁世凯的遗言，并非尽是传闻，而有一则实证，此即收入《袁世凯全集》第三十五卷的《遗言数则》，共计四则，第二则云：

> 袁世凯病危，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至榻前，面授遗言，略云："苟予不幸死后，总统问题，可依《约法》解决。予之葬事，可任袁家自行办事。予病已重，不能躬阅公文书类，愿君等协力执政，维持地面治安。"言毕，遂昏睡无言。继而稍苏，则双眼垂泪，呜咽告徐曰："余自受国民付托之重，总揽大权，本无帝制之思想，乃一时昏聩，竟为佥壬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恶剧。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此诚余毕生之遗恨也。今自知不起，以家族托君照料。倘他日余家不遭大祸，便属万幸矣。"[2]

这是1916年6月5日早晨发生的故事，此时距离袁世凯之死还有一天。遗言一般指临终之语，故而这里的"遗言数则"，确切说来，应该叫"遗嘱数则"。其中"总统问题，可依《约法》解决"一句，呼应"约法"之遗言；"一时昏聩，竟为佥壬迷惑"一句，呼应"他害了我"之遗言。但是，如正文所云，袁世凯此前一直坚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为什么死前一天突然改口说"竟为佥壬迷惑"

---

[1] 张瑞玑：《吊袁项城》，转引自卫洪平编著：《张瑞玑先生年谱》，第216页。张瑞玑吊袁世凯诗共两首，对袁氏整体评价不高，唯此二句如异军突起。

[2] 袁世凯：《遗言数则》，《袁世凯全集》第35卷，第563页。

呢，到底哪个才是他的心里话？

这事关一个问题，即《遗言数则》的记录者是谁——当时袁世凯已经无力举笔，只能口述大意，怎么措辞，则给记录者留足了发挥空间。我推测，记录者的身份，不外乎两个人，一是第二则遗言提到的徐世昌，二是张一麐，而以后者可能性更大。若判定为后者，则不难解释，为什么其中会出现“竟为佥壬迷惑”这样的话。

袁世凯生命最后一段时光，张一麐追随左右，代行笔政。从《撤销帝制令》到《取消帝制本末令》(1916年5月29日)，都是他的手笔。他虽忠心事主，有时也会违背袁世凯之本意而自作主张。譬如袁世凯曾向他谈及劝进者的丑态：“前日推戴，今日反对者，比比皆是。……彼极力推戴，今乃劝我取消者，更卑卑不足道矣。”[1]对这些见风使舵的名利之徒不屑一顾，正可见袁世凯的气魄。然而，《取消帝制本末令》在重申“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余，亦云：“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2]这则与袁世凯“更卑卑不足道矣”的态度相冲突。以此类推，尽管袁世凯不愿诿过于人，张一麐却坚持为其鸣不平，他始终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此事为小人蒙蔽。”——小人当指夏寿田与杨度师兄弟——记录遗言，则不忘捎带一笔“竟为佥壬迷惑”。

---

[1]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90页。

[2] 袁世凯：《刊布取消帝制本末令》，《袁世凯全集》第35卷，第520页。

五、称帝时机

说罢张一麐，再说王锡彤。袁世凯这两大幕僚，都是气节之士，甚至堪称国士。张一麐入幕，应在光绪二十七年（1903年）。他曾自述在幕府第一年的情形，“除出见外未私谒府主，未尝求一阶，月薪六十金未尝求加一文，有所委托未尝辞谢。人或以为呆，或以为清，不问也。”[1]其清正之风，此后十余年，一成不易。这才有了袁世凯的当面夸奖“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并称“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王锡彤风骨之凛然，不弱张一麐。前面说过，他不爱权，不贪财，不好名，“曾向大总统声明，以白衣赞襄左右，决不忝厕官职，且使天下后世知袁大总统幕中尚有不慕官爵之人，亦药笼中一味也。”[2]言必信，行必果，他追随袁世凯期间，一再拒绝入仕，只领了一个参政院参政的闲职。这等人物，谁不钦敬？

袁世凯复辟帝制，王锡彤深表反对。其意见传出之后，被批忘恩负义，他说的确有人忘恩负义，不过不是他，而是鼓吹帝制之流，如筹安会诸公。他之反对，恰恰是忠于袁世凯的表现：“夫以余受大总统知遇不为不深，当此大祸临头，群儿踞此公于炉火之上，我不出一言以救之，殊呼负负。”“夫余之反对帝制，敢指天日，谓天下莫如我爱袁公者。耿耿此心，期不负

---

[1]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第41页。

[2]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91页。

知己而已。”[1]

需要注意，王锡彤反对复辟帝制，着眼点不在帝制本身，即主张民主反对君主，而归结于“时世不合”。这是什么意思呢？目睹筹安会兴起，他感慨道：

> 余思明太祖之有天下也，功在驱胡。汉人蜷伏于异族者将百年，明太祖为伸其气，故人心倾向，遂有天下者几三百年。清之有天下也，则在永不加赋一诏，为足系汉人之心，而慰其明末重赋苛征之苦，故其有天下也亦二百六十余年。今民国纪元而后，验契有费，公债派钱，且一切新税正在议行者，尤不知凡几，民间纷然以为加赋。且与日本交涉失败，薄海志士罔不短气。当此时而铺张功德，谋称尊号，得毋非其时乎？[2]

其要义，端在时机二字。说白了，王锡彤对民主、共和并无执念，认为恢复君主制亦无不可，袁世凯当皇帝亦无不可，前提是适逢其时，风云际会。眼下内忧外患，人心思乱，强行登基称帝，必将一败涂地。

这样的论调，并不孤独。当时反对帝制的人，大体可分三种：一、纯粹反对帝制，不管谁来当皇帝；二、不反帝制，而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三、不反帝制，不反袁世凯当皇帝，只是

---

[1]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12—214页。负负，意为惭愧。

[2] 同上，第211页。

反对袁世凯在此时此刻当皇帝。[1]第一种属于主流，包括革命党、进步党，以及段祺瑞这样倾向共和的北洋系将领，在他们看来，由君主而民主，乃是政治进化的潮流，反之则如逆流，必不可行，试看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规劝袁世凯之言："历史总是前进，世界潮流亦总是前进，此时世界趋势，独裁、民主正在交相摩擦，以后各国如有大政变，总是君主进而民主，断无民主退而为君主者。我国共和业经四年，君主尊严，早已唾弃，如再由民主恢复君主，那走得通？此乃潮流使然，不仅是一国问题。"[2]第二种以清朝遗老与拥趸为主，如康有为、劳乃宣、张勋等，他们心中，龙椅该由爱新觉罗氏来坐，袁世凯本是乱臣贼子，窃国大盗，焉能位居九五，威夸万乘；第三种貌似特异，实则大有人在，除了王锡彤，还有徐世昌、曹汝霖等，大都出自袁世凯的朋友圈，如此思量，则有私心与苦心。

袁世凯复辟帝制，他的铁哥们、北洋系二号人物徐世昌，表现并不热衷。说起来徐世昌乃是老派人物，对帝制本不反感。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面临抉择，其帐下大将段芝贵主张君主（代清称帝），段祺瑞主张民主，相持不下，请教徐世昌。他说：

---

[1] 1917年4月8日，适逢国会纪念日（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陈独秀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其中云："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此言向来被视为至论，可惜还是遗漏了王锡彤一派，他们连"袁世凯做皇帝"都不反对，只是反对袁世凯在这个节骨眼上做皇帝。

[2] 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民主顺时，姑取之，以俟异日。”[1]揣摩其意思，采取哪种国体，君主还是民主，不是价值问题，而是时机问题。此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他的判断与王锡彤相似，认为“内忧外患，隐伏无穷”，时机不当，准备不足，“从古大业之成，必有二三端恪诚毅之士，相与谋议于帷幄之中，沈思眇虑，横览九万里，下窥数百年，犹恐百密尚有一疏。今日者，呼号奔走，皆为名称之更换，而一切经国之宏纲巨制，一未预备，冒然从事，如何着手？”故以“衰病侵寻，力不从心”为由，请求辞去国务卿一职，放归田里，休养颐健。[2]不过他毕竟是绰号“水晶狐狸”的老滑头，虽不看好帝制，却不明白反对。袁克定征询他的意见，他摆出谁也不得罪的超然姿态：“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3]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讲，叫“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

1915年10月17日，曹汝霖父亲六十大寿，袁世凯除送寿礼，还附了三千元。翌日曹汝霖进总统府答谢，谈及帝制：

……帝制问题，外边论议不一，惟愚见以为为时尚早，因

[1] 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第26页。

[2]《徐世昌为袁世凯称帝辞职函》，《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第1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04—608页。

[3] 同上，第317页。据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为复辟帝制一事，袁世凯曾约徐世昌面谈，问道：“外间劝进事，大哥知道吗？事可行吗？”徐世昌沉默后答：“我不知此事。”袁世凯道：“外间喧传日久，你哪能不知道呢？”徐世昌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袁世凯一听，知其心存观望，即未再问（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6页）。

之有人以为我反对。我受总统知遇之深，何能反对？惟有愚见不陈，亦非尽忠之道。我所顾虑者，为时间问题。语云，虽有智慧，不为待时。方今民党潜伏伺隙，时想蠢动，欧战正酣，各国不遑东顾，日本野心未遂，难免不生枝节，五使劝告，均由日使发言，可见端倪。我意现在应先宣布参加协约方面战争，结合协约国，即使不派兵参加，助以物资，亦是一样。等到欧战告终，再看机会纯熟，外无后言，内亦团结，自然水到渠成。到那时协约方面，以我国共同参战亦是盟国之一，且是内政，决不干涉，日本不一定反对到底。那时时势所趋，即是天命攸归。若于目前宣布改制，似非其时，故敢冒昧直陈。[1]

对比王锡彤，曹汝霖说得极明白或露骨，为什么现在不宜复辟帝制，将来怎么做才能复辟帝制等，剖毫析芒，忠心可鉴。无奈袁世凯依旧装腔作势，大玩权术，称自己并无此意。曹汝霖也想，“……他现在地位与帝制无异，以项城之足智多谋，谅不至干此傻事。”稍后发现受骗上当，不再多言，“木已成舟，言亦无益”。[2]

徐世昌、王锡彤、曹汝霖等与袁世凯素来亲近，为其考量，尚可想象，另有一人，亦作如是语，则令人大跌眼镜。此即被视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急先锋梁启超。其名作《异哉

---

[1]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5页。“虽有智慧，不为待时”一句，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原文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镃基，即锄头。

[2] 同上，第145—146页。

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当十万兵，“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1]然而一旦细读，不难发现，其立场略显暧昧，远不如另一篇檄文——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其中明言复辟帝制“七不可”——态度坚决。文章开头，梁启超摆出老腔调：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只要政体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或共和，无一不可；倘若政体不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或共和，无一而可——这一观点其实有些站不住脚，过度贬低了国体的价值以及对政体的影响力。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君主制并不抵触：“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而且称“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随之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规划了两种可能性：“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后者自然不可预期，至于前者，“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2]大意是，现在复辟帝制，固然不是时候，不过只要袁世凯奋发有为，强国富民，假以时日，必可称帝，甚至届时你不称帝，老百姓都不答应，“亿

[1]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2集，第74页。

[2]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85—98页。

兆敦迫”，逼你当皇帝呢。

这番话连拉带哄，实如纸上画饼，而且自相矛盾：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之一即共和危机，假如在共和制下能够大国崛起，何必求助于帝制？当袁世凯成为霸主，功高权重，予智予雄，再一举而称帝，怎么把他关进宪政的铁笼？空有君主，而无立宪，政体被国体掏空，还说什么“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如果引文全是梁启超的真心话，而非退一步进两步的政治策略，那么他的思维与徐世昌、曹汝霖、王锡彤等并无不同，不问是非，只问利害与成败，把政治功利主义推向极致——有人喜欢说，政治没有是非，只有利害与成败，事实则是，利害与成败之上，依然有是非。

同样认为当下不适合复辟帝制，梁启超劝袁世凯向前看，锐意进取，大有可为；“道德学问，素为项城敬礼”的严修，则劝袁世凯向后看，因为称帝良机，稍纵即逝，早已错失：“……民国改造，已经四稔，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大总统早愿为皇帝，不能于破汉口，下武昌，传檄各省，受禅清室，失机一。又不能于癸丑之役，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推戴，自践帝王，失机二。”[1]第一个时机指辛亥革命，第二个时机即正史所言的“二次革命”。窃以为后者未必是什么良机，至于前者，当时杨度、张一麐等都曾游说袁世凯独树一帜，横扫南北，可惜

[1]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228—229页。

他过于持重，不肯从命。[1]复盘历史，其时的确是他称帝的最佳或唯一时机。这两次失机之后，帝制大势已去，共和大势已成，如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所云："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2]湖口乱事即"二次革命"。自此之后，共和奠基，不容动摇，任何称帝之举，不论实力何其强悍，鼓吹何其凶猛，

---

[1] 据王锡彤《抑斋自述》，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年10月14日），阮忠枢奉命从北京到彰德，劝袁世凯出山平叛，王锡彤和袁克定"主张不应清廷之命"，与阮忠枢同来的杨度表示附议："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王锡彤则为袁世凯着想，担心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言之再三，袁世凯怒道："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72页）另据徐世昌云："辛亥革命时，清廷起用项城，督师武汉，未几，擢为内阁总理，其权势之重，一时无与抗衡者。当时，其左右亲昵之人，即有劝袁利用机会取清廷而代之之议，即后来号称反对帝制之张一麐，亦曾驰电劝进（张国淦案：张一麐《心太平室文集》卷一《密陈大计呈稿》有'当大总统视师萧家港时，一麐曾驰电劝进，是时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云云）。"袁世凯之所以拒绝这些建言，共计五点原因："（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等，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因此他最初主张维持清室，南北和谈，开出的底线即君主立宪制，其次允许讨论君主制与民主制，再次偏重民主制，最终逼迫清帝逊位而自为大总统，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正符合其沉稳而缜密的行事风格（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3—74页）。

[2]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节未收入《饮冰室合集》。请注意，梁启超谈到的这两个时间点，正对应严修提出的两次失机，此之谓英雄所见略同。

都属逆流，必将败亡。如严修委托张一麐告诫袁世凯的那样："顾念国本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唯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1]这则涉及政治是非问题：不改国体而亡与改国体而亡，同是失败，是非分明。

现在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袁世凯什么时候可以当皇帝？严修之言，显然最适合作为参考答案。可叹的是，辛亥年底，袁世凯迎来了称帝之机，偏偏彼时尚无称帝之心；三年后有了心思，机会已经不再。[2]时不我与，逆流而上，结果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赔上了"一世英名"与半纪国运。那么，如果按梁启超的建议，卧薪尝胆，潜伏爪牙，等待未来的机缘呢？我则想起了张一麐的感慨："虽然，古人以成败利钝归诸运命，如洪宪之事，迟至民国六年必可不作，何也？德皇被逐矣，俄

---

[1] 严修致张一麐信（1915年8月17日），转引自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345页。此后还有一段金石之言："且国之亡不亡，视乎政治之进退，宪法之良否，人才之消长。今之议者，欲以无信立国，以无耻导人，金钱诱其前，斧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悉为诳语。如此而欲有良好宪法之产生，清白人才之出现，此必不可得之数矣。"

[2] 通常把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开端，其实这个时间点，起码可以往前推一到两年。夏寿田曾告诉张国淦："在民国三年（1914年）下半年，我辈已由言论而进入实际阶段……"（张国淦：《北洋述闻》，第201页）朱启钤则称："项城自一九一三年以后，深感国会政党政治之不可行于中国，浸寻而思求帝制。"他还指出"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张国淦：《北洋述闻》，第80页）。这也可引出张一麐的感慨，待一战结束，德皇被逐，皇帝梦不必作矣。

皇被杀矣，皇帝梦必不作矣！”[1]说到最后，还是国运。

六、袁世凯的镜像

袁世凯最像谁，在其生前身后，都是流行论题。参照系中，曝光率最高、名头最响的应是曹操。试举两例。张国淦说，宣统三年（1911年）他在东北与于式枚谈起袁世凯似有不臣之心，于式枚忆及往事：“袁自朝鲜回国，在北洋散居闲曹，以家世关系，常到幕府（于时在李鸿章幕）指画东边往事，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每袁至，咸戏以曹操呼之，彼亦漫然应之。余暗窥其举止，确非常人。其后，袁编练武卫新军，以至督北洋，进军机，扶摇直上，今日虽退居彰德，然其势力分布半天下，现在朝中无人，实深隐忧。”[2]另一例是前面引用的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子察存耆的见闻，他见过袁世凯之后，将会面情形说与旗人老师听，老师一面称赞袁世凯的干才，一面担心其居心叵测，也许与曹操一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成为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3]这两个故事，正好互补，从满汉两个视角，呈现了晚清时人对袁世凯的观感。

不过我觉得，袁世凯在晚清，无论权位还是野心，都无法望东汉末年的曹操之项背。当时曹操号称“挟天子以令诸侯”，

---

[1]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第60页。

[2] 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2—73页。

[3] 察存耆：《袁世凯与奕劻》，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第191—192页。

令诸侯虽近空谈，挟天子则是事实，以致在朝堂之上，不是皇帝，胜似皇帝，权力之大，一时无两。相比之下，袁世凯可差远了。慈禧在时，慑于积威，他不敢造次；载沣摄政，令他开缺回籍，他也只能从命。而且，直至大清将亡，他的政治野心，如徐世昌所言，“充其量不过欲为一权臣而已”，尚无称孤道寡之志。[1]这也是他比不了曹操的地方，曹操虽未称帝，却敢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其心思昭然若揭。[2]说到称帝，曹操明明能称帝而不称帝，袁世凯则明明不能称帝而偏要称帝，对比鲜明，前者堪称雄才大略，后者有雄才而无大略。

袁世凯与曹操最相似的地方，表现为一种假设：不是说有了他们，历史已经如何，而是说假如没有他们，历史该当如何。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云：“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3]假如汉末无曹操，“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情形必将加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形必将加剧。[4]袁世凯在民初的角色也是如此。他曾对徐世昌说：“以予自问，虽才不足望古人，而并世似无居予右者。”[5]在他生前，民国虽遭遇重重危机，至少保持了统一和安定，哪怕仅仅是一种形式；待他一死，立马陷入军阀混战，天崩地裂。这便显出了他的历史作用力：他并非治理民国的理想人选，然而一旦没

---

[1] 张国淦：《北洋述闻》，第 73 页。

[2]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53 页。

[3] 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41 页。

[4] 这两句诗皆出自曹操《蒿里行》，《曹操集》，第 4 页。

[5] 警民氏：《徐世昌》，转引自沈元龙：《徐世昌评传》(上)，第 317 页。

有他，民国只可能更糟糕。是以他去世当天，严复在信中感慨道："末路如此，岂非大哀。后此国事，思之令人芒背。"[1]

除了曹操，袁世凯还曾被比作与曹操同时代的袁绍、袁术兄弟。晚清写信、写日记等，涉及政坛大佬，好用或不得不使用隐语，譬如袁绍字本初，遂以本初代指袁世凯。戊戌六君子被捕之后，林旭在狱中作诗致谭嗣同，即用此典："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2]前句之千里草，合为董字，指董福祥。这两句诗，涉及康党内部的兵变阴谋，对于游说哪支军队发动兵变，林旭主张用董福祥军，谭嗣同主张用袁世凯军。袁世凯死后，黄兴挽联则将其比作袁术："算得个四十年来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袁公路；仅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彦威。"[3]袁公路即袁术。相比袁绍，袁世凯似与袁术接近一些，都曾僭号天子，为诸侯所不齿，遂因此而败亡。不过，袁世凯对袁家兄弟，一向看不上眼，不愿与他们相提并论。所谓"淮南袁术，唤蜜身死；河北袁绍，国破家亡"，都是不祥之人，令袁世凯谈及袁氏世系，"每叹息唏嘘不置"。[4]

---

[1] 严复：《与熊纯如书》(三十三)，《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9页。

[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4页。

[3] 黄兴：《挽袁世凯联》，氏著：《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0页。

[4]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234页。

越过汉末，行至东晋。此期出现了一个与袁世凯十分相似的人物：桓温。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一条笔记叫“袁世凯似桓温”，称清末张之洞、袁世凯同在军机处，被时人比作蔺相如、廉颇，他以为这是善颂善祷之辞，在他看来，张之洞似王导，袁世凯似桓温。[1]此言皮里阳秋，立意终归是批评：王导清谈，只具偏安之才；桓温豪雄，则有不臣之心。

无独有偶，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官，恽毓鼎密电端方，谈及此事，亦以桓温代指袁世凯：“桓温之得罪也，外间皆未窥真相。光宗上仙，颇有红丸之疑，不啻梁冀之于质帝矣（且结中常侍）。伏皇后曾奉献帝衣带诏，使除曹阿瞒以复仇，相王亦与闻焉。是日罢相制书，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八字，以褫职编管处之。代相代字乃唐讳太宗名独与谋，力为解，乃易今文。北骨二字请思其对第二次入对，力陈桓温之才可用，弃之可惜。相王言：‘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北骨乃不敢置词，惟云：‘桓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相王不悦云：‘公勿哓哓，奉行制书可也。’”[2]此信虽有捕风捉影之处，却可视作晚清时期政治密信的代表作，其中桓温、曹阿瞒皆指袁世凯，光宗、献帝皆指光绪，伏皇后指隆裕，相王指载沣，代相指世续，北骨指张之洞。对照东晋史，当年王导在朝中掣肘桓温，而今张之洞则为袁世凯助力。黄濬称张之洞

---

[1]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第545页。

[2] 朱宗震辑：《端方密函》，《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1—42页。

似王导，未免低估了他的胸襟。

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再次与桓温联系起来。好玩的是，这回说他像桓温的竟是他的儿子们。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第八十七首云："三公四世竟忘恩，不恤遗羞到子孙。青史千秋谁得似，阿爹端合比桓温。"注释曰："某岁，余与项城（袁世凯）四、五、六、七、八诸子，同车往彰德洹上村，祝项城正室于夫人寿。于车中谈及项城在历史上比何人。克端曰：'操、莽耳。'克权曰：'可比桓温。'众论乃定。"[1]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之时也曾讲过这个故事，结论是袁家诸子"大不敬得很"。[2]他们似乎都不大看得起桓温，拿桓温比袁世凯，意在贬斥。

与之相反，我对桓温评价甚高。后世之所以批评桓温，一在篡位之举，二在北伐不成。第一点在打破了三纲的今人眼里，应该不是什么罪过，第二点则受制于彼时天下大势，南北之争，汉胡之争，前者正处于弱势，况且朝中有些人不愿桓温克成大功，以免危及皇权和他们的既得利益，故而处处掣肘，当然桓温自己的决心也是一个问题，这三重因素相加，导致他的失败。抛开这些，单论其人，文武全才，英略过人，乃是当世第一流人物，纵观东晋百年，没有哪个人敢说能稳压他一头。要说缺陷，他身上多少有些书生气和妇人之仁，以致重大关口，缺乏决断。说到底，他还不够狠毒，不够无赖——这是成就大事的

---

[1]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32页。

[2] 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398页。

必备因素——如朱熹所云："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个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1]大意是，如果桓温像朱温即朱全忠那样"做了二十分贼"，东晋早就完蛋了。

袁世凯的性情、才具和归宿，的确与桓温近似，难怪从清末到民初，常见人把他们比在一处。这二人都是一面英雄气概，一面枭雄手段，都是其时代一流人物，可惜限于环境与才能，不能成为继古开今的超一流人物，都足以坐镇一方而不能扫平天下，最后都以野心膨胀的悲剧收场：桓温称帝不遂，袁世凯称帝失败。不过，他们的称帝之举还是有些区别：桓温称帝发生在帝制的脉络之内，袁世凯称帝发生在帝制的脉络之外——当时帝制已经终结。由此可知袁世凯所面临的时势远比桓温复杂，三国两晋南北朝属于中国史上的小转型，清末民初则是中国史上的大转型，是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不仅指向胡汉之争，还指向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置身其中，他的种种尝试与挫折，种种顺势与逆流，已经自成镜像。要说"青史千秋谁得似"，也许不该问袁世凯像古代哪个人，而是未来哪个人像袁世凯。

再说两句题外话。论袁世凯像谁，属于事实判断，此外还有一种预期，即希望袁世凯像谁。这则反映了时人的政治心理。清末民初的国人，最希望袁世凯效仿华盛顿。譬如武昌起义之

[1] 朱熹：《朱子语类》第8册，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2464页。

后，鄂军总司令黄兴曾致电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1] 意在勉励袁世凯当中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稍后南北和谈，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致电梁士诒，请其转告袁世凯：清朝必亡，民国必成，要学华盛顿，莫学王莽、曹操（蓝天蔚致电袁世凯，亦有"曹操、王莽、华盛顿，惟公择之"等语）。数年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劝他努力做中国第一任华盛顿，不要效仿法国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如此种种，可用梁启超的一句话来概括："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2] 可惜诲而谆谆，听我藐藐，袁世凯最终还是重蹈了"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此恨绵绵，竟无语凝噎。

---

[1] 黄兴：《致袁世凯书》，氏著：《黄兴集》，第82页。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1911年11月3日），汪康年死于天津。死前一晚，得京中友人密书，言政府将起用袁世凯，他叹息曰："今方主张共和，然是人可为拿破仑，不能为华盛顿也。"（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9页）此言甚有见地，华盛顿与拿破仑不该并为一谈。

[2] 梁启超：《上大总统书》，氏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21页。

论亲贵

人才与国运

一、人才与国运

徐锡麟有言："国运之兴，系乎人才。"其实国运之衰，也是如此。要言之，人才消长，攸关国运兴衰，至少可作为观测国运走势的信号之一。就中国史而论，盛世往往人才辈出，衰世或末世往往人才匮乏；盛世人才多在朝，衰世或末世人才多在野；盛世执政者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衰世或末世执政者则以压抑、摧残人才为己任。我读近代史，对后一面感触尤深：当一国之人才不在朝而在野，不作忠臣而欲为反贼，不思报效朝廷而立志颠覆朝廷，这样的王朝，必将走向衰亡。

晚清人才之消长，有两条线索值得注意。一是在朝与在野的人才对比。这里可观察两个时间点：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太平军的领袖形象大都被后人过度美化，细究其才具，论行军打仗也好，治国理政也罢，从洪秀全、杨秀清到李秀成、陈玉成，前后两代，并无一流人物。勉强拿得出手的南王冯云山，公认为最具大略和组织力，却早早死在全州，此后再也无人统筹全局，深谋远虑，只剩一帮爪牙各自为政，内讧不断。譬如后世最为看重的石达开与李秀成，非但不是帅才，甚至谈不上将才。在湘军领袖胡林翼、曾国藩眼里，最忌惮的反而是绰号"四眼狗"的陈玉成，判定其鸷勇悍锐，非石达开、李秀成可及。对此，可以蒋廷黻的论断作结："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1]不妨假设，太平军中，漫说对标胡林翼、曾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彩图增订本），第41页。太平军早期摧城拔寨，势如破竹，不是自身多强，而是对手太弱。如蒋廷黻所云："太平军（转下页）

国藩、左宗棠等，倘能出一个才略堪比鲍超、杨岳斌的人物，战局都可能改写。这一比，可知太平军何以会失败。

等到辛亥革命，局面彻底反转。清政府这厢，张之洞病故，袁世凯被罢黜，执掌朝政的大佬，黯如载沣（摄政王），贪如奕劻（内阁总理大臣），奢如那桐（内阁协理大臣），滑如徐世昌（内阁协理大臣）……这里面，唯有徐世昌算得上一流人物，然而一来他只是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而且是汉人，在愚不可及的皇族内阁当中，近乎点缀；二来他是个老滑头，兼具水晶之滑与狐狸之奸，这等性情，决定了危急存亡之秋，断然不会选择担当，而以和光同尘、明哲保身为第一义。再看反对党，立宪派也好，革命党也罢，英雄丛生，豪杰群起，随便拉一个首领出来，都能坐镇一方，独当一面。两厢对照，胜负分明。此一人才消长之势，早在数年前便见端倪。试以“间岛问题”为例。

间岛位于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今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清朝颁布禁关令，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致此地白草黄云，杳无人烟。朝鲜人遂乘虚而入，越过边禁，开荒垦地，名之垦土（Kentu），后讹为间岛（Kantao）。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日本纳大韩帝国为保护国，进而谋取

（接上页）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后来太平军被湘军、淮军扑灭，亦非对手多强，而是自身太弱，早已腐化，四分五裂。

间岛，侵略东北。大清执政者虽不甘就范，却无证据、手段与日本斡旋。此时有一位英雄挺身而出：

> 湖南宋教仁遯初居东京，与黑龙会极相得，同往东三省，实地考察间岛沿革方域，著有《间岛问题》一书，署“宋练著”，此时尚未易名教仁。黑龙会则发布《白山黑水录》，对间岛无确论。自遯初《间岛问题》一书初脱稿，在北京留日归国学生，群起呼号。总理各国事务当局则茫无根据，遯初书出版，北京遂奉为金科玉律矣。间岛事件成为大案，北京当局尚悠悠忽忽。事为西太后所闻，命速进呈《间岛问题》原书，阅毕，拍案曰：“国有人才如此，管理外务大臣不能引用，可惜可惜！”颇有武则天阅骆宾王檄文，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曰“有才如此，宰相之过也”风味。一日，召见庆亲王，手交谕旨“宋练著赏给五品京堂，来京听候任用”云云。太后一言，外部嚣然。间岛交涉结束，仍以宋书为根据，遂有特派吴禄贞为间岛办事大臣之命。遯初始终未入京。[1]

这段记载，绘声绘色，一波三折，尤其慈禧的感慨，近乎小说家言。不过宋教仁以宋练之名撰《间岛问题》，襄助清廷谈判，实有其事。他走的渠道，乃是通过驻日公使李家驹，将此书转呈袁世凯和那桐主持的外务部。新加坡《中兴日报》(同盟会南洋支部主办）报道称：“清政府与日本交涉间岛问题，非

[1]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92页。

常棘手。及得此书，如获拱璧，即以各种证据反驳日使，日政府至今尚不能决答，其书之价值可知矣。”“袁世凯、那桐等谓宋有大才，特电驻日使李家驹，令致意宋某，使即来京助理间岛交涉，当与以不次之擢用，宋拒绝之。及新任日使胡惟德来，奉袁、那等命，力求宋赴京重用，敦促再三。宋大愤，移书李、胡二星使，辞甚决绝。”[1] 见宋教仁不受招揽，袁世凯遂命驻日公使赠与两千元，以为酬谢。“先生（宋教仁）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2]

间岛主权的捍卫者，除了宋教仁，还有吴禄贞、柏文蔚等。中日交涉期间，吴禄贞时任延吉边务帮办、督办，在前线跋涉山川，穷极边塞，纵横数千里，撰成十万字《延吉边务报告》，与六万字《间岛问题》并称双璧，作为谈判最有力之参考书。在吴禄贞麾下任职的柏文蔚，曾潜入韩国汉城，购得《大东舆地图》，为论证间岛属于中国领土提供了重要依据。在这些仁人志士的努力之下，宣统元年七月二十日（1909 年 9 月 4 日），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中国以让渡领事裁判权、开商埠、修铁路等为条件，换来日本承认间岛系中国领土，这是晚清外交史上罕见的胜利。读书至此，有人会说：吴禄贞、柏文蔚都是大清官员，是不是可以证明朝廷不缺人才？事实恰恰相反，这二人乃是老牌革命党，在朝廷潜伏，以谋颠覆，单

---

[1] 杨天石：《宋教仁佚文钩沉》，转引自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1—42 页。

[2] 骚心：《宋先生遗事》，转引自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第 43 页。

论革命资格，吴禄贞比宋教仁还老呢。

大体而言，大清王朝最后十年，在野人才逐渐超过在朝人才，反对朝廷者逐渐超过忠诚朝廷者。此外还得注意，在朝的人才，受困于病态的体制，往往难以发挥其所长，甚至惨遭逆淘汰。由此可引出一句名言：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此语出自电视剧《走向共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大清官员出洋考察政治，途经日本，拜谒伊藤博文，举行会谈。伊藤博文从老同学严复——事实上二人并非同学——的遭遇说起，最后谈到李鸿章。他拿起一本书念道："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顿了一顿，他告诉载泽等人，此书作者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恰在"假如二人易地而处"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最后他大发感慨，热泪盈眶："李中堂若读得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

"伊藤不才"云云，实属谦辞。如前所述，以雄才与大略而论，伊藤博文的雄才稍逊李鸿章一筹，大略则远胜之。这番话之精髓，当在那句"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发梁启超所未发，将论题从人升级到制度，进而指向人与制度的关系：专制国家，常化有才为无才，立宪国家，则化无才为有

才；专制国家惯于禁锢人才，把人才关进笼子，使其力量最小化，立宪国家则能解放人才，把人才放出笼子，使其力量最大化……

说到人才与奴才的转化，可区分两种用人模式。时人批评蒋介石，称他只能用奴才，不能用人才，遂致失败。张学良口述历史，曾引国民党大佬、蒋经国同学王新衡的妙语，大意是，蒋介石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把奴才当人才用，所以后者有东西留下来，前者什么都没有。[1] 专制国家的人才观，大抵都如蒋介石这般，养士再久，人才再厚，终将摧折、挥霍一空。

回到清末。张之洞、袁世凯等大臣，自然都是一时之翘楚。但是，当张之洞苦口婆心，劝载沣重视舆情，因舆情不属，必生激变，得到的回应却是一句简单粗暴的“有兵在”，以致他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2] 袁世凯则在载沣当权之初，惨遭报复，被朝廷以“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这便是专制之下人才的下场，要么老实当奴才，不许危言耸听；要么连奴才都当不了，一道圣旨打回老家。对此，不甘作奴才、被朝廷当猴耍的人，如张謇、汤化龙等立宪派，后来都成了反对党，有些比革命党还坚决、激切。此消而彼长，当反对党遍布朝野，大清王朝只能黯然谢幕。

---

[1] 张学良：《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6册，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整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1710—1711页。

[2] 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80页。

朝野之外，还有一条考察人才变迁的线索：满汉。满族与汉族的矛盾，虽起伏不定，却连绵不绝，贯穿有清一朝，最终成为大清崩盘的导火索。清朝覆亡之前，从满汉人才对比，可知强弱之势已然分明，满人实在无力回天。[1]此处之对比，不是比数量（论人口，满族远远小于汉族，势必影响人才产量），而是比质量。须知在古代中国，治国的密钥，常常把握于雄主或重臣之手。是以我们只需观察，满族有没有一二人才，进可引领潮流，乘风破浪，退可砥柱中流，力挽狂澜。

二、奕䜣

缺乏大略与方向感的慈禧，显然不是这样的人物。这里要说的两个满人，皆与她关系千万重：一是她这辈子恨之入骨的肃顺（窃以为慈禧早年最恨肃顺，晚年最恨康有为）；二是从同盟到对手的奕䜣。

肃顺在后世笔下，形象甚佳，这大概有些政治正确的元素。譬如他是慈禧的政敌，曾痛斥“咱们旗人浑蛋多”，主张重

[1] 满汉人才及其背后的权力格局之转折，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此役不仅改写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格局，自此头轻脚重，地方权力大于中央；同时改写了满人与汉人的权力格局，导致汉人担任地方总督、巡抚的比例超越满人（纵观清史，督抚比例的变更，可以咸丰朝为分界线，此前满人超过汉人，此后汉人超过满人，一度呈碾压之势）。可参《咸同将相琐闻》：“按咸丰六七年以前，皆以满大臣掌兵柄，汉人不过为之副而已。当时满人之任督抚者，常逾十二三人，岂非种族猜忌之心犹未泯欤？不幸满臣出辄挫败，辜恩误国，比比皆然。而效命疆场，至死不变者，乃在可疑可畏之汉种。于是文庆始有用汉人之议，卒赖汉人以推倒太平天国。吁！满汉人才之效，大可见矣。”（《清代野史》第3辑，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9页）

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其才具，李孟符《春冰室野乘》誉之为“在一时满大臣中，实无其比”；[1]曾入肃顺幕府的王闿运亦云：“肃顺之学术经济，迥非时人之伦”。[2]这显然吹过了头，同代的文祥、宝鋆等，只怕他都比不了。抛开抑满人而扬汉人这一点，其实他并无什么特长，乃是典型的权臣——与其相比，文祥则是能臣，权臣为己，能臣为民——行事专横以至暴虐，为后来的败亡埋下祸根。说到败亡，辛酉政变这一战，技术含量不高，在暗无天日的中国政治斗争史上，压根排不上号。奕䜣、慈禧一方，当时都是政治菜鸟，经验既乏，手段亦拙，即便如此，肃顺还是输了，毫无还手之力，可知水准何其有限。此外，在外交一面，他属守旧派，对列强态度强硬，倘若不死，等到洋务运动展开，则成时代的绊脚石。后来王闿运谈大清之亡，曾有“肃顺若在，必不使戚贵横行，自有立国之道，清亡于杀肃顺云”等语。[3]然而不难推论，假如肃顺是辛酉政变胜利一方，继续执政，以其保守而专断的风格，大清毋宁会亡得更快，难续七十年国祚。

与肃顺一样，后人曾假设，道光帝死后，继承皇位的若非其第四子奕㖊（即咸丰帝），而是第六子奕䜣，大清王朝的走向

---

[1] 李孟符：《春冰室野乘》，第95页。后文云：“发逆荡平之由，全在重用汉臣，使曾胡诸公得尽其才。人第知其谋之出于文文端庆，而不知帷幄之谋，皆由肃主持之。”

[2] 王伯恭：《蜷庐随笔》，第78页。

[3]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198页。王闿运曾入肃顺幕府，参与机密，交谊极深，“人诋逆臣，我自府主”。关于二人之关系，可参羽戈：《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第一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9—36页。

必将扭转，以奕䜣的聪明与开明，也许更能适应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易推进近代中国第二次大转型。这个假设成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奕䜣虽未当皇帝，在同治朝曾封议政王，领军机处，执掌朝政，权力之大，近乎皇帝（同治初年，奕䜣与军机处代表的相权，一度压倒慈安、慈禧两宫代表的皇权，如前引曾国藩云："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这是同治八年的观察）。考察他在这一时期的作为，可见无论才具还是性情，皆有重大缺陷，固然略胜咸丰帝，却拉不开一个段位，绝非为大清改命的合格人选。

关于奕䜣之短长，吴相湘有一段评论：

> 恭王（奕䜣）性质开明，临事敏决，能力之富强，当时枢臣中，实罕其比。自幼学养不固，举趾高蹈，是为美中不足。亲王封爵出自道光朱笔，命之曰恭，一字钦承，涵意实极深远。咸丰五年文宗手诏亦有仪节未娴之语，可见知子莫若父也。[1]

总结起来，奕䜣的长处是聪明、果敢，短处则是浅薄、轻狂，这个毛病，终身不易。据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老年奕䜣之言辞，依然"往往趁口，不甚思索"，用俗话来讲，即说话不过脑子。古时考核皇帝，稳重是一大要素，举止轻狂，则将迎来"望之不似人君"之讥。奕䜣落选皇位，想必这是原因之一。

---

[1]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76页。后文又称奕䜣"年少不学，暗于大体"。

吴相湘此论，有其出处。奕䜣的同时代人，不为尊者讳，对其亦有批评。以曾国藩、赵烈文师徒为例。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1860年10月26日），曾国藩致信曾国荃，先斥九弟来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转而谈及奕䜣：“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1]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1867年8月8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赵烈文道：“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曾国藩道：“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赵烈文道：“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倭仁）争持，无转身之地，忽尔解释，皆其聪明之征也。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凡人有所成就，皆志气作主。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2]其中“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一句，则可引出两年后曾国藩的著名评语：“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3]要言之，从气

---

[1]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一》，第520页。

[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第1078页。赵烈文所云奕䜣与倭仁争持，指增开同文馆一事；姬旦，即周公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这里指奕䜣与同治帝的关系，不过奕䜣有慈禧制约，权力终究不如数千年前的周公；覆餗，指倾覆鼎中的珍馔，比喻力不胜任而败事。

[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三），第1259页。中国人乐于赞赏奕䜣的聪明，不过在外国人口中，其形象则有争议。赫德认为奕䜣“并不很聪明”，长处在于从善如流；丁韪良则说奕䜣具有“超凡的才智与勇气”，只是缺乏自主力量，这与曾国藩、赵烈文师徒所论暗合。

质上讲，奕䜣缺乏政治家的厚重，更接近翩翩浊世佳公子。

无自立之能，亦无自立之心，构成了奕䜣的致命伤。政坛争斗之残忍，远甚沙场，你死我活，不进则退，不能立足，则难苟安，必将被对手逐出舞台，轻者退场，重者命丧，因为这块血染的疆土，始终只允许存在一个胜者或王者。偏偏奕䜣个性轻狂，不知谦虚敬慎，持盈保泰，反而“言语行动诸多不检，甚或持功自矜，遇事流于专擅”；[1]偏偏他的对手慈禧权力欲极强，行事不择手段，恩威并施，杀伐果断。是以这二人的竞争，自同治初年开始，便隐约注定了结局。

同治四年（1865 年），奕䜣被慈禧狠狠敲打了一回，摘掉了议政王的帽子，从此节节败退，权力天平渐渐向后者倾斜。等到光绪十年（1884 年）——这一年是甲申年——甲申易枢爆发，奕䜣被“开去一切差使”，即免去所有职务，只保留恭亲王头衔，其亲密战友宝鋆则被迫直接退休。这不只完败，更是奇耻大辱。然而此刻慈禧早已一家独大，连整个军机处都能一锅端，其股掌之上的奕䜣，毫无招架之功。后世认为，这一场政治变故关系晚清国运一大转折，以奕䜣为代表的改良派下野，以奕譞为代表的守旧派上台（奕䜣等退出军机处，礼亲王世铎继任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有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时人讥之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大意是一种逆淘汰——由此朝政变脸，改革愈发迟缓，国步愈发艰难，十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苦果落地，追

[1]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 77 页。

本溯源，是谓“甲午之祸，因在甲申”。对此我不欲反驳，只想提醒一点：哪怕不曾发生甲申易枢，由奕䜣等继续执掌军机处，改革也将受阻并转入下坡路，因为以奕䜣的才具，上限乃是洋务运动对应的器物之变，而难以触及制度，迟早碰壁，一败涂地——当然，这不是败于慈禧，而是败于潮流，在潮流面前，连同慈禧也是失败者。

甲申易枢，扣在奕䜣头上的罪名是“因循”，此二字常见后缀，即守旧。这则有些欲加之罪的意思。不过，十年后奕䜣复出，竟真正陷入因循状态。如果说甲午战争期间，指望他以旧日声威，振作士气，挽回颓势，未免强人所难，那么战败之后，痛定思痛，由他振臂一呼，主持改革，则在情理之中。不料此时他年过六十，不思进取，唯求敷衍，对慈禧唯唯诺诺，对时局浑浑噩噩。其苟且态度，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1895 年 10 月 31 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Sir Nicholas Robert O’Conor）任期结束，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辞行，曾对奕䜣说：

> 恭王爷为中国第一执政又国家之尊行也，今日之事，舍王孰能重振哉？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曰德欲占舟山，今一电曰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聚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

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善病，精力不继，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就乎？英商贸易于中者，皆愿中国富强无危险；吾英之不来华者，借贸易以活者，亦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故吾抒真心，说直话，不知王爷肯信否？即信，所虑仍如耳边之风，一过即忘耳。此吾临别之言，譬如遗折，言尽于此。[1]

这番话语重心长，痛入骨髓，甚至使用遗折一说，足见其对中国用心之深挚。不幸如欧格讷所预言，照旧被奕䜣当作“耳边之风，一过即忘”。生命末段，奕䜣颓唐、苟且，与早年的奋进、轻狂形成了鲜明对比。两年半后，他老病而死，病危之际，光绪帝曾去探望，听来这样的告诫：“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此时戊戌变法即将拉开帷幕，这个昔日改革的急先锋却扮演了拖后腿的角色。他已经无力追逐激进的时代，而被远远甩开，形象渐渐模糊。反倒是欧格讷的谆谆忠告，定格于他的晚年，令人铭感而难忘。当时翁同龢在场，不仅详细记录了欧格讷之言，还写道：“寒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今日之事也。”[2]

三、文祥

奕䜣在政坛早年进取，晚年颓废，除了时代的进化与慈禧

[1]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45页。

[2] 同上，第2845页。

权柄的加固，还有一个原因：他既不能自立，则需求人辅佐，其早年身边不缺股肱之臣，故而大有作为，晚年孑然一身，孤立无助，只能自保而已。

奕䜣的股肱，第一当数宝鋆。二人虽隔了一辈，身份有别，却是至交。交情好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常拿对方的名字开玩笑。有一天临近下班，宝鋆赶去方便，奕䜣等了许久，有些不耐，待其出来，嘲讽道："往何处撇宝去？"撇宝者，京城俗语，即如厕，此处之宝，暗讽宝鋆。宝鋆则反唇相讥："那里，是出恭。"恭者，奕䜣王号。撇宝出恭，针锋相对。又有一日，奕䜣从太庙出来，手指庙碑之下的赑屃对宝鋆道："汝看这个宝贝。"宝鋆字佩蘅（一说字锐卿，号佩蘅），"贝""佩"二字，发音相似。宝鋆应之曰："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遂把矛头对准奕䜣的出身。[1]开得起玩笑的朋友，才是好朋友。甲申易枢之后，奕䜣归隐西山，藏身诗文，常与之相伴的也是宝鋆（《清史稿·宝鋆传》有"宝鋆退休后，时偕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等语）。[2]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交情如此，宝鋆谈起奕䜣，有时毫不客气。他曾对门生何刚德说："恭邸聪明，却不可及，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难时，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3]阿保，即保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一

[1]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11页。

[2]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698页。

[3]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11页。丁丑（1877年）会试，何刚德中进士，座师乃是宝鋆，"师最重年谊，故待余为尤厚。退休后，余时常往候，月必数至。慨谈时局，追寻往事，余心领意会，所得殊多。"（第10页）

句，语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雎曾以此讽秦昭王；“我们几个人”，当指文祥、宝鋆，以及宝鋆最看重的沈桂芬等，当他们先后去世——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去世；光绪七年（1881年），沈桂芬去世；光绪十七年（1891年），宝鋆去世——甲午年奕䜣复出，四顾无人辅助，愈发“晃荡不能立足”。

谈宝鋆，意在引出文祥。他们被视作奕䜣的左膀右臂，诚然，宝鋆与奕䜣关系更近，若论人品、才具及在其时代的影响力、贡献等，则以文祥居上。《清史稿》中，二人同传，偶有对比，高下立判。如传后之论，夸了文祥半晌，继而云：“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器而持国是。”落笔还是歌颂文祥：“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1]再如梁启超谈同治、光绪年间的军机处，称同治初年为“文祥、沈桂芬时代”，直接忽略了宝鋆。[2]所幸宝鋆性情潇洒，否则大半生沉浮于文祥的光芒之下，未免会有瑜亮情结。

《清史稿》云，宝鋆明达如文祥，贞毅则不及。贞毅者，字面意思是坚贞刚毅，所指应在节操。论节操，宝鋆素有贪鄙之名，文祥则以正色立朝，“清操绝人，家如寒素”。[3]寒素到什么程度呢？如曾任同文馆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晚年忆旧云：

> 董恂与宝鋆富贵而终，补偿了早年的挣扎，而文祥生于贫

---

[1]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8册，第11698页。

[2]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11页。

[3]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8册，第11695页。

亦死于贫，且以此自豪。国务卿西华德在中国时，给文祥写信，称其大名闻之也久，公务往来也频，渴望前往府邸一见。这位清朝军机大臣拒绝了，宣称“寒舍不宜接待海外贵宾”，反而前往美利坚公使馆去拜访西华德先生。文祥的理由并非托辞，因为他的屋子是租来的，每月仅付四块半，不会多么堂皇。[1]

宝鋆与文祥，富贵与贫寒，一反一正，差距分明。不过按我论人的标准，贪腐与否，并非紧要。窃以为二人真正的差距，反在明达。宝鋆的头脑，谈不上多么新潮，譬如接受不了地球自转的学说，对之大加嘲笑。相形之下，文祥的眼光与见识，则是那个时代最前卫的人之一。他的功业，亦缘此而展开。

文祥主政的同治朝，时代潮流可归结为“开眼看世界”。张之洞《劝学篇》曾以批判的方式，列出了“开眼看世界”的政治谱系：“林文忠尝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终。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寿。文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2]林文忠即林则徐，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则名高难副）；文文忠者，便是文祥。

文祥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培养了一名叫蔡锡勇的学生，此人学成之后，追随张之洞办洋务，主持汉阳炼铁厂、湖北枪炮

---

[1]［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

[2]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厂等，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张之洞誉为“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他曾对福建老乡辜鸿铭讲起一个故事：

>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1]

文中堂者，即文祥。这个温暖的故事，不仅呈现了文祥的长者风范，字里行间，还布满了文祥对同文馆和学生的喜爱。辜鸿铭由此盛赞“大臣远略”：

> 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画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

[1]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陶菊隐：《张文襄幕府纪闻、近代轶闻》，第14页。

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1]

这番话稍嫌过誉，不过文祥其人，正以“谋国深远”见长。说起他的远略，代表作却非同文馆，而是死前一年所上《密陈大计疏》。其中云：

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2]

在洋务运动与器物之变尚且举步维艰的时代，大谈议会政治，触及制度之变，令人不得不佩服文祥的眼力与勇气。李鸿章曾盛赞文祥为“旗人中之鸾凤”，[3]单以视野而论，文祥之为

[1]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第14页。

[2]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8册，第11691页。

[3]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第599页。此节原文云：“光绪年间，满洲文百川相国祥，当时应补授文华殿大学士一缺，自谓功业不如合肥李文忠公鸿章，愿以己缺让之，故文忠以汉人得授斯缺。……相国生平居宦，亦矫矫自厉，不随流俗。文忠每与先文庄公（刘秉璋）语及，以旗人中之鸾凤称之。”

凤毛麟角，绝不限于满人一族，哪怕把同时代的汉人加上，他也配得上先行者的称号。大概与其上《密陈大计疏》同时，郭嵩焘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呈《条议海防事宜》云："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1]可惜只是泛泛而谈。此后他出使英法，亲身见证"维持国是之义"的"巴力门"（parliament，即议会）、"顺从民愿之情"的"买阿尔"（mayor，即市长）等，这才确定找到了西洋立国之本，不过只能写入日记，难以上达朝廷。等到光绪十年九月初八日（1884年10月26日），卸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黄埔行营去世，临终之际，放手一搏，上折直言"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乃是国家之体："……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这一微弱的回声，距离文祥上《密陈大计疏》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更可悲的是，言者固然谆谆，听者依旧藐藐。肉食者的耳朵，往往不辨人间话语，大炮和子弹乃是他们唯一听得进去的声音。

---

[1]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使西纪程——郭嵩焘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2] 张树声：《遗折》，何嗣焜编：《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559页。一说其体用思想源自郑观应。

关于《密陈大计疏》,《清史稿》云:“(文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1]然而洞若观火,又能如何,殊不见前文云“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2]这才是文祥处境之惨淡的真切写照。光绪二年(1876年)他去世之前,曾有遗折。相比《密陈大计疏》的规划,此折更多则是抱怨:

> 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托于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于任事之人。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借口有自。……夫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于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于此!

不难想见,自比“小驴拉大车”,一生多病,劳累而死,享年不足六十的文祥,最终写下或口述这些话,心底何其悲

[1]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8册,第11698页。

[2] 同上,第11698页。

凉，又是多么不甘。[1]作为一个富有远略的规划者——用现在的话讲，他堪称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坐视自己的宏大计划滞留于苍白的纸面，现实满目疮痍，国家岌岌可危，他在辞世的那一刻，未必能够瞑目。他死后，张之洞哭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这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瞻卬》。如其所云，文祥一死，大清尤其满人当中再无这样的人才，国家随之而病危。由此正可盖棺论定，文祥在世，未必能救大清；他若弃世，无人能救大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大体能够认同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曾任英国驻华公使）对文祥的评语：满族最后一人。

四、荣禄

文祥生前与身后，时人对其几乎交口称道，批评者寥寥可数。恰恰因此，批评的声音便显得难能可贵。其中牌面最大的当属曾国藩，他认为文祥有两个毛病，一是"正派而规模狭隘"，这与我们所称赞的"谋国深远"，正好相反。不知曾国藩何以有此苛责。我能想到的只有一点，文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外国人打交道，常常寸土必争，寸步不让，于细枝末节斤斤计较，略显小气。《清代之竹头木屑》云："同治朝有西

[1] 小驴拉大车一说，出自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文祥虽然工作繁重，但我总是能够找到他。一天，我发现他因哮喘而呼哧呼哧透不过气来，他这么告诉我：'你看到过小驴拉大车，累得喘不过气来。嗯，那就是我的写照。'在北京，运送货物多用手推车，人推驴拉，这个比喻不无允当。"（第244页）

国公使六人请觐见，文中堂与议礼节极严，甚至将茶杯掷碎。公使初欲带刀，并欲多带从人，文皆不可。是日诸使入觐带人颇多，文命每门截留数人，至紫光阁裁余翻译而已。”作者评道：“此举差强人意，惟惜徒务其末耳。”[1]

第二点批评“不知求人自辅”，关系晚清国运，则待细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谈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朝局：

> 比时恭邸领班，长白文文忠、宝文靖、吴江沈文定、高阳李文正，均一时贤辅。第和而不同，虽为美政，卒至群而有党，未克协恭。文忠多病，文靖但持大端。[2]

其书人名，俱用谥号。文文忠即文祥，宝文靖即宝鋆。沈文定即沈桂芬，江苏吴江人，李文正即李鸿藻，河北高阳人，这二人籍贯一南一北，因此他们的政治斗争，史称“南北之争”。宝鋆旗帜鲜明，站在沈桂芬一方（陈夔龙书中有“文靖与文定交最契”等语）；[3]文祥则偏向李鸿藻。当这些大佬各自站队，“卒至群而有党”；军机处内部裂痕重重，势必有碍朝政运行。

由此说来，文祥并非“不知求人自辅”，只是他赏识、培植的人，难入曾国藩那一双高冷的法眼而已。这些人中，汉

---

[1] 佚名：《清代之竹头木屑》，《清代野史》第4卷，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909页。

[2]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54页。

[3] 同上，第50页。

人当推李鸿藻，满人当推荣禄。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1900年5月24日），张之洞给荣禄写信，回首京华烟云，称李鸿藻曾告诉他，“平生相知最深，交谊最厚者”，远则文祥，近则荣禄，前者“笃棐忠贞，竭诚尽瘁”，后者“公忠宏达，直道不阿”。此信载于李鸿藻外孙祁景颐所撰《谿谷亭随笔》。书中提到，荣禄曾追随文祥左右，与李鸿藻相识，即在文祥家中。文祥去世，李鸿藻挽联云：“共济溯同舟，直谅多闻，此后更谁能益我；中流凭砥柱，公忠体国，方今何可少斯人。”待李鸿藻去世，荣禄遂把这副挽联照抄一遍，还施其人。[1]这三人的交情，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论才具，无论李鸿藻还是荣禄，甚至把二人加起来，都难比肩文祥。祁景颐谈自己的外公，并不留情，称其“秉性刚直，遇事不甚变通”，“平心而论，文正不失为正人，而才识短浅，性情执拗，无知人之明，中为清流利用，不免党援。南北之见甚深，卒以此剥削元气不少。”[2]对比李鸿藻，荣禄的秉性、才识等，只怕还有所不及。他以贪腐、奢靡著称，“招权纳贿，贪得无厌，为政治之大蠹，故尤为人所訾议”；[3]观其履

---

[1] 祁景颐：《谿谷亭随笔》，祁寯藻、文廷式、吴大澂等：《〈青鹤〉笔记九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9—162页。

[2] 祁景颐：《谿谷亭随笔》，祁寯藻、文廷式、吴大澂等：《〈青鹤〉笔记九种》，第151页。其中“中为清流利用”一句，有为亲者讳之嫌。李鸿藻系清流党背后的推手，要说利用，二者起码也是互相利用。

[3] 夏曾佑：《论荣中堂》，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28页。关于荣禄生活之奢侈，可以其衣着为例。金梁云：“荣文忠公以衣式称于时，每日趋朝常视御服为转移，日易一衣，岁不相复……”（金梁：《光宣小记》，第22页）易宗夔《新世说》（转下页）

历，文官也做过，武官也做过，然而文韬武略，都不在行；好在性情通达，并不拘泥，精于相术，有些知人之明，这是胜过李鸿藻的地方。[1]综合而论，这二人才具同处一档，在其时代，属于标准的二流人物。

那么，文祥看走眼了吗，如翁同龢批评的那样，知人之明则其所短？权且抛开李鸿藻，单说荣禄。祁景颐云：

> 略（荣禄号略园）颇有世界眼光，知各友邦之不易与，不愿盲从；驯至纵拳仇外，亦始终未能赞同，聪颖处诚不可及，在满洲尤为难得。惜其人固宠保位，不能销患于无形中，诚足惜也！[2]

在晚清知世论人，有一直接标尺，即看其如何对待洋人与洋务；倘若其人是满人，还有一直接标尺，即看其如何对待汉

（接上页）云："荣禄美风仪，有玉人之目。衣裳杂珮，皆极精好。每岁自十一月迄次年之元夕，所服貂褂，日易一袭，无重复者。"（易宗夔：《新世说》，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60页）这则故事应出自罗惇曧《宾退随笔》："荣禄美风仪，容止秀整，衣裳杂佩皆极精好。每岁自十一月朔，迄次年之元夕，所服貂褂日易一袭，无重复者。其衣衩内标第几号，可知多矣。趋朝遇风雨，恒服四不露褂。四不露，即不出风毛者也。满人最重衣饰，恒自相夸耀，居显要者，四方进献，恒量其厚薄以为报酬，不独荣禄也。"（罗惇曧：《罗瘿公笔记选》，孙安邦、王开学点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5页）

[1] 荣禄精于相术，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多有记录。兹录一则："文忠又谓，以相法言，肃顺长身玉立，鸢肩火色，头部上锐下丰，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贵，但忌声嘶，肃顺豺声，是以不克善终。"（第49页）

[2] 祁景颐：《谿谷亭随笔》，祁寯藻、文廷式、吴大澂等：《〈青鹤〉笔记九种》，第151页。

人。说到这两点，正可见荣禄的长处。他的格局或大局观，在那一代满人当中，几乎独一无二。试以其政敌、同为满人的刚毅作参照：刚毅仇视汉人，荣禄则不分满汉，唯才是举；刚毅敌视洋人，荣禄虽不通洋务，却能以开放的心态，善待列强。

这里且荡开一笔，说说荣禄与刚毅这对政敌。他们的斗争，表面上看由于政见不合，背后则由慈禧一手促成。慈禧惯用平衡术，不愿哪个臣子一家独大，甲午战争之后，她重用荣禄，以制衡翁同龢；戊戌变法之后，则重用刚毅，以制衡荣禄。不得不说，此举极具效果。荣禄官位更高，不曾把刚毅放在眼里，刚毅却死缠烂打，紧咬不放。有一天他们在军机处上班，正值午休，刚毅面色不豫，以酒杯击案有声，荣禄问何事，刚毅答："公与昆晓峰各占一正揆缺，我何时补正揆。想及此，是以怏怏。"昆晓峰即昆冈，正揆指三殿三阁大学士，其时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昆冈为东阁大学士，刚毅只是协办大学士（协揆），欲求进步，必须荣禄或昆冈出缺——这样的想法，更适合藏在肚子里，一旦当面说出，势在撕破脸皮。针对刚毅的逼宫，荣禄笑答："何不用毒药，将我与晓峰毒毙。"二人自此势同水火。[1]

权力之争以外，再说政见之争，发生在庚子国变期间。前面说过，刚毅不仅是义和团的忠实拥趸，还是朝中强援。荣禄对于义和团，认知要清醒一些。他的处置意见是在拳民之中区分良莠与首从，"但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会而不匪，虽

[1] 高树：《金銮琐记》，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141—142页。

会何伤，若既为匪徒，例应严办，而况冒拳名以张匪势乎！”[1]大体而言，还是主剿。这显然拂逆了慈禧的心意，故遭冷落，刚毅则与慈禧态度一致，趁机上位。

回顾庚子年荣禄的表现，优点与缺点都一览无遗。他的大局观，于满汉、华夷之争毫无成见，保证了对时势的明断；然而，他虽能明辨是非，却无法主导决策。因其人一向有脑子而无骨头，有格局而无血性，对慈禧一味献媚，“于政治上无所可否，皆迎合后意，而黜陟之宗旨，不无同己异己之见也”。[2]用大白话讲，他在慈禧面前，乃是一个马屁精或应声虫，只知迎合，不敢反对，哪怕察觉到慈禧错了，也会亦步亦趋，以求固宠保位。义和团事，便是如此。被慈禧责备之后，他不再坚持剿办。其幕僚樊增祥写信给他，大声疾呼：“……我不用兵则洋兵必至，洋兵一至，玉石不分，吾民受害岂堪设想？是打拳匪正是爱百姓，此理甚明。慈圣当能见醒。诗曰：‘发言盈庭，谁能执其咎。’函丈居此位，处此时，但当为朝廷挽危局，不必与糊涂人论是非，我心无他，疑谤何恤？天下后世自有公道也……”[3]他却无动于衷。因他眼里，并无百姓，以民生疾苦游说，不啻对牛弹琴；而且一向缺乏勇气，指望他面折廷争，不啻强人所难。最关键的是，“慈圣当能见醒”云云，实属痴人说梦，慈禧之流，不可能被叫醒，只可能被打醒。

---

[1] 荣禄：《查拳教滋事片》，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255页。

[2] 凤冈及门弟子编：《梁士诒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页。黜陟（zhì），语出《尚书·周官》，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

[3] 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256页。函丈是对荣禄的敬称。

对于义和团，主剿而不能剿办，对于洋人，反战而不可不战，两难之际，荣禄的对策，谓之骑墙，企图两面都不得罪。朝堂之上，他敢怒而不敢言，“若再分辩，视为叛贼矣”；行事则阳奉阴违，率军与列强开战，“围攻使馆久不下，众意稍懈。荣相见大势弗顺，已纡回改道，隐与使署通消息；或称奉诏送瓜果蔬菜，至东交民巷口，听洋人自行取入，一面设法牵制兵匪，使不得急攻。”[1]有人骂他阴柔谲诈，首鼠两端，“与使馆通馈遗，示殷勤，以为日后解免地步”，即为个人留退路。[2]这么说自可成立，不过荣禄此举，意义岂止在个人呢，何尝不是为国家留退路，为善后做准备？毕竟他“知各友邦之不易与”，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一言以蔽之，庚子国变，荣禄成也骑墙，败也骑墙。单论其败，作为与国休戚的朝廷重臣，明知拳民不可恃，外衅不可开，却不敢抗争，过于隐忍，“……忠良被戮则不知救，乱民纵横则不知禁，坐使激怒外人，酿为千古未有之奇变。呜呼！非荣之咎而谁尸其咎也？”[3]这已是极严重的指控。另有一种论调，称“庚子年拳匪乱起，荣实主持其事，而阳若置身事外”，这则几近污蔑。“主持其事”的大臣当推刚毅，亲贵则以端郡王载漪为首。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火烧大栅栏，殃及正阳门，京城骚动，混乱不堪，荣禄忍无可忍，与刚毅之流

---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5页。

[2] 夏曾佑：《论荣中堂》，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328页。

[3]《荣仲华相国薨逝感言》(《申报》社论，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1903年4月17日)，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329页。

正面冲突，在军机处大骂道："这些王八旦，要把义和〔团〕延入京，谓其能打洋人，闹得如许烂。"王文韶劝道："现在但须先清内匪。"荣禄道："一言难尽。"[1]还有一种骂法，谓"一班浑旦，将事弄糟，此时叫我一人作难"云云。[2]由此可知荣禄的政治态度及其处境。与李鸿章一样，他也成了背锅侠。

到底该怎么评价荣禄呢？相比前辈文祥，他身上不无矛盾，面目则嫌暧昧，与时代的关系更是纠结，盖棺论定，大是困难。方便起见，请允许我借用足球界的说法：有些球员，在场上踢球，从不显山露水，一旦缺席，球队立马失控，其价值，不在有他如何，而在没有他如何。此说正适用于荣禄。他襄赞枢密，执掌政柄，前后只有五年（1898—1903年），这期间，难说有什么光辉政绩；然而，庚子年春夏，他患足疾，不能行动，长期在家养病，待勉强复出，已是五月初十日（6月6日），"拳匪已闹到（到）处杀教焚堂"，朝政则为载漪、刚毅等所把持，与义和团沆瀣一气，大势已成，无可挽回。庚子国变，由此铸就，一大因素，即荣禄在关节点上的缺席。他的作用，不在正面，而在反面，不是有所为，而是有所不为。也许他不知道一个国家应该做什么，却深知不该做什么。由他执政，国事未必会好转，起码不会太糟糕。

请允许我继续借用足球界的上限与下限之说（譬如进攻球

[1]《高枏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高枏，字城南，前引《金銮琐记》作者高树之弟。

[2]张黎辉辑：《义和团运动散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第254页。

员决定了球队的上限，防守球员决定了球队的下限）。如果说文祥在努力抬高晚清的上限，那么荣禄则在努力捍卫晚清的下限。不幸的是，对文祥而言，时不我与，早已陷入衰世的晚清未能在他手上回光返照，同治中兴犹如一场稍纵即逝的政治春梦；[1]对荣禄而言，命运多舛，他崛起虽早，执政却晚，衰病之年，暮气缠身，更兼性情、才具等均有重大缺陷，难以力挽狂澜，只能苟延残喘。更不幸的是，正如张之洞以“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哀悼文祥，陈夔龙亦以此语哀悼荣禄，并感慨“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2]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死后，大清王朝连下限都无以维系，不出十年便跌入谷底，一蹶不起。

五、刚毅

荣禄之后，再说刚毅。

要说晚清政坛大佬，哪个人段子最多，刚毅必是选项之一。关于他的段子（既曰段子，则不必事事求真，姑妄言之，姑妄乐之），多与读别字有关。他虽是笔帖式出身，曾官居协办大学士，实则“读书不多”，“不甚识字”，常于大庭广众之下，满嘴别字，贻笑大方。时人作诗嘲讽道：

---

[1] 清朝可分作初世、盛世、衰世、末世。一般而言，初世即开国阶段；盛世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实乾隆朝晚期，国运已经由盛转衰；此后嘉庆、道光二朝，则属衰世；至于末世，到底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算起呢，还是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金田起义爆发算起，虽有争议，意思不大，死神将至，再无生机。

[2]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49页。

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
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
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1]

此诗句句都有来历，正适合作为由头，论断刚毅其人。

首联涉及上古四圣之二。四圣者，皋陶、尧、舜、禹。舜即虞舜，后世尊为舜帝，名列五帝；皋陶制刑，系中国司法鼻祖，“陶”字当读 yáo，而非 táo。刚毅任刑部尚书，与下属谈话，云“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这句话听来好似戏文，犯了两个错误：把舜帝降级为舜王，皋陶之陶，读作本音。[2]堂堂一品大员，竟然愚陋至此，不免令皋陶掩耳，虞舜失色。

跳过颔联说颈联，同样与别字相关。刚毅主持刑部，每每收到提牢厅关于囚犯瘐毙的报告（瘐毙指囚犯因受刑、冻饿、生病而死于监狱），以为“瘐”写错了，提笔改为“瘦”，还训斥下属不识字，下属不敢争辩，只能偷笑，故曰“一字谁能争瘦死”。[3]晚清多难，民生凋敝，民有菜色，时人常说“民不聊生”。这个成语并不生僻，搁在今天，估计初中生都能识得，刚毅则把“聊”读成“耶”，故曰“万民可惜不耶生”。

---

[1] 李伯元：《南亭笔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54 页。

[2] 李孟符：《春冰室野乘》，第 142 页。

[3] 同上，第 142 页。

除了诗中这四处硬伤，还有一些笑话。刚毅任军机大臣，读到四川总督奏报追剿番夷的折子，至“追奔逐北”一语，赫然而怒，“谓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折可任意错讹耶！拟请传旨申斥。”同事莫名惊诧，询问缘故。他答道：“此必‘追奔逐比’之讹，盖因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其往时掠去汉人之财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同值军机处的翁同龢忍住笑声，给他解释追奔逐北的意思，古时打败仗称作败北，追击败逃的敌军称作逐北，汉朝早有此说，“刚终摇头不谓然”。[1] 又如在江苏与人闲谈，岸然曰：“人皆谓我刚复自用，我知刚直而已，何谓刚复，我实不解。”原来，他把刚愎自用之愎（bì）误读为复（fù）。[2]

回头再说颔联。黄天霸是清代小说《施公案》之主角，叔平是翁同龢的号。翁同龢与刚毅之间，曾上演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刚毅仕途，曾得翁同龢大力援引。戊戌变法前夕，翁同龢忽被光绪帝罢黜，“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刚毅闻讯，大喜道：“此举可谓远佞人矣。”[3] 此之谓“远佞思除翁叔平”。政变之后，处罚升级，“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一转折，亦由刚毅促成。翁同龢一度百思不得其解，曾对客人说：“子良（刚毅字）前充刑部司员，由余保列一等，得以外简。厥后以粤抚入京祝嘏，适额相奉旨退出军机，余即力保子良继入枢垣。

---

[1] 李孟符：《春冰室野乘》，第 142 页。

[2] 许指严：《十叶野闻》，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94 页。

[3]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第 173 页。

虽不敢市恩，实亦未曾开罪。不知渠乘人之危，从井下石如此！”嗟叹久之。客人道：“刚相识汉字无多，闻在直时，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从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鼐为刘鼐。经公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翁同龢熟思良久，曰：“是吾之过也。”[1]

翁同龢当众指出刚毅的错误，不止“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等别字。据许指严《十叶野闻》，有一次，刚毅向朝廷推荐一位叫龙殿扬的总兵，称此人系“奴才之黄天霸”，众人暗笑，退朝之后，翁同龢讥嘲道：“龙镇是公之黄天霸，公即是施德全耶？”刚毅无言以对。此即“荐贤曾举黄天霸”之由来。[2]

刚毅的问题，不只不学无术，而且自以为是，借用他读错的成语，叫“刚复自用”。与其共事，无不郁闷。翁同龢本是谦谦君子，以恭谨著称，连他都按捺不住，公开批评，足见刚毅洋相百出，不得人心。说到对刚毅的批评，正可考验一个官员

---

[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69—70页。祝嘏（gǔ），此处指祝寿；额相即额勒和布。

[2] 许指严：《十叶野闻》，第95页。有些版本，则将嘲讽刚毅的人换作荣禄。刘体智《异辞录》云：“一日，刚毅荐龙殿扬之材勇，上问如何，对曰：‘若昔之黄天霸。’上知其未学，满人本不以文重，弗之责也。既退，荣相哂曰：‘公以龙殿扬喻黄天霸，公得毋以施世纶自命乎？’世纶在当日诚为喧赫，而今日伶人演剧，则以下等戏角充数。相与一笑而罢。”（第176页）佚名《清代之竹头木屑》云：“刚毅尝于太后前荐其昔日抚苏时之中军王定扬曰：‘王定扬竟是臣手下一个黄天霸。’慈圣颇哂之。时荣相亦同召见，出谓刚曰：‘黄天霸虽好，但只可惜去那施不全的，竟是一个包袱脚儿如何？’包袱脚者，京师语，谓人满腹是戏，口中却唱不出之谓也。刚闻之，甚以为恨。”（《清代野史》第4卷，第1933—1934页）这两个故事，应以后者更可信，因为以刚毅的度量，遇人吐槽，绝无可能“相与一笑而罢”。

的修为。《清代之竹头木屑》云："刚尝于拟谕旁添'毋蹈积习'四字，以授仁和，而'蹈'书为'跌'。仁和见之，乃取朱笔密点跌字四围，旁另添楷书一蹈字，始终未变辞色，时人皆服其雅量。"[1]仁和者，绰号"琉璃蛋""水晶灯笼""油浸枇杷核子"的老滑头王文韶也。李伯元《南亭笔记》亦记此事，并谓："刚毅以其恭顺也，大喜。自是与王交谊日笃，同列皆不及也。"[2]

话说回来，一个人不甚识字，好读别字，未必一定便是蠢人。愚蠢与否，对应的往往不是知识，而是常识。刚毅曾自辩："凡求治何必学问？但实事求是，即平生大经济也。"[3]这后半句倒也在理。实事求是，即属常识，有知识的人未必有常识，无知识的人未必没有常识，大字不识一筐的农民、工人的常识感未必弱于满口之乎者也的专家、学者。试举一例。崇礼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曾遭陈宝琛弹劾，称其"识字无多，习气甚重"，习气指旗人习气，如抽鸦片、讲排场、好逸恶劳等。看来此人比刚毅还不入流，刚毅只是不甚识字，并无几多旗人习气。对此，一路提拔崇礼的宝鋆告诉何刚德：

> 当洋兵之毁圆明园也，两宫以列祖列宗圣容为重，有旨命我往视。及到园，满地灰烬，村无居人。时崇礼以奉宸苑苑丞独守官舍，我询以洋兵踪迹及连日蹂躏情形，相对而泣。旋告以来意，假以从骑，同往各处寻觅。二人奔驰十余里，见圣容

[1] 佚名：《清代之竹头木屑》，《清代野史》第4卷，第1934页。

[2] 李伯元：《南亭笔记》，第56页。

[3] 许指严：《十叶野闻》，第95页。

散佚地上，残破不堪，惊惶无措，崇礼乃泣言曰："圣容毁坏至此，即检拾亦不能全。若举以覆命，不特徒增国耻，且益伤圣心。以苑丞愚见，不如归之火化，较为得体。"我以其言甚中肯，乃嘱其寻觅稻草举火，跪地泣而焚之，归以遍寻不见覆奏。自是我甚重其人，遂由苑丞渐渐升到郎中。二十余年，循资按格，得一尚书，似不为过。今谓其识字无多，苑丞何能与太史公比？但事理之明白与否，自又当别论也。[1]

这个故事，足见崇礼头脑之清晰，处事之决断。可惜，同样"识字无多"，刚毅却远远谈不上"事理之明白"。用许指严的话讲，"刚于文字固茫然不解，而于事理亦绝无见解，盖普通知识不完也"。[2]于事理绝无见解，这一点最是要命。由此来说尾联，即"师弟师兄保大清"的故事。

前面说过，考察晚清的满人，有两条直接标尺，一看怎么对待汉人，二看怎么对待洋人与洋务。如果说在清初，提防、仇视汉人，属于满人的正常思维，那么经过长达两百年的政治驯化，满汉几乎一体化，一些汉人对朝廷的忠诚度，甚至超过满人，从政权稳定性上讲，排汉非但毫无必要，反而是一种破坏力。职是之故，有识之满人，"固早以排汉为戒也"，如肃顺坦言满人浑蛋太多，汉人不可得罪；宝鋆告诫奕䜣："我们满洲特一洲耳，虽有人才，何能与汉人十八省比！"[3]不过还是有些

[1]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8—9页。

[2] 许指严：《十叶野闻》，第95页。

[3]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58页。

无知之徒，对汉人处处排斥、压迫，把“汉人强，旗人亡；旗人瘦，汉人肥”书于座右，见者无不惊骇，此人即刚毅。[1]

排汉只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仇洋——这二者正有相通之处——刚毅仇洋之代表作，便是庚子国变。事后追责，判定他为罪魁祸首，并不过分（如袁昶、许景澄点名批评，斥刚毅、徐桐为“酿祸之枢纽”）。[2]庙堂诸人，大概只有慈禧的责任在他之上，然而慈禧一度受他误导，也是事实。他对义和团，绝非成心利用，以之为消耗洋人枪火的炮灰，而是顶礼膜拜的信仰，披肝沥胆的忠诚。待义和团涌入京城，则不顾大臣体面，着其衣装，尊其神灵，与团民师兄师弟相称，并亲自督战，攻打西什库教堂，结果溃不成军，“败北者一拥出西安门，刚毅立不能稳，足不能动，力抱门柱而立。一老阍人不知其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纪，亦学此道，何自苦也。’”[3]

然而刚毅不以为苦，甚至至死不以为误。攻打教堂失败，团民战死数百，他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回头曾怒斥义和团：“公等在涿州时，皆言何如，今若此，天下事不足言，吾与之俱受其戮矣。”[4]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亦云：“攻使馆不下，刚毅自知祸不旋踵。时兵部郎中恩良病故，刚毅闻之曰：‘恩老爷能替

[1] 李伯元：《南亭笔记》，第56页。

[2] 袁昶、许景澄：《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

[3] 陈恒庆：《清季野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第638页。

[4]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17页。

国家办事，怎么好好就死耶，像我又何以不死？’时天津失守，裕禄自戕，刚大沮丧，礼亲王戏之曰：‘中堂之团安在哉？’刚扬目视之曰：‘到此光景，尚戏弄哉？’”[1]按此口径，能否说明，刚毅终于看穿神术，幡然醒悟了呢？事实则是，临终之际，他对身边的朋友说：“非义和拳不能杀洋人，实在被假的混坏了。”[2]

什么是愚蠢？这就是愚蠢。愚蠢不仅指缺乏知识，缺乏逻辑，缺乏判断力，还指缺乏反思与纠错能力。尽管隐约意识到自己步入了错误的方向，却不愿回头，宁可一条道走到黑，直至穷途末路。歧途之上，他们还得不断说服自己：这是正道，这是正道……要言之，一个人愚蠢到无法认识自己愚蠢，只是一般的愚蠢；一个人愚蠢到不肯承认自己愚蠢，才是最大的愚蠢。

古往今来，有种种误国之说：清谈误国、奸臣误国、外戚误国、太监误国、红颜误国……刚毅则定义了一种新说法：愚人误国。

六、奕劻

荣禄死后，其领班军机大臣一职，由奕劻接任。自此，军

---

[1]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6页。

[2]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页。

机处进入奕劻时代。[1]宣统三年（1911年）军机处废止，责任内阁制施行，奕劻任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照旧权倾天下，只是这天下不久将天翻地覆。

世人尝将大清之亡归罪于奕劻头上。如溥仪所言："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这话有几分道理呢？倘从人才与国运的视角来看，以奕劻的才具，执掌一国之政权，约等于死刑宣判。光绪十年（1884年），借甲申易枢、朝局洗牌之机，奕劻得以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外交。宝鋆闻讯感叹道："劻贝勒只是一布伊唵邦（满语，意为内务府大臣）材料耳，如何能办外交？"这是知人之论。后来何刚德记录此语，同样大发感叹："回思吾师当日之言，益信国祚与人才，不得谓无关系也。"[2]——国祚有国运之意，正与我们所谈论的主题契合。

无论学与术，还是才与略，奕劻都不出众，甚至有昏庸之名。不过究其实质，其人则庸而不昏，头脑相当好使。单说庚子国变。他和荣禄一样，早已看穿义和团不堪大用，理当尽早切割，区别在于，起初荣禄还敢于直言，他则自始至终，默不作声，以致被误作刚毅、徐桐之伍。要消除这一误会，并不

---

[1] 晚清军机处之历史，从领班军机大臣的才具来看，可谓每况愈下。金梁《光宣小记》云："……近人论军机，尝以'权''位''势''利'四字评之。谓恭王初议政，可称有权；迨罢后复起及礼王入直，仅保位而已；荣禄善于迎势而不能阻拳乱，足见其难；至庆王惟知为利，愈趋愈下，更无论矣。"（第15页）

[2]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38页。光绪十年（1884年），奕劻已加郡王衔，并非贝勒。

困难，证据处处可见。譬如义和团进入京城，声称要杀“一龙二虎十三羊”（一说三百羊），一龙指光绪帝，二虎者，即李鸿章与奕劻，能与所谓晚清头号汉奸并列，足见奕劻在义和团眼中形象之劣。与此相应，荣禄致其叔、四川总督奎俊家书云：“……故庆王（奕劻）尤不敢出语，而拳民竟有以他为汉奸，几欲攻其府第（其中竟有以去腊之事不平者），亦有人使之耳。”[1]这则呈现了奕劻处境之险峻。

其时中国北方，对于义和团，以信者居多。亲历庚子国变的天津人刘孟扬提供了一组数据：“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2]八二开之于民间，当可理解，对官场来讲，是不是有些夸张？事实上，官员信奉义和团，即使没有八成，怕也差不了多少。如袁昶、许景澄《斥酿乱大臣疏》所云：“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

---

[1]《荣禄致奎俊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1900年7月18日），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268页。去腊之事应指己亥建储，慈禧欲废光绪帝，立溥儁为大阿哥。

[2]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页。刘孟扬把“不信者十之二”分作三等：“一为信奉回教之人，一为见理明透之人，一为深明大局之人。”此外，我们谈义和团，一直强调中国北方，那么南方如何呢，东南互保能否反证南方并无义和团土壤或氛围？汪诒年云：“其时北方固已糜烂不堪，即南方各地，亦蠢蠢然有乘机窃发之势，即就省会及商埠言，市民之传说，大都表同情于拳匪，思起而效其尤。假使各国军舰麇集长江，各地风声四起，讹言繁兴，莠民从而和之，则大祸可以立作，全国将无一片干净土，不可为国矣。故立约互保，实为不得已之举。”（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8页）

坛。”[1]在“盈廷惘惘”的迷狂氛围之下，奕劻能认清义和团的真面目，诚为难得。他属于刘孟扬所表彰的“见理明透之人”或“深明大局之人”。

有此头脑和眼力，奕劻何以不敢直言呢？这与其对慈禧的态度有关。前面说过，荣禄对慈禧，一味逢迎，奕劻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慈禧出错，荣禄还会委婉讽劝两句（如己亥建储），奕劻则只可能将错就错，一错到底。是以当慈禧表现出了对义和团的信任，他便迅速抹杀自己的主见，改是成非，随波逐流。[2]不唯实，只唯上，不唯心，只唯权，乃是一个庸人在政坛的明哲保身之道。另一面，慈禧不是不清楚奕劻的才具，以及贪腐之臭名，然而还得重用，“宠信逾常”，最大原因即此人听话，而且只听她的话。

奕劻贪腐，臭名昭著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来看大环境，晚清官场，几乎无官不贪，无事不贿。哪怕像吴永这般，有恩

---

[1] 袁昶、许景澄：《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67页。

[2] 关于奕劻与义和团、慈禧等的关系，可参戴海斌《也说义和团运动中的奕劻》，氏著：《晚清人物丛考（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02—240页。另，庚子国变期间，奕劻也曾表达主见与义愤，前提是大势已经分明，而且慈禧不在场。联军进城，两宫西狩，奕劻奉命回京善后，与赫德等会谈，会上，昆冈谈及徐桐之死：“徐中堂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拟请附奏请恤。”奕劻勃然变色曰：“徐相已死，可惜太晚了。倘早死数日，何止有徐筱云尚书论斩之事。……筱云诸人之命，实断送于此人之手。假使筱云尚在，今日议事，多一解事之人，岂不甚善。渠死事遗折，我不能代奏。”（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35—36页）徐筱云即徐用仪，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因主张“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被斩于菜市口，系“庚子五忠”之一。从奕劻对徐桐的态度，可知他缺的不是脑子，而是骨头。

于慈禧，备受眷顾，要想升官，也得花钱，如其朋友所规劝："现在朝局已成互市，无价之物，终不可得。难得公根柢如此，较之他人，定当事半功倍。小往而大来，倍称之息，何乐不为？"[1]吴永不干，只能原地打转。清廉的代价，便是独善其身，坐视时局糜烂，忧心如焚而无可奈何。这里顺道说一点，古代中国，清廉绝非评价官员的重要标准。按高阳总结，康熙帝曾将地方官分作六等："爱民、干练、清廉、不好名为第一等；爱民、干练、清廉为第二等；爱民、干练、虽贪不苛为第三等；清廉、才具平常为第四等；才具平常、操守不佳，但能实心办事为第五等；贪污无能兼而有之，则为第六等。"[2]清廉在其间，仅排第三，并非关键。在皇帝眼里，贪污不是大问题，只要这个人足够能干；清廉亦非大德行，假如这个人才具平庸（对百姓而言，也是如此，他们更愿接受一个贪污而能做事的官员，不愿接受一个清廉而不做事的官员）。结合我们所谈论的人物，荣禄接近前者，刚毅属于后者，他虽有清官之名，却因其愚蠢，误国更深。

奕劻头脑比刚毅清楚，然而过于滑头，对上惟慈禧之命是从，对下则以金钱的方向为转移，因此难逃无能之讥，属于康熙帝最厌恶的第六等官员。其贪污生涯，大贪之外，还有一点

---

[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58页。

[2] 高阳：《清末四公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页。后文云："张伯行号称'天下清官第一'，其实，圣祖（康熙帝）视之为第三等人物。他曾说过：张伯行喜欢刻书，哪里来的钱？言下并不以为张伯行一清如水。但在表面上仍评张为清廉。由此可知，他将清廉的标准打得极低；上谕中屡次表示，只要真能为地方生利，有益于民，享用稍过，不足为罪。"

特色，曰明贪。他手上的乌纱帽，大都明码标价，公开买卖，无所顾忌。如《清史稿》所载御史蒋式瑆之言："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1]当官场沦为交易市场，奕劻的王府遂被称作"老庆记"，他与另一位大贪官那桐合称"庆那公司"。更严重的是，奕劻不只一人如此，还引导了一种政治风气，即吴永的朋友所云"朝局已成互市"。对此，媒体描绘道："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犖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衣冠之俦，官署之中，宴会之场，莫不曰运动、运动。""今日之政府诚腐败，且腐败至不可收拾。"[2]要言之，这是一种结构性腐败或制度性腐败，国家机器的各个齿轮上都爬满了蛀虫，大清王朝早已从内部被吞噬一空，纵使没有外力，随时也会坍塌。是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书之后，哀叹道："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说到此处，失声痛哭。[3]

奕劻卖官，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不择人。只要给足价钱，什么人他都敢卖，哪怕对方身上布满革命党色彩，譬如吴禄贞任新军第六镇统制，便是走他的门子，行贿二万两白银。

---

[1]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098页。晚清公开卖官，乃是常态，不独奕劻如此。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称慈禧卖各色肥缺以为常事，其中一类如"粤、闽、海、淮、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山海关各监督，宁、苏、杭各织造，此皆专为应卖之品，可以明挂招牌者也"（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91页）。

[2] 侯宜杰：《晚清的贿赂名堂》，《经济观察报》2011年1月28日。

[3]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二），第577页。

二是不择时。哪怕国家将亡，他也照卖不误。试以锡良的遭遇为例：

> 锡文诚公（锡良）庚子年请率队勤王，中外共仰。自闻武昌之变，颇自奋发，余特至京谒之，有人为画策：由公自请重兵驻津、滦，卫京畿，南北各军有不奉命者即以兵定之，意在制袁；并起升允督陕甘，备缓急。廷议以公督陕，召见决策，而枢要索贿八万金。公作色曰："生平不以一钱买官，况此时乎？"或谓正为此时，不妨破例酬之，庶可救亡，公不顾。朝命竟改授热河都统，谓备北狩。而公预保张锡銮为晋抚，闻致贿四万，竟先得赴任。值此日此势，当轴犹忍索金，真全无心肝者矣！[1]

锡良在晚清，也是一号人物，曾任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等，南征北战，经略四方，忠诚而廉洁，而且极具自知之明，尝在朝房对人说："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2]自言其短，足见风范。其人虽才具有限，却精神可嘉，国难当头，不顾安危，奋袂而起，有志力任艰巨，无奈碰上了奕劻这样的货色，即引文所云"枢要"。此刻还要卖官索贿，岂止全无心肝，简直不配称之为人。

---

[1] 金梁：《光宣小记》，第39页。锡良的反应，亦可见君子何以误国，为了守护自己的一世清名，不知变通，错失良机——当然这近乎《春秋》责备贤者。

[2]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陶菊隐：《张文襄幕府纪闻、近代轶闻》，第36页。

有人会问：奕劻没有脑子吗，难道不知，大清不亡，还能继续捞钱，一旦亡了，则无敛财之机？这个道理之成立，需要一大前提，即坚信国在家之上，起码二者利益得相互捆绑。对奕劻来讲，则先家而后国，甚至置国家于不顾，个人利益永远高于国家利益，否则何以会卖公营私，聚敛无厌。这应是贪官的共同心理。此外，揣度奕劻的心思，还有一重因素，导致他卖官鬻爵，肆行无忌，即这个衰朽的王朝，眼见撑不了多久，赶紧卖一官是一官，捞一笔是一笔，等到大厦倾塌，遍地灰烬，连一根毛都捞不到了呢。这则可谓末世心态，最具传染效应，奕劻只是“一般亲贵”的代表而已。

大难临头，人性毕露。奕劻的问题在于，不仅吃相难看，而且翻脸无情。1913 年初，隆裕太后去世，清室召他来料理后事，他却置之不理。这一下激起了遗老的众怒。他的亲家孙宝琦西装革履，前去吊唁，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假装不识，上前问道：“先生是哪一国人？”孙宝琦道：“节庵，你开什么玩笑？”梁鼎芬板起面孔呸了他一口，大骂道：“谁跟你开玩笑？你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革命党，你就不该到这里来；你如果还记得做过大清朝的官，为什么不穿孝服？你带信给你那个亲家老鬼，叫他别活在世上吧，免得丢人！”一旁伏地叩头的劳乃宣跳了起来，大呼“骂得痛快”。[1] 亲家老鬼，正指奕劻。

1917 年 1 月 29 日，奕劻病死于天津租界。其家人向

---

[1]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 1 集，第 523 页。

已经逊位的小皇帝溥仪递遗折，请求谥法。十二岁的溥仪爱憎分明，否决了内务府所拟的“哲”字，提笔写下了“谬”“丑”“幽”“厉”等恶谥，令其选择。载沣闻之，于心不忍，找儿子求情，提议用“献”字，溥仪又哭又闹，死活不从。后来南书房拟了个“密”字，勉强通过。[1]按苏洵《谥法》，“追补前过曰密”，正适合为奕劻盖棺。

补记

荣禄死后，满人再无统领大局的人才，奕劻贪婪无能，端方名不副实，余者则如锡良所自谓，连督抚之才都难胜任。这里要补上一笔的人物，一是肃亲王善耆，二是良弼。善耆以开明著称，饶有胆略，不过干才略逊。康有为致梁启超信，谈及其人，见识甚是精辟：“肃（善耆）乃名士派，亦与端方等，未必能任大事，但彼已交亲，借彼怒怨，以合王公，终胜他人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七，1908年3月9日）善耆的名士气，一大表现即嗜戏成癖，常常不务正业。吴恭亨《对联话》卷十四云：“予闻善耆为尚书时，喜度曲，一日，衙参僚吏方白事，善耆忽一声倒板，四座惶骇，久之乃引散。亡国之怪现象，此足代表矣。”《梼杌近志》云：“当庚戌夏间，各省代表以请愿国会集京师，晋谒肃，谈次，邸忽取帽掷于案，大声唱‘先帝爷白帝城’云云。诸代表悚然大惊异。肃徐笑曰：‘诸君无尔，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儿就得了。’”就此说来，善耆非但难当大事，只怕连小事都

[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3—54页。

成不了。

良弼的确是人杰，《清史稿》誉之为“刚果有骨气，颇自负”。他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吴禄贞、张绍曾等相识。回国之后，投身军事，“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尤留意人才，自将帅以至军士，莫不延纳。思有所建树，颇为时忌。”(《清史稿》) 为了对抗袁世凯，他竟不惜援引吴禄贞，付与军权，此举可谓以毒攻毒，非狠人而不能为之。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复出，借革命而逼宫，他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宗社党，企图垂死一搏，不久即死于革命党人彭家珍的炸弹之下。临终之际，依稀豪杰风采，对刺客并无怨恨，反而惺惺相惜：“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不足惜，惟清廷宗社从此灭亡为可恸耳……我死，清廷亦随之亡也。”诚如此言，他这一死，满人丧胆，强硬派作鸟兽散，大清再无支柱，末日将至。

七、三品以上皆浑蛋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秋，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王照，托人给时任京城左营游击的哥哥王燮带去一封密信，“以大乱在即，请早托病去职。”可惜语焉不详，不知大乱所指。若谓己亥建储，还处于山雨欲来的酝酿阶段；至于义和团，则在华北小打小闹，未成气候。是以王照此言，如今来看简直未卜先知，当时则有妖言惑众之嫌，王燮不以为然，实属正常反应。等到来年，义和团进京，王燮的顶头上司辅国公载澜不仅系其信徒，还是向导——柴萼（柴小梵）《庚辛纪事》云：“……即有拳

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随处设立拳厂坛场，触目皆是。”[1]——他也跟风立坛，拉王燮入团。王燮不从，找官居侍郎的堂舅华金寿商量行藏，准备告病退职。华金寿勃然大怒，痛斥道：“你曾祖刚节公被洋人打死，今国仇家仇一齐报复，你反而出此泄气的话，天良何在？”刚节公者，即王燮和王照的曾祖父抗英名将王锡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任寿春镇总兵，与英军血战于定海，被乱刀砍死，谥刚节。当华金寿拉出王锡朋的牌位，王燮不敢反驳，回去之后，遣散家人，只身待命，不出数日，被义和团当作私通洋人的奸细而杀害。[2]另有一说，《逝去的武林》口述者李仲轩是王燮的外孙，他认为外公死于八国联军刀下，下葬之时，连头都没有，只好做了个铜头，以充全尸。

王燮之死，华金寿显然脱不了干系。他若能明辨时势，不以大义责人，同意王燮辞职，也许悲剧将会改写。说起华金寿这个人，极端守旧、排外，与刚毅、徐桐等本是一丘之貉。其时他被任命为福建乡试正考官，以侍郎而主考，甚是稀奇，背后用意，则在“衔命宣传大计，一路劝化鲁、苏、浙、闽四省督抚也”——所谓衔命，指朝廷有意驱使义和团与列强开战。对此任命，其子华学涑大喜道：“父亲借此逃难，好极了。天

---

[1] 柴萼：《庚辛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306页。

[2]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88—89页。

津、北京不久必失，不能走者苦矣。”华金寿则骂道：“你小孩子懂什么，天道六十年一变，今灭洋之期已近，我岂逃哉？”华学涑道：“无怪乎人说‘三品以上皆浑蛋’也。”[1]

为什么说三品以上呢？这应源自三品大员之说：古代中国，官至三品，可称大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1896年6月15日），“都门作客，忽值端阳”，谭嗣同给同乡好友刘善涵写信，谈及现状：“……时事较之未乱前，其苟且涂饰尤为加甚，岂复有一毫可望者哉？京官在下位者，人材极多，游士中亦不乏人，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天命如此，夫复何言！”[2]他对庙堂人才的评判，亦以三品为界。“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一言，则发“三品以上皆浑蛋”之先声。

“三品以上皆浑蛋”的故事，出自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读之有拍案惊奇之感。后来纪果庵读到此节，亦云“以子詈父为浑蛋，大奇”。随之谈起北地风俗，以为注脚：“北俗骂人喜用浑蛋，官场尤甚。忆某笔记记某公宣统间为奉天监司，名其科长曰‘大浑蛋二浑蛋’，一日客至，欲为雀战而鼎足阙一，乃以电话召其科长曰：‘叫大浑蛋来。’斯更浑蛋之异闻也。”[3]

---

[1]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第89页。

[2] 谭嗣同：《致刘善涵》，《谭嗣同集》下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80—581页。

[3] 纪果庵：《风尘浭洞室日抄》，《风雨谈》第10期（1944年3月）。纪果庵原名纪庸，周作人弟子；浭（hòng）洞，意为绵延、弥漫；风尘浭洞，即风沙弥漫。作者云：“余好读杂书，初无伦序，畴居塞外，昼苦风尘，夜懔寒冱，辄颜其居曰‘风尘浭洞室’，每炉火初温，煮水丝丝作响，虽牖外风声虎虎，沙砾扑窗，而发书疾览，佐以红茶，则大适意，不知其在居庸数百里外也。”

哪怕浑蛋是日常用语，儿子这么说老子，未免耸人听闻，何况华家这样的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不过这里当反过来看，可见华学涑对官场观感之劣，对父辈怨愤之深，以致口不择言，言为心声。彼时朝政，为守旧派所把持，守旧派则多老朽，如八十岁的徐桐、七十一岁的崇绮、六十三岁的刚毅、六十一岁的启秀等，被誉为“直隶京官领袖”的华金寿正是其中一员干将。这帮人不但老迈，而且昏聩，不但愚蠢，而且自负，不但自以为是，而且盲目乐观。譬如华金寿声称“今灭洋之期已近”；骆成骧任贵州主考，向老师启秀辞行，启秀道：“俟尔回京销差时，北京当无洋人踪迹矣。”[1]对于他们的精神状态，纪果庵用“不晓事”三字来评价，可视为浑蛋的委婉说法。

我曾引用“三品以上皆浑蛋”一语及其典故。有人问：“什么是浑蛋？”我答：“愚人。”他质疑道：“既然能爬到三品以上，说明都是人精，怎么可能愚蠢呢？”这个问题，首先关乎何谓愚蠢。如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所云，“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非理智上的缺陷，智商与愚蠢并不必然相通，有些人智商高，却可能是蠢人，有些人智商不高，却可能不是蠢人”。[2]要言之，愚蠢与否，考量的是常识、逻辑、视野、是非观、善恶感与反省能力，具备这些元素，未必需要超群的智商；相反，绝顶聪明之人而缺乏常识、不分善

---

[1] 柴萼：《庚辛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310页。

[2] [德]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8页。

恶、混淆是非，比比皆是。

庚子年前后，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如是否相信他们的神术，是否指望他们来扶清灭洋，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蠢人。刚毅出身刑部，断案无数，徐桐、启秀、华金寿等都是两榜进士出身，崇绮还中过状元，论智商，恐怕没有一个会低于常人，然而他们偏偏蒙蔽于义和团的鬼把戏，闻风响应，摇旗呐喊，这便是典型的愚蠢。

相比他们的愚蠢，有待琢磨的是他们何以如此愚蠢。这里且说一个案例，主角是刚毅、徐桐的“同志”李秉衡。李秉衡任山东巡抚，只用幕友两人，足资办公而已，仆从三人，足供使令而已。廉洁自持之外，他还以公忠体国著称，被誉为“东抚谋国，椎心呕血，自是当今纯臣第一”。[1]不过这只是一面，另一面，则与华金寿一样极端守旧、排外，仇视洋人，反对洋务，深信义和团的神异与忠义等。关于他在庚子国变期间的表现，兹录一节读书札记：

> 李秉衡一贯排外，仇视洋人与洋教，曾大大得罪德国，遭到严重抗议，山东巡抚干不下去，四川总督亦未履任。他是义和团最早一批支持者，大名鼎鼎的毓贤（继李秉衡任山东巡抚）只能排在他身后。庚子年间，他奉命整饬长江水师，本已参与东南互保，后又募师北上入卫。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七月初一日，李督师（李秉衡）到京，朱学士祖谋、马编修吉樟

[1] 王懿荣：《与张之洞》，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230页。

先要诸途，述京师乱象，宗社之危如累卵，公入见，当力为太后言拳匪恣慢状，苟议和，大祸纾矣。督师深以为然。迨入朝，徐相（徐桐）首迎之，大声曰：‘鉴翁，盖世瞻仰，在此一举。’鉴翁者，督师字鉴堂也。复见刚相（刚毅），知太后旨所在，意遂变。奏言：‘外国多，不可灭，异日必趋于和，然必能战而后能和。臣请赴前敌决一战。’太后大喜，命统率武卫军全军及陈泽霖等各营。武卫军实不成军，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闻敌师至，将溃，督师吞金自尽。”[1] 按李秉衡的本心，应当倾向与列强开战，对朱祖谋等人出尔反尔，倒也不该苛责。不过这背后还有一点转折。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李秉衡奉旨统军之后，曾连夜拜见荣禄，屏退侍从，坦露心声：“洋兵如此厉害，战事那有把握，我此番往前敌，但拼一死，可速电招李中堂迅即来京办理和议。”荣禄愕然道：“君早间请训，吾辈一同入见，君谓民气不可拂，邦交不可恃，战事必有把握，颇动两宫之听，何一日之间，所言自相矛盾如是之甚也。”李秉衡默然，匆匆辞去。“讵甫至杨村，所带部曲半已哗溃，督部亦遂吞金自尽。”[2] 这两条史料，则使李秉衡所遗留的守旧、排外形象有些动摇。若说他愚蠢，他却不像刚毅、徐桐那样，以为凭借义和团的力量足以灭洋，而深知“洋兵如此厉害，战事那有把握”，进而提议请李鸿章出山善后；若说他不愚蠢，他何以明知此战必败，却对慈禧说“战事必有把握”，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把大清引

[1]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 67 页。

[2]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 28—29 页。

向绝路呢，“始以大言欺世，继以一死塞责，毕命疆场，诚得所矣，而君子不取焉”。[1] 止庵《神奇的现实》论李秉衡，称其为毓贤与裕禄的混合体，集前者之愚昧无知、后者之逢迎投机于一身，“但拼一死”以成就自己的气节与人格，而不惜牺牲国家、百姓。[2] 这实在是一位貌似爱国、实则误国的典型。

王懿荣致张之洞信，对李秉衡有一考语：“一不晓洋务，二不知兵，三且不看京报。”[3] 这三点，尤其第三点，大抵可以解释其愚蠢之由来，此即我屡屡强调的“甘于愚蠢”。当一个人没有机会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犹可宽恕；当一个人明明有机会而拒绝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不可谅解。更可怕的是，李秉衡之流绝不认为自己愚蠢，反而觉得真理在手，天下我有，加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道德感，好似春药一般，必将强化其胸中的成见和执念。这些人当政而误国，远甚于他们所鄙弃的奸臣、小人。是谓“君子误国，甚于小人”，又云“天下事皆误于此等正人”。[4]

说罢愚蠢，再说制度，两者合力，才能成就“三品以上皆浑蛋”的历史奇观。华金寿们所处的政治语境，属于皇权专制，彼时已经步入末期，专制主义的所有优点被无限压缩，所有缺陷被无限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逆淘汰机制，对于人才，表现

---

[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 29 页。

[2] 止庵：《神奇的现实》，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年，第 104—108 页。

[3] 王懿荣：《与张之洞》，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 230 页。

[4] “天下事皆误于此等正人”一语出自吴樵论李秉衡，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 230 页。

为吸纳庸才，过滤英才。欲爬到三品以上，相比才干，更依赖血缘、族裔、派系、运气等。做官不是比聪明，而是比傻（当然比傻不是真傻，其要义在于装傻，装傻不仅考验智商，更考验情商）。官员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欲求无过，只能无为，少说话，以防说错话，不做事，以求不出事。其代表，如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向门生传授其位极人臣、身名俱泰的秘诀："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并告诫即将担任御史的门生："毋多言，毋豪意兴！"[1]说到这里，我们发现，其实曹振镛比华金寿等人，更适用"三品以上皆浑蛋"之说，他不仅自己浑蛋，还教唆门生当浑蛋。

晚清政治，另有一大特色：满人做官，较汉人大为便宜。这一来基于执政者的种族，满人呱呱落地，嘴里便含了金钥匙，他们的仕途，无论起跑还是冲刺，都占尽先机；二来满人更流行买官，王照说，各省三品以上大员，"买主多是旗员，汉大

---

[1] 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67、68、119页。后文云，道光以来，世风柔靡，正源于曹振镛的为官秘诀。又引无名氏《一剪梅》四则，堪为官场之绝妙写真："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论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清代野史大观》有"曹振镛之误清"一条，指控更为严厉，称曹振镛建议道光帝对于臣工奏章，"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又在馆阁体上大做文章，"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齐整无破体者，即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结果，"曹振镛则拘牵文义，挑剔细故，钳制天下人心，不得发舒，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洪杨猝发，几至亡国，则曹振镛之罪也。"（小横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观》中册，第746—747页）

员不屑钻狗洞者十之九”。[1]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晚清会流行“三品以上皆浑蛋”。是时，八旗子弟尽成纨绔，遍地阿斗，由他们出任高官，必定增加庙堂之上的浑蛋指数。这一点，一些清醒的满人并不否认，反而痛心疾首。肃顺那句名言，我们不必再引了，且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士珍被授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戴，觐见之时，光绪帝告诉他：“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2]——这话出自皇帝之口，何其具有说服力。

可惜，有此觉悟的两位满人，先后折在慈禧手上，一个被处斩，一个被架空，大清的国柄，落入一帮浑蛋股掌，不亡何待？正如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结尾所感叹的那样：“清末王公大臣概皆麻木不仁，识见迂谬，一切用假面具以欺饰天下耳目。天理灭绝，虽不遇国民革命，亦无不亡之理。”[3]

---

[1]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岑春煊、恽毓鼎等：《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第91页。

[2] 同上，第106页。

[3] 同上，第110页。

后记

老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造化弄人，世事无常，种瓜往往得豆，种豆却可能一无所获。十来年前我涉足中国近代史，怀揣的种子，原是制度史，收获的果实，自2010年出版的《百年孤影》，到眼前这本《知识与国运》，前后五本，几乎清一色是人物志。内中曲折，半属时代，半在个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大都不足为外人道。唯一有待分说的是，从制度史到人物志，主动或被动的转型，促使我重新思考人与制度的关系：年轻的我一度拜服于制度决定论、制度万能论等神祇的脚下，读史渐多，阅世渐深，渐渐发觉，制度终究是人的制度，它不会从天而降，而需要人的建构，它不会自动运行，而需要人的维护。制度是手段，人才是目的，制度为人服务，而非相反。明白了这些事理，则有助于我们认知人力与人格、意志与德行的巨大作用，无论之于制度，还是之于历史。如秦晖先生所言："'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有人读史，读出了人的无力，我却读出了人的力量。

从制度史转向人物志，还涉及方法论的变迁。制度史研究过于宏观，不得不追求一个"大"字。人物志写作则略有不同，要总结的话，可借用曾国藩的名言——"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即视野要大，视角要小。曾国藩此语出自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吴廷栋信："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原文谈的是治军，用于治学与治史，亦无不可（古人眼中，兵法与读书法一贯相通）。就人与国运的纠葛而言，唯有大处着眼，才能洞悉时代的走势；唯有小处下手，才能明察个体的归宿——我们谈国运，终点或重心终归还得落到个体。

我要把此书献给两位英年早逝的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同代人，意气相投，志同道合，却不幸于今年四五月间先后病逝，享年不足四十。那些剧饮千杯、酒酣耳热、横议江湖、纵论国运的日子仿佛还在眼前，三人已经相隔两个世界。唯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收到这份迟到的礼物，并以最大的灵力护佑我走完我们这代人命中注定的征程。有朝一日，我们终将重逢，再论国运，依旧万丈豪情。

2023年5月13日

于宁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羽戈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1(2024.11 重印)
ISBN 978-7-5458-2288-5

Ⅰ.①知… Ⅱ.①羽… Ⅲ.①史评—中国—清后期—文集 Ⅳ.①K252.07-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06247 号

责任编辑 俞诗逸
营销编辑 王 慧
装帧设计 汪 昊

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
羽 戈 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30,000
版　　次 202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458-2288-5/K·487
定　　价 72.00 元

世纪出版

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浮沉
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

▼ 被外国人大力夸赞的慈禧，其真实知识水平如何？

▼ 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终究比不上俾斯麦？

▼ 精于权术的袁世凯，最终因为“不学”害死了自己？

▼ “极聪明”的恭亲王，有没有可能收拾晚清残局？

▼ 同为重臣，为什么说文祥是晚清的上限，荣禄则是下限？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5458-2288-5
9 787545 822885 >
定价：72.00 元